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月是故乡明

 **eBOOK**
内容资料 丰富多样

责任编辑：邹智贤
装帧设计：李卫平
陈巽如
版式设计：李卫平
朱永红

月是故乡明
戴文葆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 78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0921/32

印张：10.375

插页：3

字数：188000

印数：1—6000

ISBN7—5438—1684—9

I·223

定价：16.0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题 记

在燥热难当的日子里，将二十来年间所写的长长短短、方方面面、拉拉杂杂的一部分拙作，按照朋友们的设计，抽出一些篇来，重新审视一过，首先涌上心来的是，处此各色泡沫泛起、令人目眩的年头，应该感谢出版界的朋友，给我一个自审反思的提示。这些年写下的风雨泥泞路上的感受，日常工作中的见闻，发自内心的独白，不就是昨日的思绪而今仍回旋于脑际么？这二十来年是难以忘怀的，理应珍惜的，在滚动中总还有一些宁静。我是怎样从纷繁混乱中相当艰难而又终于色洒如也地走过来呢？

抚心自问，不得不从“史无前例”说起，那确实是华夏史与世界史上尚无前例的劫难。打着神圣的旗帜，大革一切文化命的十字军暴乱，反映了五千年来古国阴暗的一面，暴露了历来万花筒式不断变形的精神上的痼疾。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上海召见哲学界周谷城等，曾号召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现在二十来岁的青春少年，恐怕已经无法想像那疯狂的岁月；脱去蓝衫的能人，也许更已忘却那举家震恐难堪的日子，自己的头脑里怎样淤积着污泥浊水了。不才万幸，诏许还乡。旧居数椽，可遮风雨；监理茅厕，赖以度日。履新当天，喜逢共和国十八周年大庆。形势大好，豪情满怀，左手高举鲜艳小红书，右手执持扫帚铁粪勺，挥舞粪勺志气昂，竟然想起东汉“少厉清节”的范滂。那时北方饥荒，官吏贪赃枉法，盗贼群起，皇朝任命他出任清诏使。赴任之日，《后汉书》说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我又忽而惊觉，惶恐不已，环顾茅坑四布，臭气逼人。愧蒙重用，一度掌管十座茅厕，未设副职，可以专政独断；而京都传我出身豪族，自幼娇惯，从不洒扫庭院，未便自荐，再献绵力，免于紧跟苦学，乱弹假大空的变调了。

平日蛰居闲坐，偶感寥落，惟默诵《过秦论》、《岳阳楼记》等名作以为乐，或冥想狐鬼神怪以自娱。有次想起民间传说中的白素贞来。（她可真是牛鬼蛇神，在雷峰塔下管制她的揭谛神，只算个在至高无上的大神役使下的小走狗神。）如果她安心匿伏深山大泽，倒也自在度日。她的不幸，就在于修炼成人，妄想克尽人的天职，享受人的权利，甚至要生儿育女，还开片药店来救人济世，侵犯了大名人的专利。她在雷峰塔中还悲叹不解：“在塔中，思往事，心神不定所为何情？”落得这步困境，还不知罪，不懂何以为天条所不容。当年法制不完备，缺少劳动教养。不过，天可怜见，她未读过深切了解神州万态的鲁迅的书，读了大先生的书，就不至于整天悲悲切切了。《坟·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怀着嫉妒、荼毒生灵的法海禅师，最终受到拿办，躲到螃蟹壳里出不来。“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我一次又想到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居住的伊甸园。上帝能造人，专为亚当、夏娃建了这座乐园，却又严禁他们采食“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俩也不知感激上帝养育之恩，偏偏受蛇来引诱，吃了禁果，违反了上帝不准认知善恶的天国里的禁锢国策。这可了不得，被逐出园外。上帝还派了天使把守进园的道路，从此不让后人重来觅得这座乐园，教他们的儿女在人世受苦。这上帝老头儿倒很风趣，我未查到材料，不知圣母玛利亚是不是不肯与他同居的老伴。他却善于玩弄世人于股掌之上，又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当救世主，到苦难的人间来卖好，据说是受命要教育好和救赎亚当与夏娃的苦命子女们。埋头劳动，闭目遐想，再加醇厚的乡情，温馨的友爱，使我尚可出处冥会，而安然穿越黑夜，迎来了新时期的晨曦。

在高耸庄严的城楼上，在红头黑字的文件中，“文革”早被宣布全面否定了。我不像美国总统里根一流高贵的人物，患了早老性痴呆症，我并未忘记彻底否定“文革”的严正决议。然而，在理智与感情的冲撞中，我谛视生活，回顾历史，感激苦难！《孟子·滕文公下》说过：“志士不忘在沟壑。”在我得以静心读书，执笔为文，或是幸会好友时，总不免要想到那无数屈死者，埋骨荒郊，无法祭扫，而我们鞋底上还沾着他们至今未干的血痕。今天幸而在滚动中获得的一些宁静，那是以他们的惨死为我们挣得的。“文革”十年，毁灭人也锻炼了幸存的人。它是一次深刻而普及的国情教育，激起了又一番浸透了血泪的新启蒙思潮。对于贫困而愚鲁的老百姓，对于经历骄人而忠顺的老干部，毫无例外地都被在后脊猛击一掌，犹如折戟沉沙，在心病沉重而丧失自信的老人心窝上无情地猛捣一拳。万恶的“文革”，通过霸道方式调教人们去小心认识古国异样的特色，意料不到地给予人们一柄可以开通七窍的钥匙。前人谈到老师培植生徒时，往往说“孔铸颜”；至今幸存的人们，应该深深感谢“文革”烈火的精炼锻打，还必须把所获的见闻与认识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不能忘记那极左的策动，十年的惨剧。我还要引《孟子·滕文公上》的话：“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要着力启蒙，与愚昧和贫穷进行不懈的抗争，切实有效地发挥教化的力量。各种各样的笔，凭良知做点力所能及的正事，再不应成为放肆地欺哄百姓和粉饰丑恶的剧把与棍子；那些精心策划的出版物，不要化为迷魂汤与遮羞布啊！苍天在上，万目所视，如不灰飞烟灭，后世终会刨根问底，做一番严正的考据的呀！

至于《书海浮槎》文丛，原本要求多载美文。惭愧的是，风雨如晦，关山跋涉，青春子弟江湖老，早已剥蚀了抒情的彩色。由于铁板终于揭开，才能断续写下一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徘徊体验，浅尝世态，咀嚼生活，伏案探索。不外是个人的忧喜苦乐，得失渴望，理解困惑。反躬自问，大都与书有关，或又由书及人。依其内容，酌情编次，注下年月，以便查照当日的思考与追求。在现实与历史面前低头沉思，不少问题未能展开，不免戛然而止，愧不成章。我将怎样鞭策自己、深思求索呢？

当这本小书形将面世之际，我不能忘却在“文革”的灾难中照顾与卫护我的乡亲与南北良友。他们当年的警欬与眼神，为我增添了生活的力量，激励我在冥蒙的黑夜中摸索前行。如今烟霏云散，而隆情高谊凝聚在我心中。自愧没有勃拉姆斯的才情，不用说写不出《C小调钢琴四重奏》，连陈旧粗俗的嬉游曲也不会弹奏。这里谨以拙稿中的几个标题，寄托我的感念，表示我呈献本书的微忱。

古人往往还未到我这样的年龄段，便常有“对镜”之类的诗篇，抒发虚度人生的痛楚与喟叹。因此我找出一面尘封的镜子照照自己，左看右看，看来看去，怎么都很不顺眼。难道镜子里就是我吗？怎么难道异化了的不是我呢？莫非这镜面背后水银涂抹不匀，还是镜面凹凸不平呢？我怎么这副模样，随手推开那面令我生疑的镜子。

其实，这本小书便是一面察看自己的镜子。我将怎样捐弃旧我，鼓勇去寻求新我呢？——且用不着麻烦心理医生，还靠要求自己。

戴文葆

一九九七年七月开始写于怀柔宽沟，十一月在上海写出初稿，十二月底在北京东城改成。

初老嫁女

一个雪朝，北风凛冽，德玉、正廉伉俪冒寒来访，阔别三十年，几疑天降。倒没有像唐朝诗人李益所说：“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一眼就看出故人风采如昔，不过增添了艰难岁月刻划下的许多纹痕。喜相逢中，时过心上的邓初民先生豪迈而亲切的形象，蓦地浮现于眼前。

德玉是初老的义女。初老夫妇膝下有儿有女，他俩喜欢年轻人，又接纳了几个义女。我年轻时虽在许多集会上见过他，但得亲警欸，也是他的义女晏姊引见的。30年代初，鲁迅主持左翼作家联盟时，初老是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主席。我年齿少而醒悟迟，后来读了他的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著作，便成为我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初阶。犹记那天在小什子谒见时，桌上放着他经常携带的当手提包用的白布包袱，鹤发朱颜，精神矍铄，如罗汉，如金刚，胖手给我许多温暖和力量。那出自肺腑的教言，体现着我国先进人士总是殷切地瞩望着年青一代。他的优容和关怀，至今想来，犹催人奋起。

用周总理那时的话说，初老当日是“六国封相”。听从党的安排，他是许多民主党派的诤友，同时出任民盟的负责人。最使我难忘的是，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重庆各界于“一二·九”十周年纪念日在长安寺举行沉痛而又激昂的追悼大会，三千多人出席。沈钧儒、柳亚子、郭沫若、邓初民、史良等为主祭团。沈老主祭毕，郭老慷慨悲痛地朗诵《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哀辞》，接着青年学生代表献祭文。致祭仪式后，初老是第二位演讲人。他用烈火一般的语言，愈说愈激昂。到会人的心都跟着一个旋律在跳动。初老最后说：“历史是无私的，反动派听着：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反抗的，谁要反抗，谁就会被人民的血汗所淹没！我们今天不哭了，我们要用血汗去奋斗！”听众用持续不断的掌声应和他为大家发表的誓词。

李、闻被杀害后，反动派扬言要暗杀沈老、初老和陶行知先生。

初老于1947年1月到上海，3月间国民党军侵占延安，中共中央已主动撤出。那时白下、申江反动气焰高涨。初老等响应党的召唤，将有远行。这时，他为义女德玉主持了婚礼。所谓婚礼，不过是着我们小青年去向史良同志商借她的客厅，办两桌饭宴请友好。史大姐听说初老嫁女，欣然同意，并表示应尽屋主之谊。

那是1947年4月7日。尽管陕北、晋南和中原一带战斗方酣，上海已闻到火药味，大自然不理睬人世的苦难，春意正浓，阳光明丽，正可说是艳阳催妆。按初老指示，约请二十来客。史大姐与陆昭华先生下午早准备亲自接待。郭沫若、柳亚子、翦伯赞、夏康农诸前辈陆续来到旧极司斐尔路。戏剧界人士都知道田汉“请客”的佳话，他还有一个习惯，他被邀请赴宴时，常常拉他的好友一道来。那天果然有应云卫、唐若青与他联袂而来。初老热情欢迎后，还暗暗夸奖我们年轻人颇有先见。其他还有诗人、演员、记者、编辑和教师等等，席上并不太挤。

按旧俗说，这天是所谓三星在户双星渡。史大姐宅中，文化艺术界人士星光灿烂。绢裱的签名纸铺开时，初老请郭老领头签名留念。

郭老伏案握管，沉思五六分钟，潇洒地题诗一首：

桃李花正秾，百鸟咏春风，春申江上乐融融。鸡鸣人戒旦，但期九州早日庆攸同。

郭老大手笔，写桃李春风，既表祝贺嘉礼之忱，又言鸡鸣戒旦，警人醒睡，提示国运维艰，催人努力斗争，很得风人之旨。

初老继请柳老坐下题名，他欣然命笔：

婚姻至竟需平等，
恋爱从来重自由。
民主家庭新创造，
风云莽荡海东头。

志士仁人，时时处处悬念国家的命运。柳老点明这是一个风云莽荡的时代，上海华东也酝酿着剧变的势头了。田汉更饱含时代气息，挥毫写道：

鼙鼓满天下，
鸳鸯泛海滨。
愿成爱国志，
来慰白头人。

田汉给一对新人诚挚的勉励。在他名字的先后，还有应云卫、夏康农和唐若青署名。

我们在翦老古代史巨著里，读过他写武王伐纣，前徒倒戈，奴隶起义的生动场面；在《群众》上读过他《桃花扇底看南朝》的生动文章。二十年后，内蒙访古，也题过诗。这位史学家那天却有一首好诗尚不为人知：

亦知初老多佳女，
岂可催妆无好诗。
宜家宜室先宜国，
应把盟心代画眉。

“文革”中污蔑翦老在重庆时，每天等待反动派安车蒲轮来接，我们就看这首诗所抒发的襟怀与对青年的情意，何等高尚感人！翌日，应初老之请，翦老特用粉色虎皮宣纸将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德玉伉俪。

初老本人引用《诗经》开头四句，题赠新婚夫妇。次日，又写了几行，语重心长，勸勉德玉：

凡事多留心，多研究，尤其对于你的工作和环境，这便是哲学。要懂得哲学并不全靠哲学书。哲学的目的，是教人更能干，更认识现实，落手越重。

这里还要为一位革命老妈妈写一段。德玉勤恳好学，随处留心，她就业前在四联总处银行人员训练班乙级班学习，见到女生管理员蔡亦民老师在房里看《新华日报》，看她谈吐不凡，文化素养较高，便主动和蔡老师接近。相处日久，知道她的侄女和侄女婿秘密将医药器材通过青年会运往解放区，她还有个儿子在延安。她过六十寿辰时不敢声张，深恐因

年高而被当道解职，秘密请德玉吃了一碗炸酱面。1944年8月，德玉结业、行将工作时，请她赠言留念。蔡老师以遒劲而熟练的行书写道：

德玉同学要我为她写纪念册，但是，我有什么可写呢？与其按照俗例写几句不着边际的恭维话，毋宁写几句切实的互相勉励的话，似乎比较更有意义。

希望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并以这种精神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在那艰苦严峻的时代，老一辈人对青年人多么诚恳，多么亲切！德玉后来才知道，题名“姚蔡亦民”的这位老师，是姚依林同志的母亲。德玉有幸，青年时代常得高人指教，她铭记力行不懈。

重逢不易，我与德玉、正廉欢笑谈往。那天下午诸老题诗签名后，都到户外草地摄影。我们年青人西装革履，郭老、柳老、翦老和初老等都着长衫。史大姐挽着昭华先生漫步，郭老很风趣地挽起柳老说：“我们也套个X膀子！”向晚入席，初老劝酒进菜，宾主尽欢而散。

流光容易把人抛，三十八年飞逝而去。柳老、郭老、初老先后谢世。初老享年最高，沧桑历尽九十年。他在最后的回忆中谦逊地说：“瞻仰丰碑惭后死。”他为人民解放奔走呼号，做了多少好事，栽培了多少青年！当年同席欢谈的人们，不仅田汉老、翦老等在“文革”期间被害死逼死，与我同辈的人中，如小岚、铁人等均被折磨而逝。过去有那么一阵子，帝王思想恶性泛滥，封建残渣都泛起，株连甚于瓜蔓抄。德玉因正廉而困厄坎坷，茹苦含辛，坚持工作。现在她还在做妇女工作。午餐后，我携小方送她们登车，看她步履矫健，行动迅捷，我仿佛又听到了初老宏亮的笑声。

1985年2月

像金子那样纯净的人

1950年12月间，人民出版社成立前后，承领导上三次向上海方面商调我来京工作，终蒙华东局宣传部指示我所在的单位放行。我于1951年9月上旬到了北京，最初安排住在东总布胡同忠厚里西侧的单人宿舍里。京华秋色，天高气爽，碧空如洗，播音机里飘出激昂的歌声：“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非常兴奋地参加到吃小米的行列中来了。

那时，出版社成立还不到9个月。胡绳担任社长。我在重庆求学时就认识他。1946年他到上海主持生活书店编辑部工作，在《理论与现实》上发表过我的政治论文，又出题目教我为《读书与出版》写时事评论，并在《国际现势读本》中写了美国一章。1947年他去香港前夕，还特意把我叫到编辑部去，指点我如何学习与研究，体现了党关怀无名青年的成长。他也许早已淡忘，我至今记忆犹新。1951年9月我在人民出版社报到时，才知道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不常到东总布胡同来。

那时经常在人民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是华应申和王子野。我来之前，已经读到他们编译的书籍。王子野翻译的薛格洛夫主编《西洋哲学史简编》刚出版；华应申这名字，上海初解放时，我读了《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就是他在山东解放区大众书店编辑的，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当时应申同志是副社长兼总

经理。

华应申同志（1911—1981年）是江苏无锡人。我的记忆中仍保存着初次晤谈的印象：面容清癯，乡音未改，质朴真挚，平易近人。他领导人民出版社的时间不长，我从没有见过他加强气势的大声疾呼。每次会议，总是不紧不慢，娓娓而谈，也善于听人发言。平日布衣布鞋，清瘦文弱，是个才不外露的人。他当日的形象，我至今不能忘怀。

在我来社工作前几个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已并入人民出版社。我曾听沈静芷同志说过，应申同志与徐雪寒同志等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1931年春，他踏入社会不久，在上海就参加了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1932年春，在无锡因筹备组织文艺团体海燕文艺社而被捕，刑讯逼供之下，坚贞不屈，被判刑五年，关进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3年秋经设法保释出狱。1934年初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南京党组织被破坏，应申同志在失去组织联系后，自觉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冬，在上海考进生活书店，同时参加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等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学习、研究和政治活动。雪寒同志回忆道：“我们知道他在1932年被捕过，经王昆仑同志营救出狱的。他沉默寡言，但政治态度积极，中英文都不差，还会些美术、书法，懂会计。”“1935年夏天，组织委托我和他筹办新知书店。”雪寒同志强调说：“如果没有应申，看来我是不会有信心接受这个任务的。”应申同志积极参加筹备，并被选为副经理，主持新知书店的日常业务。他是唯一的专职干部，每月拿18元生活费，住在办公室兼货栈的小房子里，还得贴回书店几元房租。一本书稿决定采用后，有关版面设计、买纸、跑印刷厂、核算成本、确定售价，以及书店设计账册、记账、开票等工作，主要都是他承担的。应申同志与出版事业的因缘缔结于此时，新知书店当时就成为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出版机构。

我到京时，正赶上中央在新闻出版机关中开展消灭错误运动。新闻总署范长江同志于9月12日及24日，两次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事业局、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座谈，商讨如何消灭出版物中存在的错误等问题。人民出版社从8月27日到9月21日，对出版物作了一次比较详细的检查。将自编的《新华时事丛刊》、《抗美援朝小丛书》及《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丛刊》等，翻译的法律理论书籍，以及7月份出版的11种期刊，其中所有政治错误、事实错误及错字漏字的校对错误，乃至书籍广告中的错误，一一列举出来，由梁涛然同志主办一次错误展览会。我奉派协助他在大四合院前面的会议室里做陈列工作。

当时应申、子野同志都狠抓这项工作，号召全社工作人员人人都要树立严肃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我协助涛然同志办错误展览会，这无异保送我进编辑工作先修班学习，受益匪浅。这时，我在夜晚阅读了我社承印的几期《保卫和平》（《和平》杂志），对译文、译名、编排、校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札记。被范用同志拿给应申同志看了，他随即给我发表在1951年10月22日第41期《出版周报》上，题为《对〈保卫和平〉杂志的几点意见》（笔名魏迟）。在此之前，我还在上海工作时，于同年6月21日发表在《大公报·读书与出版》上的《介绍〈季米特洛夫文集〉》一文，其中一部分曾被转载在7月2日出版的第25期《出版周报》上，题为《〈季米特洛夫文集〉

译名太混乱》（笔名黄然），文末特加“编者按”云：“以上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社出版的其他的书，可能还有类似的错误，应即进行检查。”

应申同志长期主持革命出版机构新知书店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在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印中共中央《解放》周刊，出版抗日救亡书刊及社会科学著译等方面，作风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自己还翻译过M·伊林的《人类征服自然》和《苏联的发明故事》等书。曾为我国广大读者欢迎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巴比塞的《从一个旧人看一个新世界》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都是应申同志组织出版的。对他主持“新知”的实际业务，徐雪寒同志讲过一件往事：

记得1936年春，苏联版画展览在南京、上海展出，我建议应申请人选编一集子。后来选编就绪，版子（包括彩色版）都已制好，付印前又由钱俊瑞同志（他是新知书店理事长）请史沫特莱转请鲁迅先生审阅。鲁迅先生审阅后说，编得不行，不能用。应申就决定停印，不惜资金遭受损失。应申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终身不变。（《怀念出版战线的老战友——华应申》）

尽管当时“新知”很穷，但应申同志力求内容正确充实，绝不肯马虎，绝不出版损害读者利益的书。

在我对《保卫和平》等杂志提出意见后，据我所闻，应申同志则从宏观上来考虑本社所编印、承印的各种期刊处理问题。那时本社先后出版的期刊有：《新华月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新中国妇女》、《文艺报》、《新观察》、《和平》及《保卫和平》、《翻译通报》、《时事手册》、《说说唱唱》、《抗美援朝诗·歌·画》、《中苏友好》、《人民音乐》、《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中央合作通讯》、《世界知识》等。出版部因而分为图书出版部和期刊出版部。这些期刊，后来有的停刊，有的转移，有的改变出版名义，作了种种处理，以符合人民出版社的性格。早在30年代，应申同志正从事译书工作时，徐雪寒听他解说鲁迅怎样以“诸夏怀霜社”名义编印瞿秋白《海上述林》，当时就想道：“他真是一块搞编辑出版工作的好料子！”

当我初到北京时，一个星期天，他一清早就到我的住处来，问我去过故宫没有，便领我步行到天安门去。记得还有范用同志偕行。参观了千步廊和午门，又看了三大殿。当时我不过是20多岁的年轻人，应申同志是前辈和领导人。这个愉快的星期日，不仅观看了巍峨的宫阙，而且满领了领导人关怀的盛情。在抗日战争中，应申同志先后带领书店同人迁到武汉，又转到桂林，那时几乎每月都能出版新书，不但业务工作效率高，而且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能把同志们团结在一起，非常关心有理想的革命青年。此时，他也关心我的组织问题，要范用同志布置我在出版总署听党课。

华应申同志曾于1942年春到苏北解放区工作，担任盐阜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科长，兼任中共盐阜区党委机关报《盐阜报》党支部书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科长，《苏北报》总编，华中分局宣传部出版科长，华中新华书店经理，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新华书店副经理、党委书记。他知道苏北是我的

故乡，有时就和我谈两淮的民风，苏皖边区政府的工作，主席李一氓同志在战斗生活中如何好整以暇，以及他本人在炮火连天的鏖战中亲临淮阴城下的情况等等。在苏北时，钱毅（阿英的儿子）和后来成名的作家陈登科、陈允豪等，在他领导下工作，都说他是好老师。

1949年初，应申同志调中央宣传部，任出版委员会委员。随后担任出版总署出版局副局长、发行事业管理局局长、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副总经理兼出版部主任。而后改变新华书店体制，出版、印刷、发行三项分立，人民出版社成立，他和书店编辑部同志们到了出版社。我那时在第二编辑室，是政治书籍编辑室，还编活叶文选、台历和图解，和余崇文同志共事，他是个可以促膝谈心的人。不久，华应申被调到国际书店担任经理。

应申同志对人民出版事业和国营新华书店的建立和发展，对私营图书发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外图书的引进和我国书籍的出口等，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据我所闻，他干工作实事求是，积极而冷静。在经管发行工作时，主管领导强制要求所谓按比例发展，他分析实际情况，不能按照主观想像的比例去搞发展，沉着坚定地顶住了下达的压力。知道情况的老同志们都认为可不简单！1954年出版总署结束，并入文化部后，他先后任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计划财务司司长、办公厅主任等职。在这一时期内，发生过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等重大事件，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华应申在审查了一幅以和平为主题的宣传画后，于1961年10月便被下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担任文化局长了。中经史无前例的“文革”，经受了烈火的锻炼。他在广西一住17年！

人的聚散因缘不可思议。领我第一次参观故宫的人，于1977年底到了故宫工作，应申同志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临时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唐山地震后，红楼在维修，文物局搬到故宫办公。我也到故宫西北的角楼下为《文物》杂志看稿。我闻讯后，到慈宁宫去看他，感到他音容憔悴。听说他还关照出版社把我留下来工作。这时，死神已向他走来，医生宣告他已患有晚期肺癌。1980年从上海回京后，头发落尽，食欲全无。他那时一男二女都在广西，1934至1936年中断的党龄尚未恢复，他全不考虑这些，却一直关注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知已患不治之症，仍坚持读报和听广播，并留下了引人深思的遗言：

效法杨老（按：指杨东莼），
改革丧事套套。
什么向遗体告别，——
千万别搞。
死了赶紧烧掉，
骨灰不留，做肥料。
也不要到八宝山追悼，
本单位开个小型座谈，
工作检讨，生活检讨，
缺点错误也不饶，

不是光说好！

他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短短几行，洋溢着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也透露了所处的艰难时世的严峻面目。他于1981年5月2日谢世。

青年时代就与华应申并肩创业，数十年肝胆相照、友情深厚的徐雪寒同志说得好：华应申是位“像金子那样纯净的人”！

1990年5月

月是故乡明

饮水思源，母校阜宁中学为我开启了知识宝库之门。我是1936年毕业生，那时全县只有这一所公立中学，而且还只是初级中学。

从沟墩迁到县城后，母校设在文庙里。迎门的大照壁上，嵌着砖雕的“宫墙万仞”四个字，下临半月形的泮池。穿过新建的一排教室，便是架着三座石桥的水池。后面是大成殿及其两庑，还有明伦堂、藏书楼。这完全是古代学宫建筑的规制。东边紧邻是城中小学，前清考秀才的场所。前面矗立着祈求文运高照的魁星亭。学校面前有一条小河，水流平顺，岸边树木葱翠；隔河就是公园的同乐厅和梅花岭。母校沉浸在周遭的秀丽中。

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谆谆施教的老师。国文老师特意选讲清儒张尔岐的《言志》；另一位才情横溢的老师，在地方报纸上辟一副刊，鼓励同学们写作。身患糖尿病的小代数老师，星期日上午还把我们集中到教室里当场演算。历史老师有声有色地讲说《史记》记载的垓下之战。几何、物理老师最受敬畏，他不用圆规而随手在黑板上画出圆来。音乐老师秉性率真，挥泪抚琴高唱《天伦歌》。应届毕业生那年，教导主任一歪一歪地添讲国学常识，校长来帮我们补习英语。他们无不尽心尽力，盼望家乡的子弟成才。回忆少年时，我总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他们的风仪。

那时，我晚上常到学校里与住宿生一起温课，有时二更天才出校回家。但见魁星亭上，月华泻地，一片清幽，真叫做“月是故乡明”！

月是故乡明，人以坦诚好；国家应以培育人才为至宝！

欣逢母校建立七十周年大庆，谨祝阜宁中学作育更多更好的人才，为祖国实现全面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3年8月

患难中和恁逸群守岁

那还是1967年初秋，“诏许还家老贫贱”，我只身离开混乱动荡的京都，云山万里，赤手南归江苏故里。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凄怆中依然涌出几丝欣慰。住下才两天，在阜宁中学高中部刚毕业的大外甥女对我说，学校图书馆有个姓恽的管理员，听说过去是大干部，新闻界的老前辈。她问道：“想必你一定认识的吧？”我顿时发了怔，不禁长长地“啊”了一声，又惊又喜。喜的是终于知道了斯人的下落，惊的是“人生何处不相逢”，竟在此时此地邂逅！

我的思绪回到1953年。当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工作，某日上午，我在南楼下西侧小卖部购物，听到身边一个南方口音的人买纸烟，转头一看，此人身着灰色西服，他也看了我一眼。啊！原来是听说调到

这里新华辞书社的恽老。他在沪上的遭遇早已披露于报端了，我们都没有多说几句话。后来他到城外杜家楼去了，担任地图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一天，黄洛峰同志打电话到我们出版社总编室，范用同志转告我，说老恽在这儿生活上有些困难。一贯关心知识界和作家们的黄老板，要我们设法酌予帮助。当时正值提倡重印有价值的旧书，我就着人誊抄他在解放区出版的很受重视的《蒋党真相》，其中关于宋子文理财术一节，可说是民国财政史的科学论文，评述入骨。我又请出版总署审读处负责人细看一过，提出一些意见，附上约稿的二百元定金，请恽老阅改后还我付排。清样刚看好，不料中宣部出版处闻讯查询，为什么这时要出他的书？我心知必有大事，立即主动承担责任，检讨错误。所幸那时领导尚通情达理，指着我说：“他不知道。”恽老的书改为“内部发行”，仍署“翊勋”笔名。这是1954年年底的事。

1955年初，恽老刚奉调筹备成立古籍出版社不久，红五月的一个下午，在院子里遇见《世界知识》杂志的吴景崧编审（他在“文革”中服多种安眠药而去了），他告诉我：“老恽昨天下午被抓去了！”吴景老看我十分吃惊，又补了一句：“是为从前的事，与今日无关！”我从没有在恽老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我晚生，未赶上他活跃在报坛和地下工作中的日子。他是我的老师和许多前辈的好友。年轻时即从前辈们的谈论中听到关于他执笔为文、倚马可待的风采，又读过他的一些旧作，心仪其人，从这一年起，刚出版一个月的《蒋党真相》及其作者，一并尘封了！

阜城是我父母之邦，我回乡不久终于在清洁管理所获得了清洁工的劳动岗位。我坦然地扛着粪勺，拎了水桶，上任打扫厕所之日，正逢伟大祖国建立十九周年的大喜日子。区区不才，深蒙桑梓照顾，只打扫两个厕所，20分钟即可了事，月工资12元。家乡一名壮劳力，在农村苦干一年，年终结算，也得不到144元。予何人也？何其幸运，又深感惭愧！平日闲暇尚多，随便抓一本什么书，就把我引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这时周围邻舍的小友，有几位正是阜宁中学的学生，承他们不厌弃，常来看我，谈论当地的新闻，“文革”引起的骚乱，最喜欢谈到的是恽老。从他们口中得知，恽老被分配到该校就业不到两年，他在学校图书馆中辛勤分类登录、做卡插架的图书，就被打翻在地，践踏撕毁；按月整理、装订成册的报纸被强行拉走，很可能给杂货店当包装纸用了。他搬出与一位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教员同住，早晚打扫校内十几座厕所，清扫往来道路，汇报思想情况，接待外调人员，由专案组监督管制；加上打饭打水，料理个人生活琐事，日无宁时。

和我接近的几位阜中同学，大都是老邻居家的后生，渐渐无话不谈，常将恽老情况相告，称他为“活辞典”、“资料室”，都爱听他谈论，言谈中流露着对他的尊重和敬佩。在一次批斗会上，有学生竟问他认不认识我，于是，他凄然地得知我也“打回老家”来了。我问这些同学，既然十分钦佩恽老，为何又常开会批斗他？原来，年轻人好奇心特强，抓到这部活辞典，就常常要翻检看看，提问题让他讲往事。恽老也坦荡荡，问到什么，就侃侃而谈。学生们闻所未闻，越听越有味，满足了便“且听下回分解”。这时大致还是所谓文斗，学生们“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当时待罪故里，闭门思过，“妾身未明”。除去劳动，极少上街

走动。然而这个县城太小，我终于见到恽老了：一次我在南水关桥下汲水，他从桥上走过，学校就在桥东不远处。这次他没有看到我，我也没有怎么看清他。另一次在大街上，他显然是去邮局，我来不及闪在一边，只好向他行了注目礼，就相背而去。这次见他面容清瘦，穿上破旧的大棉袄，戴上三片瓦的棉帽子，踽踽独行，相当虚弱。后来我便向和我相熟的这些同学建议，得便做些解说，老人承受不起成天在紧张中生活，可否少开乃至不开这种谈往的批斗会；不妨三五人找他围坐而谈。反正快到残年岁底，社会上派别对峙的劲头一时冷冻起来，学生们对批斗会也觉得厌倦了。

春节即将来临的时节，常来的小同学告诉我，校园里冷冷清清，只有“活辞典”还在干脏活。一个孤独的影子立即在我眼前晃荡。能不能稍尽地主之谊，邀约老前辈来守岁呢？我毕竟还有相对自由，于是，在探听了阜中校园道路后，便在年三十下午2时左右，走进了别离32年的母校，来到他的住处。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我立即长话短说：如认为尚无危害，请今晚来我寄寓一同守岁。并约定，我5时站在三角布店前空地恭候，见到后，我当即转身前行引路，概不交谈。说完便告辞了。离校时未遇见一人。出校门后，我不禁雀跃，额手称庆。

向晚，市街行人已少，我伫立街头，见他蹒跚而来，正点到达。远远对视后，我转身遥领，引他到我蜗居坐下。他解开棉袄，喘息方定，就随手抓起桌上“前门”，擦火抽烟。平日我房中无灯，是节省开销之意。今日特从过道里拉来电灯，过节守岁祈福嘛。在昏黄的灯光下，蓦地记起老杜的诗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到处骚乱不宁，难得的小聚啊！

1966年后，不能自食其力，我真的成为“剥削阶级分子”。所幸尚有旧宅数椽，足可栖身，开门七件，仰仗胞妹关照和几位新知接济。除夕特备酒菜香烟，没有客套和寒暄，首先衔杯问谪居。他不能饮“洋河”，斟上红葡萄酒，呷了一口便说：现在生活比囚居中好多了，那时独居一室，门上留有钢窗，倚门只见蓝天一方。除去不时走来张望的士兵，十年中未见过几个人。定时拿饭来，两菜一汤；也看到提着四只饭格的，想必是给高级犯人的。起初估计潘汉年就关在不远的地方。有不少人耐不住长期禁锢的孤独生活，无人交谈，不许走动，日久不能克制烦恼闷郁，便不幸发疯了。他又呷一大口酒，接着强调他自己能自制自慰，问心无愧，无事不可对党言。面壁十年，尽力适应这种刻板冷冻的活埋式生活，死寂中自求思想开展，活动四肢，不甘被默默地折磨而死。说到这里，焦黄的面庞稍现红晕，语音浓重，两眼生光，眉宇间现刚强不屈之气。

我请他边吃边谈，慢端杯，多夹菜。我在困穷中，当时只准备了“四样头”，这是我们江北人待客的家常小酌。想到他历尽苦难，年高体弱，齿牙动摇，舍妹做的几样都是长者吃得着的菜肴。我看到他已缺了几颗牙，这可算是大树的年轮吧。

他知道许多人关心他的冤狱，继续围绕着这一问题谈。他说他的遭遇，非三言五句所可尽述，因潘案牵连入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但他绝不妄自菲薄，个人缺点招怨，原则立场毫不摇动。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到阜宁中学后，整理图书，做卡登记，工笔缮写

三大本。借出翻破了书籍，一一修补后出借。收拾紊乱的藏书，搬动插架，贴补装订，所耗劳力，为生平前所未有。何况年齿日增，劳役超过壮年负荷，仍怡然从事，日常绝少休闲。随身除生活日用品外，别无长物。幽居面壁，虽在人世而绝少见人，并没有抑郁颓丧，发狂而逝。现在有工作可做，又能看到接触到外部世界，更可很好地接受人生难遇的检验了。他说到这里，定神地看着我。恽老为我展示困厄中做人处世的准则，言教身教，显然激励我坚毅持重，迎接苦难。

火接火，在香烟缭绕中，他说，相信周恩来总理会为他甄别平反。1968年，应该是为他恢复公民权的一年。他的想望，当是基于1965年最高人民法院秘密审判的决定。我默默听着，不敢想“应该是”与“实际是”中间有多大的断裂。世乱纷纷，世变日亟，周公又将殊难自保。在北京饭店逮潘后，陈毅市长本有边工作边审查的建言，亦以公缄口而未果。我举杯掩遮怅惘情怀，无言以对。

若干年来，新闻界公认恽老学识渊博，剖事深切。这也不是先验的，是好学不倦，读书、阅历、思考、穷理的结果。他夹点菜，要我说说北都情况，又问办公室里他的一部《清史稿》还存着么？我说，秦火熄灭后，典籍不是又出现了吗？这类书将来会重印，文化是消灭不了的！

他知道我不能经常阅读“两报一刊”，觉得并不怎么可憾，不过由此失去了在相异观点立场中锻炼和考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未免是个缺陷。他认为应该读一些新进士的策论和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式的作品，可以益智，可以观照真假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夹带黑体字的流行新文体，正是从晚清到“五四”时先进知识界所鄙弃的腐臭的文体，是老八股借尸还魂的新八股。他为之扼腕叹息，我感到这是新闻界言论界众多的端人正士的悲叹。他还说，林彪序小红书何言之谀也！学生们问他，历史上奸臣弄权，残害忠良，用什么手段来摆布极峰，欺压举国呢？又何以在历史上，在现代史上仍然层见迭出呢？他怎能正面回答。于是他谈到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的闹剧和灾难。今天回忆曩昔所谈，大约就是后来他写的《论新八股》和《平凡的道理》的最初腹稿。

小聚时间不觉长，街巷里祝福的爆竹响了，人家在团聚守岁呢。他说到1966年6月曾赴滇与家人一聚。其夫人刘寒枫内侄惕成，系我同窗好友，曾告以恽老子女各一，女为其妻妹所生，子为其弟产。恽老1949年前尽瘁国事，与家人离多会少。夫人一生在艰危与悬念中度日，抚养子女成立。子女在受株连中奉母惟谨，念父不辍。

海隅苦寒，我看他棉袄里钉有马蹄袖似的护袖，问他衣着缝制洗涤上有何困难，可以着人前去相帮。他说生活上锻炼得尚能自理，只是体力已受摧残，入冬哮喘颇苦。久经磨练，耐得住岁寒。我担心，最恶劣的局面还未到来呢。

夜深沉，外间鞭炮声连续。我准备了三包“飞马”，两盒火柴，请一位小友稍稍保持距离，伴送他过南水关桥返校；再三叮嘱，不宜与外间多作书信往还，议论时事。来日不可知，恐难再聚，相互珍重，以策安全。我目送他慢慢向东走去，在黑夜朔风中消失。

1968年盛夏，闹腾得更猛了。夏夜大街灯火通明，七里长街摆战场，恽老照例陪同学“走资派”长跪听训；或在白天挂牌示众，劳役加增。这以后我与恽老曾有十分短暂的接触，只递给他随身带的香烟之类。尽

管当时众所周知“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城市里香烟、火柴也很难买啊！他在阜宁还有一些我所得知的琐事，不能尽述。

1978年暮春，恽老到京访友，受到周静、计惜英、胡愈之、陈野苹、黎澍、徐雪寒、张明养等热忱接待。热情刚直的史学家黎澍为他接洽了南京第二档案馆的工作，中央组织部出了介绍信。他到南京后，黎澍很惦记，是年冬又特着《历史研究》与地震资料研究编辑部门人事负责人吴君承毅，由沪过宁时前去拜访，了解安置情况，并承第二档案馆惠允关照。承毅回京后告诉我，临别时恽老还询问我落实政策情况，闻言感念。可是，不到十天，恽老就离开他拳拳眷念的多难的祖国而去了。

与恽老在地图出版社共事不久的曾世英，就是与丁文江共同绘制申报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集》的老专家，1981年底与我在车上幸会，曾老立即询问恽老状况。我回去将恽老针砭时弊的大作复印寄上。1982年1月13日得回示云：

无意幸遇，一大快事。承复印纪念旧友文章，谢谢！

逸老说，“五十年来之积习难改，每见利害涉及人民之事，终必白之于当道而后安。”读之如见其人，值得大家学习。

1980年，恽老26年冤案得以平反昭雪，1982年恢复党籍。板荡识英杰，何需素车白马，鲜花山积，他有文章和事迹在，已经与中国现代史相融合，相印证：他曾为人民共和国奠基的长过程运石搬砖。

1994年2月

我的老师张明养教授

我的老师张明养（1906—1991年），是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政治学教授。可是，人们可能不知道，他还是一位辛勤的编辑家。从30年代初在《东方杂志》供职起，到1958年还主持过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工作。在他所从事的社会工作中，编辑一职几乎占三十年之久。通过编辑工作，他把自己造就成专家学者；作为专家学者，又充实和提高了所负责的编辑工作。

张明养1906年生于浙江省宁海县，本名良辅。1929年夏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那时他没有急于找工作，却到震旦学院去专修法语。1930年初，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参加《东方杂志》和《学生杂志》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在此稍前，1929年12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新语林”栏，就已发表了署名“良辅”的文章。

我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不少前辈曾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过。张明养说，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所适于培养人才的社会大学，那里有藏书丰富的东方图书馆，有学有专长的各种专家可奉作良师益友，还有更多的写作实践和接触社会新思潮的机会。”他进馆不久，就结识了原在商务工作，刚从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回国的胡愈之。他在悼念胡愈之的文中说：“愈老为人和蔼，平易近人，对我这个编辑部中最年轻的编辑，多方予以鼓励、培育和使用。”“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者炮毁，《东方杂志》停刊，于半年后重新恢复时，胡愈之承包编辑《东方杂志》，亲自筹备复刊，

担任主编。这时原《东方杂志》的编辑，很多去参加了申报馆出版的《申报月刊》工作。因此他主编《东方杂志》复刊时，仅有我一人回去工作，另外又新聘了二三位编辑。他除承包《东方》外，还兼任一个外国通讯社的编译工作，并帮助邹韬奋先生办好《生活周刊》和创办生活书店，工作很忙，因此对于《东方杂志》编辑工作，除了编辑方针、主要选题和重要稿件由他亲自决定审阅外，其余一般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几乎全部都交给我及其他同事负责处理。他对年轻人的充分信任、大胆使用和关心爱护的情景，我至今深记不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不仅在编辑业务上学到许多东西，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得到他热诚帮助，获得很大收获。”张明养就是这样在胡愈之领导下从编辑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1934年初秋，胡愈之为生活书店筹划创办《世界知识》时，最初就在张明养的住处集议。那时他新租了旧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寓所，家具还未摆设，胡愈老、郑森禹等和他坐在楼板上计议着。他虽因为订有合约，未能辞掉商务的原来工作去做专职编辑，但他从此一直担任《世界知识》编委，几乎每期都用“张弼”等笔名撰写专文。胡愈老的二弟胡仲持主持《申报》言论时，张明养还经常为该报撰写社论。1936年底，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被捕，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被封，书店出版了以谢六逸教授名义主编的《国民周刊》，实际主持编辑工作的则是张明养。抗战全面展开后，随《东方杂志》迁到香港，尽管又主编《学生杂志》，还参加胡愈老创设的国际新闻供应社（即著名的“国新社”）工作，编发有关宣传抗战的稿件。1941年4月，党领导的《华商报》在港创刊，他被夏衍等聘为编委，负责撰写专论。所有这些工作，他都默默认真地进行着。

关于明养老师在30年代和抗战时期在香港情况，夏衍同志特予介绍道：“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张明养同志由中共南方局的安排，在香港开辟对外宣传阵地。他和邹韬奋、范长江、乔冠华一起，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筹备和创刊了《华商报》，他是社务委员会成员，并撰写社论和时事述评文章，同时还协助韬奋同志创办《大众生活》，也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胡愈之主持的《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写了大量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我曾在他家里避过难。”

夏衍还说：“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对外宣传通讯社‘国新社’香港分社，他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又强调说：“特别要提到的是早在1934年，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他就是胡愈之创办的《世界知识》的编辑和撰稿人。1935年冬《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他签了名；同时他还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这些活动都是党直接领导的。”

他担任《东方杂志》编辑职务的时间很长，从1930年第二十七卷起，而后“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东方杂志》一度迁至长沙，1938年8月间又迁香港，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沦陷，该杂志出到第三十八卷告终，他此后才脱离商务印书馆，由党派人帮助离港到达桂林。

1942年，张明养经张志让老师约请，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我先后选读了他讲授的《西洋政治史》、《西洋外交史》和

《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一课，阐明其原委、流变、权力中心所在，组织制度改动，条分缕析，是开创性的研究。二十年后，我参与编辑《蒋介石演说集》时，对蒋在国民政府的职务变化，组织法的改易，了解清楚，全得益于听明养师讲授。我当堂静听，详细速记，课后又加以整理，至今我还未见到同类书籍中有哪一种能达到先师的水平。可憾的是，我的笔记本在动乱生活中丢失了。那时，他仍然没有离开编辑工作，到夏坝后即被法学院院长张志让聘为著名的国际时事翻译杂志《文摘》的编委。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任教，经常还为《新中华》杂志选译国际论文，给《世界知识》写稿。1948年底，叶圣陶、傅彬然离沪赴解放区，他兼任《中学生》杂志主编。这时他还积极参加以张志让为主干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的革命活动。

1949年建国后，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学生》一度改名《进步青年》，他在沪仍然担任主编工作。整个编辑部只有一位女青年欧阳文彬负责日常编务，16开本，用新五号和六号字排，杂志正文每期54页，在执教中挤出时间，担负着多么繁重的组稿审读和整理编校工作啊！

1952年间，由于胡愈老的邀约，他从上海复旦大学被调到北京来主持《世界知识》编辑工作，而后又兼任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当时《世界知识》是周刊，年年还编辑出版《世界知识手册》。他待人诚挚，工作耐心，从无疾言厉色，但又坚持原则，领导和团结同人，保证刊物质量，谨慎而又从容地准确完成编辑出版任务。

1957年秋，他被调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开展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同时主编《国际问题研究》。1958年整风时，又回世界知识出版社代理总编辑职务，他真和编辑工作有缘！在那“大跃进”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发展起来，不少错误的口号流行着，社内也有人跟着乱嚷嚷，编辑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他冷静而细心地带领同志们沉着地工作着，平安渡过风紧浪涌。一年后，回到研究所，仍然经常关心编辑工作。此后，他一直同时挂着全国政协常委名义，并参与民主促进会中央的领导工作。

他很关心帮助提携年轻人，不论是做编辑或是当教授时都如此。在大学教书时，他和张志让、周谷城老师，都为我们学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创办的《中国学生导报》写稿。有一次他在学生办的墙报上看到一个三年级学生写的论文，便把这个学生找来，教他誊写一份，后来发表在1944年2月29日出版的第四十卷第四号《东方杂志》上，题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主流》。这个三年级学生就是我。同年11月3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又刊载了我的一篇论文，也是经他介绍发表的。我在大学毕业不久，《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理论与现实》、《国际现势读本》，都发表过我写的论文。后来在上海《大公报》编报，经常受金仲华先生教导为《世界知识》写稿，起始也是明养老师介绍的，至今犹记1987年9月9日，第一届韬奋出版奖在政协会堂颁奖，我代表全体获奖者致词后，走下讲台，意外地看到明养老师坐在右侧前二排，我立即驻足敬礼。他是多么关心我国出版事业啊！还和30年代关心支持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一样的情怀。

明养老师生平，将专家、教授、编辑融合于一身，关心祖国命运，

社会进步。治学谨严，为人正派，淡泊自守。不吹嘘，不攀附，书生本色，从不以巧言包装自己，不为名利奔走争竞。数十年世势动荡，变化诡谲，胡愈老善于识别良莠，对他一贯坦诚相待，知无不言。在他 85 岁诞辰时，他的好友赵朴初作诗祝贺道：“君年长我一岁半，君才胜我十倍强。”朴老诗中说他“贡献犹多热与光”，“意态松筠穆而壮”。师母娄朗怀少女时代是柔石的学生，1927 年大革命中即是中共党员。解放前在学校中多方维护学生运动及被追查的学生。从我在教室里听明养师讲授时起，后来为他主编的刊物写稿，在他领导的编辑部里工作，以及在重庆、上海和北京到他住处拜望，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夸谈自己。前辈的风仪，正是后生的楷模。

明养老师因病于 1991 年 7 月 4 日在北京逝世，得年八十有五。著译已印行者有十三种，另有四五百篇论文尚待集辑出版。

1997 年 3 月

关于《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一

鲁迅先生写的《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未注明写作年月，在其日记中也查不出头绪来。

1958 年版《鲁迅全集》将此文收于第七卷《集外集拾遗》内，编在 1934 年的第七篇，注释第一条说：“本篇作于 1934 年 10 月。”该年计录八篇，第八篇为《给戏〈周刊〉编者的信》，最初发表于 1934 年 12 月 23 日《中华日报·戏》周刊第 19 期，据《鲁迅日记》写于 12 月 16 日。

1977 年印行的《鲁迅手册》试编本，1979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中文系资料室编的《鲁迅著译书信索引》，1981 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鲁迅著译系年目录》，都定为 1934 年 10 月作。

1981 年版《鲁迅全集》将此文收在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内，置于所辑 1934 年十二篇文章之末。

我怀疑此文作于 1934 年 10 月的说法，并进而怀疑此文作于 1934 年的论断。

二

《势所必至……》一文作于 1934 年 10 月之说，来源于许广平为此文写的《附记》。

1941 年 11 月 19 日上海奔流社出版的《奔流新集之一·直入》发表了此文，同时刊载这年 9 月 30 日许广平写的《附记》称：

暑间房子搬动了一下，偶然从抽斗里理出一些旧信、什物、笔记簿之类的东西。很意外的，就在簿子里面见到两页鲁迅先生的亲笔稿。其一是已经登载出来的朋友墓志的底稿；另一页就是上面所抄录而没有发表过的。虽然经过好几年的压在书里，还是可以看到它的皱折不堪的遗痕，于是从这遗痕使我回忆起来了：这都是从字纸篓里被我拾藏起来的。……第二页没发表过的这篇短文，为什么也弃去呢？这使我记忆起那时鲁迅先生刚刚放下了笔，恰好有什么小事向他谈到，他却烦恼起来，就把眼前写过的一张纸团掉了。过些时候，

我向他说：“你团掉的那张稿子我收起来了，给你重抄一遍，送去发表好吗？”他连忙说：“不要不要。”就在他“不要不要”之下压置到如今。然而这也是他的吉光片羽，……不管怎的，发表出来就是了。为了原文提到《人间世》，我从书柜里找出创刊至四十二期的全份，那是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起至二十四年十二月止，废名先生曾有五期投稿，值得玩味的是第十三期（二十三年，十月）的《知堂先生》末段的关于宣传的也是“吞吞吐吐”的妙文，也许鲁迅先生的短文是对此而发的罢。此外，《人间世》第二十六期，还有一篇也是废名先生的《关于派别》，都多少和《知堂先生》的一篇有关，也许就是那一时期，那一些人的文学观或派别观了。因为文章太长，此地不再抄录。意思只在查出鲁迅先生写这篇短文的时代，大约是在二十三年十月，如此而已。

很明显，《附记》是以废名的《知堂先生》一文发表时间，来推断《势所必至……》的写作时间。

三

的确，鲁迅此文的第一段就明确指出：“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

废名的文章，发表于1934年10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十三期66~68页。文末另行写着“二十三年七月”，当是写作时间。

鲁迅针对废名的文章，谈了文学的社会影响之外，在第五段还说到文人又不愿意做废物或寄生虫，“于是他只好说现在已经下掉了文人的招牌”。第六段亦即最后一段，提到文人“说要‘弃文就武’了”。——这是指周作人写的《弃文就武》一文。

周作人《弃文就武》，发表于1935年1月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一百三十四期12~15页，署名知堂。文末另行写着“民国二十三年，冬至日”，亦即农历甲戌年十一月十六日，公历1934年12月22日，当是写作时间。

胡适在北平编辑与印制的这份杂志，这一期除发表知堂的《弃文就武》外，在此文之前，排着陈之迈的《统一的基础》，顾毓琇的《学术与救国》，巫宝三的《乡村人口问题》；在其后，刊载丁文江的《苏俄旅行记（一二）》，吴景超（目录误植为“起”）的《中国的政制问题》，以及《编辑后记》。《弃文就武》一文，后由作者编入《苦茶随笔》197~203页，该书系北新书局出版，版权页上写着“一九三五年三月付排”。

这期《独立评论》于1935年1月6日在北平出版。中国的杂志，没有提前出版的惯例，通常多逾时才上市。而且，当年北平上海间没有直通火车，须到天津换乘津浦路车到南京，再转京沪路车到上海。若由天津塘沽乘海轮赴沪，行期更长。看来，在上海读到这期《独立评论》，势必在1935年1月10日之后了。

四

《势所必至……》中指出的“下掉了文人的招牌”，“说要‘弃文就武’了”，都是周作人《弃文就武》中的话。该文第一段说：

我是江南水师出身的。我学海军还未毕业得到把总衔的时候便被派往日本留学……我自己有过一个时候想弄文学，不但喜读而且还喜谈。差不多开了一间稻香村的文学小铺，一混几年，不惑之年倏焉已至，忽然觉得不懂文学，赶快下匾歇业，预备弃文就武。可是不相干，这文人的名号好像同总长大帅一样，在下野之后也还是粘在头上，不容易能够或者是肯拿下来的。我的当然不是我而是人家不肯让我拿掉，似乎文人必定是终身的职务，而其职务则是听取权威的付去做赋得的什么文学。

这里显然有影射和攻讦，不过毕竟如废名所说，“知堂先生总是合礼”，“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文章接着写道：

我的弃文于大犯其罪，被一班维新的朋友从年头直骂到年尾。现在是民国二十三年的年终了，我想该不该来清算一下。仔细想过，还是决定拉倒。第一，人家以为我不去跟着呐喊，他们的大事业便不能成，那是太看得起我，正如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我岂敢当，更何敢生气？第二，这骂于我有什么害处？至多影响着我的几本书的销路，一季少收点版税。为了这点利益去争闹，未免太是商贾气了。第三，这骂于人家有什么好处？至少可以充好些杂志的材料，卖点稿费。这事于人有利，我为什么不赞成呢？还有一层，明季的情形已经够像了，何必多扮一个几社复社人去凑热闹。总之，我早走出文坛来了，还管这文坛的甚鸟？老实说，我对于文事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可以不谈了，还不如翻过来谈武备吧。

我们将《势所必至……》的最后两段，与上引《弃文就武》的第一大段对读，就会看出它的针对性来。如果鲁迅没有看到刊登在1935年1月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弃文就武》，那显然是不可能这样联系论及的。从而就可据此推断《势所必至……》一文并非写于1934年10月；而且，从文章所涉及的问题看，也不可能写于1935年1月6日以前。

五

还应该提出讨论，我认为：《势所必至……》是鲁迅废弃的一篇稿子，先生不同意发表，只是没有说明原因罢了。

此文开门见山地指称，废名“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可是这一点不符合实际。

废名当时对周作人是十分敬佩的，在《知堂先生》一文中颂扬其人的立身行事与思想创作，可说是景仰之至。该文开头称：

林语堂先生来信问我可否写一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志，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这个题目于我是亲切的，惧则正是陶渊明所云“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薄冰云尔”。我想我写了可以当面向知堂先生请教，斯又一乐也。不过，一直未能下笔，又与友人讨论：

我们谈了好些话，所谈差不多都是对于知堂先生的向往。……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

废名对周作人推崇备至，下文又说：“‘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至于文学艺术是不是宣传，废名在文中这样说：

……去年我偶尔在一个电影场上看电影，系中国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为得要孝顺父亲而去做舞女，我坐在电影场上，看来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由中国旧戏的脸谱以至于欧洲近代所谓不道德的诗文，人生舞台上原来都是负担着道德之意识。

这里肯定艺术是宣传的。接着还是申论这种文学观：

佛家经典所提出的“业”，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艺术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说法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

下文还谈到周作人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不需征引。

许广平在《附记》中设问：“没发表过的这一篇短文，为什么也弃去呢？”我认为似可这样解释，因为鲁迅看清了废名并没有说“文学不是宣传”，才把那张稿纸团掉，丢弃到字纸篓里去。先生在紧张忙迫的战斗生活中，匆促之间，难免没有看清该文的说法，一字之差（“不”字），意义有别。待到细看后，觉得废名没有那样提，《势所必至……》第一段便失去了根据，“就把眼前写过的一张纸团掉了”。许广平把它从字纸篓里捡出来，要“重抄一遍，送去发表”。鲁迅连忙阻止，说“不要不要”，这正是先生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一贯态度，只是没有说明原因罢了。——我认为，这里的猜度并非臆断。

然而，鲁迅此文所强调的论点，则是完全正确的。“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鲁迅正确地强调文学的宣传作用，早在1928年4月写的《文艺与革命》中即已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

附带说一下，许广平《附记》的末尾说：“《人间世》第二十六期，还有一篇也是废名先生的《关于派别》，都多少和《知堂先生》的一篇有关，也许就是那一时期，那一些人的文学观或派别观了。”陈振国同志的《废名年谱》据以引伸，在1935年35岁下写道：

4月20日，发表《关于派别》一文（载《人间世》26期），本文和《知堂先生》一文，受到鲁迅先生的批评。（引者按：年谱摘录了《势所必至……》中“文学不是宣传”及其前后的各一句。）

这样看来，《势所必至……》的写作时间更推后了。不过，在文字内容上，与《关于派别》并无直接的紧密的联系。

六

以上所论，不妨归纳为几句：

《势所必至……》一文不是写于1934年10月，也不可能写于1935

年1月6日之前。在未觅得确证时，拟暂断为1935年初作。

《势所必至……》一文是鲁迅先生废弃了的稿子，因为终于看到废名在《知堂先生》一文中并没有说“文学不是宣传”。

《势所必至……》一文从第二段起，强调文学的社会影响，文学的宣传作用，都是完全正确的。

谨将研读此文的一点体会写出，向鲁迅研究者们请教，并感谢上海藏书楼朱贤钧同志为我多次查检刊物。

1984年5月

“拿来主义”的新进展

每当我走过北海公园门前，遥望琼岛之巅的白塔，通身粉白，造型秀美，不禁想到不同文化的接触，会产生怎样优良美妙的成果。佛塔本是印度的创造，又名■堵波、塔婆或浮图，为梵文 Stupa 与巴利文 Th ūpa 的音译。原型稍觉瘦削伶仃，建于高处，似呈摇坠之状。随着佛教东来，经我国匠师改建，发展为多种形式，其一为基座坚实高大，塔体丰腴，浑厚稳重，北海白塔给人一种安详牢固的视觉感和心理感受。这种■堵波式的中国塔，北京西城妙应寺内的白塔，扬州瘦西湖畔的白塔，都属于同一类型。

现在我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译编、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已有三卷问世，它是中国第一部中文翻译的外国百科全书。比喻往往难以十分贴切，不易全符思想对象。不过，我仍觉得，这是我国出版百花园里出现的一座白塔。

《不列颠百科全书》是当今具有学术权威的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自1768—1771年面世以来，经过定期修订更新，已有二百余年历史。第一版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以后到伦敦和剑桥，在19世纪70年代已出了八版。19世纪末，它渡过大西洋，美国人与该书出版者签订合同，在美国翻印第九版全套二十四卷。20世纪初，美国人获得部分版权，1901—1943年由英美两方合编。1929年出齐第十四版。以后每年修订，重印了41次。1948年全部版权转让与芝加哥大学，开始由美国人士主编。1974年，该书第十五版体例改变，面目一新。而后还出了日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和阿拉伯文版。1980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大不列颠全书公司正式协议：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并为此成立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审定重要条目和政治上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现在中文版开始出书，使享誉世界二百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性百科全书了。

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共十卷，主要根据第十五版的《简编》译出。该书第十五版三十卷本称《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编辑体例上是对该书的一大革新，将内容划分为三个部分：《详编》部分十九卷，《简编》部分十卷，另有《类目》一卷。（《读书》杂志去年第十期已发表过裘克安教授的介绍。）这个中文版，主要根据《简编》翻译，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经过缩译的《详编》条目，而且美方提供了原书最新的修订稿。

这部百科全书是英语世界中的知识宝库和学术权威。这里仍有必要

稍举二三个例子来考察它的价值。我们知道《圣经》（希腊文 biblia，意为“书卷”）汇集了公元前 8 世纪到 2 世纪期间语种不同、特点各异的作品，被犹太教和基督教奉为圣书。关于耶稣其人的诞生，马太和路加两篇福音书，说是拿撒勒木匠约瑟的未婚妻处女玛利亚受圣灵怀孕而生。这种实际没有尘世的父亲而由童贞女所生的神话，在西方基督教国家都奉为天经地义，许多百科全书、百科辞典也都采用这种神奇的说法，而本书直接指出他是罗马士兵的私生子，不顾忌亵读圣灵的问题。导致马丁·路德和罗马教廷激烈辩论，终至引发欧洲宗教改革的出卖赦罪符的经过内情，比我们在西方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读过的要详细而具体，不完全是为了什么修筑圣彼得大教堂，从而揭露了神职人员的卑劣勾当。它是以西方的文化学术为主，但也并没有忽略东方。对许多问题的考证，常从希腊、罗马和中国、波斯等东方国家探源。连体育运动中孩童的游戏，例如跳绳、跳房子也如此写。有些问题的说明，读后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有所启发。如“悲剧”一条称：

“悲剧比其它艺术形式都更加突出地提出有关人的处境的种种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受苦？为什么正义如此难以捉摸？这后一个问题正是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他最著名的两出悲剧（《奥瑞斯忒亚》、《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反复追问的问题。……在古罗马文化所及之处，悲剧一直没有起色。”

“在悲剧理论方面，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锡德尼和新古典派的德莱顿、约翰逊以及浪漫主义时代的柯尔律治、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都有见解，着眼点都是以悲剧为人类探索自身在宇宙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媒介。19、20 世纪流行的戏剧不再注意这个问题，结果使悲剧作品仅仅成为感伤主义之作。”

其它例子举不胜举。囊括百科，博学广闻，有些和我们熟知的不同，有些可供比较探讨，能起释疑、解惑、备查和交流的作用。条目多，内容丰富，代表西方学术界占优势的看法和解释。这都对我国人民了解外国情况，特别是西方的文化艺术、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宗教习俗等类情况，和有关的西方观点，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依此说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似乎只是一部翻译书罢了。难免有个别自称守一、不知有二的人，不懂劳动和人事的人，在琼楼玉宇里会扁嘴一笑说，这不过是“简单的重复劳动”，抱一本英汉字典就能干。

这是一部资料充实丰富的巨著，内容遍及古今中外的各个领域，汇集了人类文明的各项知识。四年多来，由于中美双方的通力合作，我们国内学术文化界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近五百位专家、学者、译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目下该书九卷稿齐，第五卷长条样校毕，第六、七两卷在付排中。全书十卷，一至九卷收条目正文及补编、附录，第十卷为条目标题英汉对照和笔划索引。计有条目七万一千余，约达二千四百万字，附图五千余幅。这样的艰巨，这样的篇幅，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译编完成，在中国真还是一个创举！

译编事业并不是什么“简单的重复劳动”。创作有时可以绕过遭遇的障碍，而翻译必须信守原文，不能避开。这一部具有广泛参考价值的权威性工具书，需要多少知识力量，多少辛勤的汗水和不眠的夜晚。地

名、人名的译译，似乎极为简单，径可按音硬译。其实不能完全如此对待。古印度的一些地名，例如摩揭陀国的“王舍城”（梵文为 Rājagṛha，巴利文为 Rājagaha），佛教史上重要的圣地之一，如只按曷罗阇姑利四城译音，而不查检玄奘法师名著《大唐西域记》，那是一大疏忽。又如格列高利，既是宗教中罗马教皇的名字，又涉及天文历法的称谓，彼此应有照应。为了反映原书的观点和风格，定下了只译不改的原则。译得信达就是一个争取的目标了。而且，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少条目尚须加以删减，要保持原来风格，又不损伤资料价值，这又是一个必须通过的关隘。全书的释文，最短不到三十字，一般六七十字至五六百字，最长为二千至三千字。乔治·华盛顿总统一条，原文采自《详编》。1982年版《详编》第十九卷 610~617 页，原文十六长栏，每栏以中文一千字计，约为一万六千字左右，要编译到三千字上下，这需要译编者具有怎样一种识见！在繁重的译编过程中，经常需要对原文作出不影响实质内容的压缩和删节，其数量平均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间。这都是对中文版编辑的一种不留情的考验。

中文版的特色还不止此。有关中国的二千四百多个条目，包括历史、地理、文化、艺术及国家领导人等，由我国专家学者参考原书另行编写，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并且充实了有关中国的图片。附录中所有统计资料均照录原书，但在译编过程中不断更新资料，有些条目的下限达 1985 年。原书有个别敏感条目，对学术关系甚微，经双方反复考虑和协商，决定不必多占篇幅。中文版在一定范围内不完全是照搬原书的了。

像这样一部中型百科全书，涉及人类文明的各方面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译编出版；翻译中又有缩译和删节等情，要说它已经妥善完美，便是言不由衷了。有些条目的译介，可以提出商榷。有些事和人，第一、二句还看不出是哪一方哪一国。如“百日政权”一条，说到“又称‘社会主义共和国’”，显得突兀；有些人开始只说是诗人、作家等，未加国别。很可能是由于原著读者对象不同，译编时又未遑注意及之。性质类同的条目，字数的比例关系也有明显的参差。先后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尔纳斯和艾奇逊，前者占十一行，后者几乎一栏，并附有照片。英国外相艾登、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最后都列举了他们的著作，贝尔纳斯独缺其《说老实话》。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一条的字数，较之诗人艾略特尚逊一筹。阿尔诺河的释文，如果指出它穿过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市西去，又穿过以斜塔著闻于世的比萨入海，读者将更容易了解。有一些条目译文的用词，仍不免和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习见的报章用语相近。所有这些情况，或因缩译、删节而产生，或者原著本来如此，还来不及详加考究。我想到的是，组织这样一批译编力量实在不易，特别是编辑部中负责具体编辑工作者的任务繁难。许多年来，风吹雨打，旦旦而伐之，人才培植之不暇，反而加速其凋谢。熟谙外文、学有根柢的人才，更加首当其冲，达摩克勒斯剑在他们的头上不停晃动。他们终于幸存下来，幸遇明时，这项工作成为他们以余年余热报国之路，莫不奋力以赴。上述一些问题，不足以使本书减色。不过，译编这种巨著的条件毕竟尚嫌不足，不看到这一点，那便放过多年轻左路线和十年浩劫留下的祸根与伤痕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

概论》中说过，社会必将向有贡献于学术文化者敬礼。任公不免太理想了。只祈望丢开唯品级论，莫说什么编辑工作是“简单的重复劳动”，理解人们的报国之情足矣。

屈指五十一年，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说过：“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他接着指出：

“‘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他占有，挑选。”“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

现在映入我们眼帘，充斥各地市场的是什么？“一号”洗发水，PG、GJ 牛仔裤，Sony，Seiko，港式拖跟女鞋，时装首饰、耳环、项链，以及各色来历不详的衣服之类。承认它们有着调节市场、辅助生活需要的作用，但我们广袤而富饶的国土，岂能以充当销售市场为满足？发展和改革就必须否定，开放和引进是为了创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译编和补撰，可以看作是“拿来主义”的新进展。我国古籍中的类书，人们以为有些和百科全书相近。类书的起源，以曹丕在位时编辑的《皇览》为最早；还有人认为刘向的《说苑》便是类书的元祖。若按编辑体例看来，唐宋两朝及其后各代所编的类书，不过是兼有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的性质而已。到我国揭开了历史新时期的帷幕，才有可能着手编辑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近年已开始分卷出书。现在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有选择、有原则的译介过来，自可从中得到借鉴和教益，我们竭诚欢迎这种“拿来主义”的新进展！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

朱正的《人和书》

我喜欢书籍，也喜欢朋友。爱书与择友，鄙意均在求知，现在竟然提笔为朱正同志的《人和书》写序，实在深愧僭妄，当先告罪于读者。

我终于为本书写序，倒不是处于醉酒状态，或是犯了老年性癫狂，自以为可以主宰五大洲沉浮，洒风雨雷电，主生死荣辱，而衡文定论，更不在话下。我不过是个爱书者，读过朱正写的两三本书和不少说理论事明快的文章，尤其欣赏钦佩他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想到孟轲说得好：“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便留意要结识这位作者，无非是想在与他的接触中多添一些知识，多得一些启发。

“无巧不成书。”我们竟同在一个大院子里工作了几年；男女老少，院子里有上千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并未住在长沙。我找上门去，拜访攀谈；以后打水、买饭，不时见面。有时，他在夜晚到我的办公室来谈天说地，畅所欲言，兴致很高；言辞坦率，偶尔也凌轹时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人如其书，文如其人。他是一个磊落鲜明、颇有特色的人，也是一位头角峥嵘、很有个性的人，与他接触，受益甚多。有时，我清晨到后楼去找他，原以为必可“拿获”，谁知他却早已锁门外出了。到八点钟，在门口竟又见到了，他说是已办好一件事，赶回来上班了。他在客中，如此栖栖遑遑，既无车马，又无随行弟子，不过只有一张月票！他成天编书审读，加工整理，又挤出时间写作，编辑与作者集于一身，还替朋友们和故乡人办一些杂事。我渐渐体会到，跟他接触可要小心，他不说谎话，也不佩服别人弄虚作假；他一刻不闲，是个好事之徒，总要劝告你干这干那，他自己却听任须发丛生。与他的交往，对我成为一种督促了。

有一次谈到他做编辑工作中所写的审读意见，图书评论，前言后记，人物评介，觉得可以辑集成书，成为正在兴起的编辑学研究的一种参考资料，窃以为从中能够引申出若干有学术价值的原理原则。这就是本书编辑的缘起。我这么一讲，又生出枝节，他就要求我给这本书写序，送去出版。我断然谢绝，诚恳申明我不配作序，学问差，阅历浅，更重要的是一品大百姓，像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所说：“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见信于世也。”后来我与他每次相见，他都提写序的事，能言善辩，微笑中含有令人就范的力量。我闭关自守，谨按既定方针办：“我自岿然不动。”有一次晤谈后，送他到楼梯口，听他以湘音喃喃地自言自语，好像责怪我不肯写序，就是瞧不起人！

啊呀呀！瞧不起一些人，老实说，也是有的；但怎么会瞧不起朱正呢！且不说他三十年间几度经受不公正的处理，单说在大革文化命之年，以“现管四类分子”之身，衣食无着，在那种奇异的新生活运动中，居然写出15万字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来，他竟比在鲁迅身旁的人还了解鲁迅，真够不可思议。我在1983年第7期《读书》发表的《朱正和他的〈鲁迅传略〉》一文中即已指出：

在一切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时代，要打破精神枷锁，排拒逆流前行，敢做有关鲁迅史料的正误工作，甘冒犯下“恶毒攻击罪”的危险，是要有追求真理的非凡的勇气，是要把头颅提在手上的。当有关鲁迅的史实被异怪歪曲解释时，朱正所做的正误工作，应该看

作是对中国人民积蓄和压抑已久的正气的发扬。

在极左横行和封建流毒严重的那个时候，做个有思想很勤奋的知识分子多不容易！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了全国，朱正终于沐浴在历史新时期的温暖的阳光里。他完全平反了，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的领导们大胆识拔了他和他的难友们。党的报纸刊物上宣传他，又被请去坐在庄严的大会堂里讨论国家大事，本来相识的有些人也改用青眼相看了。朱正还是“二十年前旧板桥”！区区不才，看得起或看不起他，不足以增减他一厘一毫。而且，我还想，就像厌恶快嘴李翠莲那样，肯定有人厌弃朱正，我也并不“最最最”喜欢他。但是朱正终究还是那个朱正，蓬头垢面，孜孜伏案，满屋子乱堆放着书，好像不知道堂堂首都的理发馆并不太少。我不愿给他写序，引起他不满，他倒也不是使用什么激将法，而是他竟把现象当本质。他不知从哪里听说，我十五六岁时就在地方上录音编报，当大学生时又编报，后来就靠做报纸、期刊、书籍编辑混饭吃，后来又因此晃浪浪打碎了饭碗，似乎颇知当编辑的滋味。我则严肃地注意到，朱正比我小十岁，而他不高兴的日子却不比我短。我多次反思，不必太拘谨，生怕人家指指戳戳议论我不懂天尊地卑；不应该自惜羽毛，而使我的良友不乐意，还是写一篇序言放在他集子的前面为宜。

爱好摄影者懂得，倒影常常比主体本身更吸引人。我多么希望为朱正而写的这篇序言，也能成为我的一种倒影。我之所以回心转意来写序，是含有标新立异之意。我怀着两点具体用意，请容我一一道来。

第一，读者为作家的大著写序，这是一个创举，一项突破。本来，“序”亦作“叙”，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后亦用作赠序体文章的名称。自序之外，他人撰序，起初都带着识鉴性质，大都是前辈学人，社会先达，或有德行盛名的人，才有资格为人著作写序，或赠人以言。我只是一个读者，不揆驽昧，固属良友之命难违，我还有一层含意。我国历来缺乏民主与科学，一言堂到处可见，而平等的同志式的评论活动不发达，图书、艺术、戏剧等论坛比较沉寂。我以为一切出版物有两个审读过程：一是在出版社内部，必须经过几个人次审读，而后考虑采用，进入加工整理，然后印制出版。一是在出书之后，书籍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社会上流通，这时受到广大读者审读检阅。这第二次审读，才能检验出书籍的价值；如若当代仍予忽视，而后人重新审读，终至发现了它的真价。读者评书，是一种极有意义的活动，可以采取写书评、开讨论会、举行读书报告会种种形式。这种活动得以开展的程度，反映一国文明的程度。我作为朱正作品的读者，写出我的感受来。我觉得朱正长于思辨，目光如炬。他读稿评文，鞭辟入里，能在字里行间看出问题，而且坚持原则，浑身是胆。凡有所见，总是直言道上，不肯畏缩搪塞，模棱两可。当个编辑，审稿评书，应该抱持这种态度。他行文遣词也有特点，我平时注意阅读，好像倚马可待，一清如水，没有雕琢，朴素之中寓有美感，我学不上。他编辑的书，也有我看了不满足的，例如《散宜生诗》（注释本），他的注释，多解典故，可见其治学功力，但我渴望多知道点本事，他却未予注明。我岂敢自封为读者代表，这里只写出读者之一的感受，稍尽作序者之责。

第二，奉呈此序，请求公众理解和尊重编辑的劳动，同时也盼望编辑自爱自重。作为一个编辑，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素质，一定的政治学术水平，而且还要经过一番刻苦的学习和训练过程。朱正这个集子中所收的文章，可以供社会上来测定编辑的功力。党中央和国务院再三再四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 1985 年 3 月 7 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但还不是全社会对此都能理解和都能尊重的。不学有术者流，至今还听不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导。甚至有个别管理过意得沃罗基的人物，个别自称守一、不知有二的同志，不懂得劳动和人事的人，还认为编辑不过改几个标点符号，编辑、记者的工作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只是一种行当罢了。那些只懂得把“木”字和“又”字拼合在一起，便在会上大言不惭的人，对他们不必气愤；我们应该怜悯这种不成熟的人，他至今还不认识自身文化素质如此低下为可羞，还不认识其部门里如此放肆的胡言替国家丢脸。还有一些人，认为职称评定制度与取消终身制不合，他们把党政大权和学术职称当作同一范畴中的同等概念对待，岂仅仅是个思想方法的问题，只能表明其方寸已乱，移位到胳膊窝下了！也难怪，我们至今还缺少谈编辑劳动的书。人类精神活动的这个奇异而艰苦的领域迄今尚缺少研究。朱正的《人和书》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反映了编辑的劳动，编辑的学力与真价，反映出编辑怎样辛勤努力，克尽自己的职责，完成党和国家交下的任务。通过各种类型的编辑的劳动，用创作撰述之美、审读加工之美、设计装帧之美的“三美”具备的书籍，向世界说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水平！我谨将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同行，它能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提高素质，奋力去实现党和国家的要求。我还要特别介绍给不大理解编辑工作的人，不知怎样尊重劳动和处理人事的人，读读朱正的这本书可治白内障，少说糊涂话，从而把自己逐渐培养成真正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的干部。这也是我稍尽作序之责。

上述两点拙见，不过野人献芹，若不以其蜚于口，或能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利于编辑出版工作的进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提高，学术的繁荣，关键还在人才。用人才，方能出好书；出好书，又能育人才。我希望这本书能给一切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人以力量，鼓舞我的同行奋力前进。我还希望这本书能给头脑里有什么东西束缚了的人物以后发，请他们在议论和衡量编辑的工作时说一点清醒的话；对于帮助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能表现出像重视国际球类比赛胜负那样的热情和激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生养抚育我们的祖国母亲。我们衷心祝愿她繁荣昌盛，有责任催促社会进步和革新。在我国近代现代史上，在历次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中，都有编辑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又岂敢自甘落后呢？

历史新时期的灵秀之气无远弗届。党和国家承认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嘉树美箭，已有土壤而生。柳宗元如仍健在，不会再说“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将会另写新的《八记》。洞庭波涌，岳麓风清，回湘从事出版工作的朱正同志，想必正在选择新的视角，着手撰写和编辑新书吧？

1986年6月吴晗和《朝鲜李朝实录》

书籍记录着历史，书籍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历史。中华书局出版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编者吴晗开始辑录于1932年清贫的大学生时代；三十年后，在他北京市副市长任内，于1961年陆续整理付排，1966年浩劫爆发前已经排成；到他死后十一年，党已经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吴晗的大冤狱幸获平反昭雪，三百四十万字、十二巨册的史料终于在1980年春出版了！大文豪雨果没有说错：“书籍的创造者是作者，而书籍命运的创造者却是社会。”

吴晗在学生时代就一心想在文史方面闯出一条路来。1931年8月，他考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这个来自浙江义乌农村的穷学生，没有钱上学吃饭，幸而在赏识他的名流帮助下，谋到了一个工读生位置，才不为生活所困而得以安心勤奋向学。那时的清华大学，称得上是个育才的园地，为他发挥才干提供了有利条件。入学以后，他治明史，就发现清朝官修的《明史》不真实，隐瞒和篡改了满族统治者三百年间的历史，以证明其祖先从未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朱明的封号，进而强调辽宁大凌河南岸建州地区从未隶属明朝的版图；甚至连他们的远祖，建立过金和后金两个朝代的女真族的历史，也被篡改了。这么一来，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中叶，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便出现了人为的空白点。年轻的吴晗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志要为建州史补白。他后来在《谈迁和〈国榷〉》一文中谈到这件往事，他说：“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努力搜集可能得到的史料，加以组织整理，填补这个人为的空白点，从而充实丰富祖国各族大家庭的可爱的历史。”这便是推动他研读《朝鲜李朝实录》的契机。

虽然吴晗当时还是个学生，但他已决心献身于明史研究工作，搜索和阅读大量明史资料，终于在北平图书馆里发现了两部研究建州女真历史的重要作品，一是当时尚无刊本的《明实录》；另一部就是朝鲜《李朝实录》。这是李氏朝鲜的编年史书，记载太祖（1392—1398）至哲宗（1849—1863）历代诸王事迹，及有关政治、经济、外事、文化史事，共1893卷。朝鲜的李朝（1392—1911），相当于我国明清两朝（1368—1911）。李朝自太祖李成桂至最后一王纯宗李坫，凡二十七代。除最后二王高宗和纯宗外，每个国王都按王朝建立以来的传统，特设史馆，撰写前一代王的实录。各王实录修成后，一般缮写五部，分藏于庆尚道奉化郡太白山、江原道平昌郡五台山、平安道宁边郡妙香山、江华岛摩尼山及鼎足山、全罗道茂朱郡赤裳山等处，类似我国皇家的石室金匱，妥为保存。《李朝实录》不仅是研究李氏朝鲜历史的主要文献，而且也记载着从明朝洪武二十五年到清朝末年朝鲜与中国往来密切的具体情况，其中有关建州初期的史实，记载极为详尽。这部编年史自然引起了吴晗极大的学术兴趣。

历时近五百年陆续编成的《李朝实录》，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后，汉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于1929年筹划影印，主要采用太白山本，小部分系用江华岛本。1930年7月开始影印，至1932年完成，共印三十部。吴晗当年在北平图书馆所见的《李朝实录》，就是其中的一部。

还应附带提到，李朝末期高宗和纯宗二王（1864—1911）的实录，

是在日本吞灭朝鲜后，日本帝国主义者设立机构编撰的，其立场与编辑方针与前代大不相同，但所引据的资料，仍是按编年体撰记的。1958年8月，中朝两国科学院合作，影印了高宗、纯宗实录，于1959年完成，至此《李朝实录》全部影印问世。

吴晗特别重视《李朝实录》，他说：“这些史料大部分是朝鲜使臣到明朝和建州地区的工作报告，很具体，很可靠，对研究明朝历史，特别是研究建州历史有极大帮助。”吴晗发愿把这部书里有关中国的史料都抄录下来。当时国内仅有北平图书馆作为善本入藏一部。要阅读和摘抄其中有关部分，没有坚毅的功夫是不行的。1962年间，吴晗对访问者说：“我从1932年开始，每逢礼拜六和礼拜日都往图书馆跑，一直跑了几年，足足抄了八十本。”这项摘抄工作，坚持了好几年。1934年夏季，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经常住在城里，便几乎天天去北平图书馆阅读和摘抄《李朝实录》了。

苏双碧、王志宏合写的《吴晗传》中记载了一段佳话：“那时，北京只有两个人经常去北平图书馆阅读这两部书（指《李朝实录》和《明实录》）。一个是北京大学正在编写《明元清系通纪》的孟森教授，他已年逾七十，但从不乘车。另一个，就是个子不高，衣着俭朴的青年——吴晗。当时住在文津街上的人，经常看到这一老一少出入北平图书馆，而且风雨无阻。”晨昏晴阴，持续不辍，这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啊！

《李朝实录》的摘抄工作中，不但丰富了吴晗的学术素养，同时无意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1934年秋天，他与袁震结识。比他大三岁、在清华高几班的袁震，是个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当时经协和医院确诊为骨结核，躺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弹，吃饭、喝水都要人照料。已经当了教师的吴晗，受友人之托，经常去照顾她。后来她的姊姊、中共党员袁溥之出狱到平，就在家照顾袁震。医药费很贵，生活又困难，吴晗和袁震的关系尚未确定，他就以请袁溥之帮他抄写《李朝实录》中的有关中国史料为名，每月补助她们四十元，解决了袁震的医疗费用。这笔钱占他当时工资的十分之四。

阅读《李朝实录》的同时，吴晗开展了建州史探讨。大学毕业后，吴晗写出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作于这年9月，发表于1935年6月《燕京学报》第十七期；解放后，吴晗将此文收进三联书店出版的《读史札记》，改题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弄清了建州史前期的基本情况。1937年初又发表了《后金之兴起》一文，概括地叙述了李满住死后一百多年努尔哈赤的崛起，完成了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这两篇论文叙述了建州历史发展的概况，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指示了途径，实现了他为建州史填补空白点的愿望。吴晗认为学术是天下的公器，他把自己辛勤抄录而尚未刊布的三百多万字《李朝实录》的史料，在南北奔波中总是携带在身，可并不当作个人的私产。1938年孟森教授已经谢世，因抗战爆发，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教书。当他得知郑天挺等计划继续完成孟心史的《明元清系通纪》时，就主动把这部抄写工整的史料提供给他们参考。

1958年5月，长期担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的金灿然，在部里耽不下去了，调到中华书局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这倒成了中华书局出版工作的一个转折点。金灿然真是有个气度、潜心学殖的总编辑。开初，在

上面，他在工作上还能得到当副部长的齐燕铭的支持；在学术界，他得到吴晗、邓拓、翦伯赞、郑天挺以及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金灿然诚挚地联系他们，他们都热忱地赞助中华书局的工作。吴晗是中华书局最热心的支持者。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当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被后来出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那位阴谋家称为“两大奇书”，逢人赞不绝口。狂热的所谓“大跃进”之后，便出现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米珠薪桂，食品紧张，中华书局为了开展工作，推动学术事业，常常约请学者专家聚会，工作午餐的费用，往往由吴晗以领取审阅费名义支付。吴晗又是当时各项政策的虔诚支持和执行者，1959年秋季，他提出一个倡议，要求有志于写作者来响应党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写一点东西。他说：“这一年，全民大跃进的一年。我写了十万字左右的杂文，预备出一本杂文集。编了解放前写的一部分杂文，题名《投枪集》，不久可以出版；整理了二十多年前抄的《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约三百万字。”确是如此，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在妻子袁震的协助下，校阅了这三百多万字史料，加了标点，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送请金灿然考虑出版。十分重视学术资料整理辑集工作的中华书局，立即欣然接受了。

1962年，我到中华书局工作，隶属近代史组。虽居“员外郎”，愧蒙一视同仁，给我安静的工作与学习条件。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替老编辑朱彦頔整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说来竟是意外，我与辰伯先生有缘。在读大学时，见到《在创丛书》出版，我不喜欢那《野玫瑰》，而爱看《由僧钵到皇权》。不久见到林同济教授，选了他开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离校后还听他讲莎士比亚，谈战后初露头角的萨特，并得知当年他约请吴晗写朱元璋的本意。我那时还在隐蔽的读书会的一次集会上，报告过阅读朱元璋传的体会。建国后成立人民出版社，我北来参加工作。1954年，为了发展学术著作，我奉派去访问吴晗。在六部口市政府的小楼上，我走完吱吱哑哑的扶梯，他便含笑伸手相迎。

（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手指好短呵！）他连声说：“我们见过的，见过的！”我告诉他，这是我第一次拜访他。他还说见过、见过的。我固执地说，这确是第一次。他说那是1948年在上海见过的。那年8月，他名列反动派的黑名单，在党的敦促下，一度曾到上海，打算绕道香港去解放区。我当时曾被通知去看他，记不清因何事而未果。他还是说，“记得你名字，看过你的文章！”他就是这样热情地对待年轻人！这次访问的结果，就是他选录了过去发表的十一篇论文，编成《读史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同时答应修改1948年出版的《朱元璋传》。我们中华书局近代史组，不时请他审读来稿，记得如《山西票号》等，他都采取积极态度，奖掖后进，提出中肯意见，从不冷漠对待。经过1957、1958年大风浪后，倒真是常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我还有幸担任他的书稿的责任编辑，真是难得的机缘。

那时我是“摘帽右派”，自觉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从不拜客访旧。每天从东城文化部宿舍到翠微路办公室，在两点一线上行走而已。读稿遇到疑问，就到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阅览室查阅《李朝实录》。那是个精神镇压的时代，善本书阅览室内甚为寂静。大约有一年左右，在那里常

相见的读者，是法源寺佛学院的一位青年僧伽，他在为编辑中华大藏经搜集材料。我专检阅《李朝实录》，核对原稿；还常在书中发现夹着白纸条，那可能就是三十年前它的第一位读者放置的吧？我们经常整天阅览，善本书室那位上年纪的女管理员叶同志，很给我与那位僧人方便，令人感谢。我们两个经常读者之外，来人甚少。记得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访问越南归来，来查阅某一善本。我青年时代听过他讲授形式逻辑，便起立低声寒暄了几句。我与法源寺和尚在此结成了朋友，颇富传奇性的小插曲是：1966年“狂飙为我从天落”，那位和尚被遣返还俗，到社办厂当保管员，还讨了老婆；我这个俗人则毁家出走，洗尽尘缘，云游四方，成了挂单的和尚。这是题外话，说真格的，那几年整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及随后改编和校勘《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成为我学习古籍整理的高等学校。在中华书局编辑部寄砚寄食的几年，由于那儿学术气氛的熏陶，使我经常感到自己的浅薄，无声地催促我去认真学习。那时物质条件和精神环境都很贫困，但是青灯黄卷，一编在手，宠辱皆忘。及今回首，由衷感谢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1964年，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要求，编辑《蒋介石言论集》，由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及近代史研究所派人进行，我也有幸躬与其役。那时，《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稿件排字顺利进行，校样按期送到，照顾我忙于《蒋集》，不过草草翻过，都由校对科对原稿负责。编辑《蒋集》工作，先在人民出版社进行，后因地方仄逼，天气炎热，又迁到翠微路中华书局来。我清晨到局，看见患脑病一度失去知觉的金灿然总编辑，偕夫人在院子里散步，他从远处能认人，举手示意，我衷心欢欣之至！那里晓得，天发杀机，一个折磨全国男女老少、扼杀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生机的大暴乱，已经在密锣紧鼓地策划中。

假借无产阶级名义，大革文化命之年，金灿然于1972年12月在北京去世。吴晗一家，于1967年初，从南长街被扫地出门，轰到城南一隅。1968年3月，吴晗被“四人帮”逮捕入狱；4月，袁震被送进“劳改队”。1969年3月18日，袁震被迫害致死。同年10月10日，吴晗被迫害致死，终年六十岁。更令人悲愤的是，1976年9月23日，吴晗养女小彦在狱中含冤而死。1978年春我回到北京，听说他们一家的惨状，我完全不能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中竟有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写到这里，我的泪水簌簌下落。我与吴晗非亲非故，更非友朋，像某个掌管过意得沃罗基的人所说，是个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的编辑而已。特别是对于小彦承受父母的灾难，受尽了折磨、侮辱而惨死狱中，我为我们全心热爱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感到羞耻！类比常常是不贴切的，我仍然想到俄罗斯大画家列宾画过的伊凡雷帝。这个1533至1584年在位的沙皇，据生动地描绘过他的传记作家比亨利·特罗雅说，他在俄国地主贵族无休止的阴谋中长大成人。目睹那些人残酷地对待自己同伴的兽行，他认为杀人和施酷刑就像性欲和祈祷一样给他带来快感。特罗雅还指出：每次处死一批人后，又可以看见他出现在教堂里，心情平静，态度虔诚。可惜特罗雅没有说明，我们不知道伊凡雷帝会不会写讲究格律、雅致而又豪迈的十四行商籁体（Sonnet）。

终于用得着引用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了。若依着林彪和“四人帮”那五六个人的用心，最好把天下的雄鸡统统掐死，严禁啼晓。但是，

我们的党终于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晨光喜人，大地春回。久受禁锢糟踏的中华书局又复苏了。编辑部通知我，要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编制一份完整目录；吴晗当日从郑麟趾（1395—1468）等奉命于1451年编修的《高丽史》中，摘取恭愍王、辛■及恭让王三朝（1354—1392）史事，作为史料的前编。同时，准备有关材料，请学术界人士作序。我昔年读稿和查阅原书的笔记，已与我的华年一同丢失了。当时我挂单于西城一座名刹，到北京图书馆很方便，查检原书第一函，只需两分钟时间，看看是否为根据太白山本影印的便成了。

睽隔一十五载，善本书阅览室已从西侧迁到东侧，室内空间较小。我查检书名、撰人、分类三种卡片，每个抽屉挤满夹满，不便检阅。我逐张审视，一个上午，三种卡片，翻查两遍，一无所见。我怀疑自己不够仔细，必有疏漏。翌日上午八时又去，又将三种卡片细查一遍，仍无所获。管理员已换了一位，我向她请教，她教我上楼去查。我到二楼目录室去查，仍寻不着。又回善本书室，翻看印制的善本书目，并无此书。我又去缩微胶卷室询问，那边告诉我，已缩二百来种书，没有此书。我又回到善本书室，和管理员攀谈，她毕竟年轻些，从未闻有此书。我枯坐思索，为这件小事去拜见领导人，似乎不当。静观颇久，只见一位老者，在室内踱步，我猜想可能是在此取书服务人员。我是新闻界出身，脸老皮厚，走上前去致意，拿出中华书局开给我的介绍信，说明我多年前前来馆查阅《李朝实录》，持续甚久，深蒙照顾。现在叶同志离退，阅览室搬场，“前度刘郎今又来”，何以查不出此书？敢请教。老者着我稍候，他允为我询问。大约只等了二十分钟左右，承他悄悄来告，说是为了“保密”，卡片抽去；但可对我照顾，准予借阅。我十二万分感谢，又想替屈死的吴晗表示感激。立即填借书单，附上介绍信；老者又去提书，十分钟后，蓝布封套的第一函就放在我的面前了。我打开看了第一册版权页，就慎重璧还了。

临去时，郑重向老者道谢，并烦转告有关人员：《李朝实录》于30年代之初由汉城帝国大学影印后，便是这入藏的线装本；1953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又影印复制《李朝实录》，凡五十册，封面黑色，洋装本，向世界各国公开发行。60年代之初，中华书局图书馆已备有此书。虽经动乱，幸未散失。中朝两国影印高宗、纯宗两代实录后，日本学习院又于1967年加以重印，补全了学习院《李朝实录》复印本。回观我邦，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闭关锁国，自我愚弄，我们难道不是已经尝够了苦果么？

1980年3月，中华书局终于能将搁压十多年的这部史料印制成书，供应读者，吴晗的遗愿得以实现了。吴晗是个热忱勤奋的学者，他以赤诚待人，用一句极其通俗的话说，“心中没鬼”。他以为也会被以诚相待。他研究朱元璋几十年，阅读和思考了浩瀚的材料，196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朱元璋传》，不论从内容、取材、结构、文字诸方面说，确是史传上乘之作。不过，学海无涯，知识的最深源泉毕竟还是生活，知之不尽呵！1957年，“反右斗争”展开，他跟着振臂高呼：“我愤怒，我控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59年，虔诚响应领导人建议，开始研究海瑞。黎澍在《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序言》中说：“因响应这个

号召而招杀身之祸，构成举世震惊的文字狱，忠良见嫉，情理反常。吴晗的悲剧就在这里。这个悲剧的动人心魄，使人深感遗憾也在这里。”

近几年来，人们仍在沉思所谓“文革”及吴晗等人大冤狱的形成，其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并进而探讨其文化背景。人们痛惜地忆念吴晗，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全传；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他的史学论著选集三卷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二册，此书之编录如此艰苦，遭遇如此离奇，其价值又如此不同寻常，既体现中华书局一贯重视学术事业的本志，又表现吴晗治学勤奋谨严的风范。“文革”十年，数不清的铺天盖地的红印刷物已化为灰烬，而吴晗辑的这十二册史料集，将像铁石建成的丰碑，流芳百世！

1986年8月千古文章未尽才
——聂绀弩《蛇与塔》读后

春日的一个午后，我从隆福寺又买到了绀弩的《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以前有过一册，借阅者爱而不还。携书回到单位，在楼道的布告牌上，竟见到了绀弩前天逝世的讣告。啊！一位从未被苦难压倒的高洁的战士，历尽了人世的艰辛，走过了漫长的荆棘之路，终于撒下他的读者们而远去不返了！

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三联书店印行的《蛇与塔》。大约一个月前，书店把一大叠书送到了他的病榻前，表示对他诚挚的慰问。他写的回忆录《脚印》，尚在排印中。可是，他没有等再次回顾留下的脚印，就从容地走了。

《蛇与塔》有过两个本子：40年代初在桂林第一次印过小册子，解放后在香港求实书店又出版过。这是有关妇女问题的杂文的辑集。读者会记得，还有《姐姐》、《两条路》、《旁听》、《酒船》等小说，都是从“五四”时代传下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民主思想的抒发。新编《蛇与塔》，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1979年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后写的，而且都是在卧病中以超常的毅力写下的。但丁被罗马教廷终身放逐，只在笔下写过炼狱；而绀弩亲身在炼狱中经受过许久的煎熬，目击了骇异的奇观，炼就了不屈的灵魂，一股凛然正气，化为许多惊奇瑰丽的文章。《蛇与塔》中所收的精彩之作，是其中的一种。

在旧中国，在封建的重压下，做一个人很苦，做个女人更苦。如果他在困厄中有了自我意识存在，那会格外痛苦。1940年春末，绀弩到桂林担任《力报》副刊《新垦地》编辑，正值有人喊喊喳喳地议论着女性。他就发动了一场关于女权问题的讨论，谈到女人的位置是否在家庭的锅灶旁，正如囚犯的地位在牢狱里；女人的幸福是否在找到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女人取得真正的平等，竟然是靠“特有的性的武器”，“以强迫男子就范”么？还有应否将过去男女不平等的种种结果，拿来作为论证今后仍应不平等的理由等等。后来编成《女权论辩》一书，绀弩在1941年4月所写的思想犀利的《题记》，被文艺界称为“‘五四’以来散文中难得的佳作”。

绀弩是以鲁迅为主将的战斗的杂文家队伍中的重要一员，也是鲁迅以后最有成就的杂文家之一。1983年，他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筹编《中国

新文学大系》续集的题词指出：

“杂文是‘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化战线上的一支奇兵，在鲁迅的旗帜下，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它已经、更要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坛上成为一种犀利而不可缺少的战斗武器和前途无限的文学形式。”

他对杂文这一武器和形式作了高度评价，并且为此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什。

在抗战时期，他歌颂为了保卫祖国的战斗而受难的妇女，为几千年的两性偏见而死亡的妇女，他说：“她的名字叫做：圣母！”他写出了颂扬女性的高大形象的《母亲们》。他所写的《论娼妓》，是一首热情而深刻的歌唱火坑莲的赞美诗！萨特的著名的《可尊敬的妓女》完全瞠乎其右。绀弩也不是无分析地表彰一切妇女，他指出：“妇女的品种比男的多。”他区别恶鬼和苦鬼，鞭打那些“一经由旧世界造成了之后随即变成旧世界的化身”的恶魔。鲁迅在1919年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绀弩在1940年写下了《怎样做母亲》。

通过复杂的妇女问题，他向读者揭示历史的真实：“中国受专制思想的影响太久，有些人往往对强暴者是驯羊，对柔弱者却是暴君。”他还指出：“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期，一是做稳了奴隶时期，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期。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思想，也只有两种：奴隶思想和奴隶主的思想。”

作为革命的社会批评家和优秀党员的绀弩，他对新社会抱着热情的殷望：“中国是个陈腐、衰老而又贫弱的国家，是个人民在国内国外的暴力之下辗转呻吟的国家，中国的人民的生命和身体毫无保障，尤其女性，更多为残酷的灾难所乘的机会。”“然而她们会在灾难中觉醒，起立，会和一切造成灾难的现状抗斗，未来的新中国，将不再只是男性的天下！”这是1947年2月写下的话。

尽管他怀抱的理想上面伤痕累累，他仍然坚毅地执着理想。1982年10月评论《检察长的眼睛》一诗时指出：“中国受封建束缚太久，生产不发达，文化不发达，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薄弱。人们把这种落后状况带进新中国来，经过十年浩劫而引起的全国性的封建沉渣的泛起：个人的和集体的违法乱纪，小人物在大力者庇荫之下的违法乱纪；大力者自己以及和庇荫有关的人们的违法乱纪，吓昏了严正的检察长。”但绀弩对我们很响亮地说：“不怕！”他指出了历史的必然：“那违法乱纪的势力无论有多么大，在整个国家面前总是渺小的。无论还能维持多久，在整个历史上都是短暂的。辩证法说：检察长的眼睛一定出现，而违法者们一定垮！历史反复证明了无数次。”

早在《阮玲玉的短见》中，绀弩就说杀阮玲玉的“是到现在还残存着的封建势力。”他不禁慨叹地说：“‘五四’运动没有完成肃清封建文化的伟业，封建的毒焰现在反有日见旺盛之势。”到80年代，他为读者讲解《聊斋志异》中的反封建思想时说：“其思想性都不出民主思想的范围。在‘五四’时代甚至以前，就该有人看出写出，但未见有人谈到。我虽然在十几年前就谈到一部分，但距‘五四’时代已差不多半个世纪。至于现在继续来谈，就更晚了。一面写，一面不免以自己的落后为羞。”这些文章也收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

究竟谁们落后，谁该羞？绀弩很好学，他是自学成材的典范。他在监狱中还“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其中于《金瓶梅》尤多费心”，笔记簿厚厚薄薄，共一二十册。多么高尚、坚强的灵魂！

我们少时喜欢看看名人，那时名人也让人看，有些人平易近人。我生也晚，第一次见到绀弩，是在一个大学的只能容十数人听课的小教室里。大约是1944年夏天，他在重庆一家报馆编副刊。关于文学问题，他讲了些什么，已统统忘却，只记得瘦削的高个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了的黄军服，也洗尽了黄埔二期生的仪态。今年4月7日下午，在八宝山向他的遗体鞠躬致敬。他还像平日躺着那样安详，一条腿支着（年来已不能伸直），取下了义齿的嘴张着，他还有话要向我们说呢。

《论语·秦伯篇》有云：“才难，不其然乎？”是的，千古文章未尽才！

1986年5月茨威格和他的《富歇传》

读过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人，都会感到深深的激动。高尔基1923年读了这个出色的短篇，特意写信给罗曼·罗兰，托他向作者转致由衷的赞赏。茨威格这位深受读者喜爱的德语作家，以创作中短篇小说而获得广泛的声誉，有些作品还先后被摄制成电影电视。

茨威格不仅在诗歌、小说和戏剧方面取得优异的成就，他的传记作品也脍炙人口。传记作品在他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早在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罗曼·罗兰》。这是我国译介茨威格的第一部书。但他的传记绝大部分还没有中译。

茨威格驰名于世之作是写人物生平关键时刻的五篇历史特写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1928年由德国莱比锡专门出版一流作品的海岛出版社印行。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回忆道：这本当初仅收5篇特写的小书，“收在《海岛丛书》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行量便高达25万册”，而且，“所有的学校都念这本书。”这本书后来再版时由5篇增至12篇，不但有《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还有描述歌德晚年痛苦的爱情、托尔斯泰悄然离家出走、列宁乘封闭列车赶回祖国等，西德费舍尔出版社1979年印了第十九版。60年来多瑙河水有涨有落，然而此书至今仍是西方青年最爱阅读的名著之一。三联书店前年2月初版印了7000册，在书市上成为抢手货。最近三联又将他的《约瑟夫·富歇》据俄文本转译出版，改题为《一个政治家的肖像》。这本传记含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至今读来仍具认识价值。

法国1789年大革命中出现过不少令人神往的人物，有两个教士出身的卓异人物却往往为人忽略：一个是塔列朗（1754—1838年），另一个就是富歇（1758—1820年）。前者以办外交著名，在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普时期，都任过高官。后者是法国警察组织的建立者，卓荦深沉，投机善变，能在动荡的1792至1815年间每一届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们都和拿破仑的权势联系在一起，被拿破仑重用，又为拿破仑所鄙视。拿破仑早就认识塔列朗，在策划夺取权力的雾月十八日政变前，塔列朗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建议。拿破仑知道他是一个毫无良心但极聪明的追求名利的人。只要有人肯买，塔列朗

会把任何一个值得出卖的人卖掉。富歇也积极为拿破仑效劳。在政变发生前，许多支持拿破仑的人都有一种天真的错觉，只有富歇看清了真正的拿破仑，这个“小伍长”正向极峰的宝座迈步。拿破仑既需要富歇，又看出他是个非常狡猾的阴谋家、大密探，不但会出卖拿破仑本人，如有适当的价钱，连他自己的亲爹也会拿去出卖。茨威格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掌握了深层心理学原理，在 1927 年写出了《约瑟夫·富歇》。这本传记译名为《一个政治家的肖像》，其实，富歇这个政治家与大革命中怀抱民主自由理想并愿为之献身的政治家是两路人。

富歇出生于法国南特港，他在修道院里学会了隐瞒自己思想的艺术，终生能控制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即使在激烈的冲动时刻也不例外。可能不是偶然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耶斯和富歇，全都出身于教会学校。茨威格指出富歇为人的特点：“不愿意永远地、矢志不移地同某个人或某件事联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都留有后路，保留改换门庭的可能性。他替教会效劳也是暂时的，不是彻底地献身给它，同后来对待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王国的态度并无二致；对天主，更别提对人，约瑟夫·富歇都不会立誓终身效忠的。”

在革命风云涌起时，富歇预见到第三等级即将成为统治阶级，他报名竞选国民公会议员，成了雅各宾党人。他看上去疲惫衰弱，实际工作精力非凡。不喝酒，不挥霍，情欲与他无缘，冷静得好像血管里不可能流着殷红的热血。他极善于控制自己，同时虎视眈眈地注意着别人的错误。他能毫不脸红地投向昨天的敌人，坚决践踏政治和道德的原则，群众和舆论怎么看，根本不在乎。他转身成为大权在握的警务部长，在各路要津都安排下密探，总在掂量手上的情报能换得怎样的好处，如何在各方面扩充自己的权力。他有一双很难捆得住的窃取权势的手，他帮助拿破仑取得皇冠，最后又从他那里接过逊位诏书。茨威格记述了富歇一生的经历，揭示了其人的内心世界。值得细读书中各章的记述和剖析，这里只摘引第八章一段话，便可以概见其卑劣的一生：

这奇峰迭起的 25 年，他经历了多么迂回曲折的道路走了过来：孱弱苍白的商人之子成了忧郁的、剃度落发的修道院教师，后来登上了国民代言人和特派员的高位，然后摇身一变成为奥特朗托公爵和皇帝的臣僚；最后，他再也不是臣仆，而当上了法国惟我独尊的统治者。阴谋战胜了主义，狡猾战胜了天才，他周围，整整一代不朽的仁人志士坠入了深渊：米拉波死了，马拉被刺，罗伯斯比尔、德穆兰和丹东上了断头台，他当特派员时的同僚科洛被流放到虐疾流行的圭亚那岛，拉法耶特被搞掉——富歇的革命战友，或死或销声匿迹，一无例外。

历史是多么丰富而严酷！它既培育出令人慕而仰之的仁人志士，却又产生了腐恶卑劣的无耻之徒。茨威格以细腻的笔触，精练的语句，着意刻画了富歇的丑恶的嘴脸，特别使我们感到内涵深刻的是卑劣心理活动的剖示。茨威格年纪比弗洛伊德年轻 25 岁，他却是这位大师的忘年交。他亲眼看见弗洛伊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和死神的搏斗。《约瑟夫·富歇》是用精神分析法撰写人物传记的典范，可又不是情欲主宰一切。

茨威格为什么要写这本传记？他在序言中说得非常明白，但愿人们

不再受这类人害：

“拿破仑在 100 年以前说过，政治已成为现代的毒瘤；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为了自卫，就得设法去看清隐藏在这一力量后面的人的尊容，从而参透他们藉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约瑟夫·富歇的传记能对政治家类型学作出贡献。”富歇这个 100 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好像还活跃在现代生活中。茨威格展示了这类人尊容的肖像，无疑提供了照彻这类人灵魂的宝镜。让我们认清坏人怎么坏，文笔之优美还在其次，大家来瞧瞧吧！

1988 年 8 月拿破仑的爱情和书信

叱咤一世的拿破仑·波拿巴，是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他在圣赫勒拿岛对随行的拉斯卡斯说过：“我的一生是怎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啊！”研究拿破仑的著作和资料，浩如烟海。在书信和文件集方面，首先有博韦、菲舍尔、凯穆瓦桑等以私人力量做了搜集、编印工作，前后共编十二卷。1854 年，打着伯父继承人旗号爬上皇帝宝座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接受编辑刊印皇朝创立人的全部通讯的建议，下令成立一个由瓦扬元帅领导的委员会，负责“搜集、整理和印行拿破仑一世有关公共利益的各类书信”，四年后出版了 1793—1807 年《拿破仑一世书信集》十五卷。1864 年又成立了一个由热罗姆·拿破仑亲王主持的委员会，出版了十七卷书信。前后合计三十二卷。在它的支持者 1870 年垮台前不久出齐。《书信集》包括敕令、军事命令、战报在内，计收函件 22067 件，揭示了拿破仑从土伦到圣赫勒拿岛的主要情况，立即成为研究者所必须根据的重要资料。可是，在法国国家档案馆 AF 组收藏的拿破仑口授信稿原件就达 3 万件以上。1853—1866 年间，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热罗姆及义子欧仁（约瑟芬前夫之子）还先后刊行了二十六卷书信及回忆录。

整理出版三十二卷《书信集》，花费了百余万法郎，还刊印了用于赠送的豪华版。英国著名史学家乔治·皮博迪·古奇拆穿了波拿巴派致力于出版新资料的用意：“除了对腓特烈大王外，对任何统治者都从未建立起这样一项纪念物。但是，这项工作的进行，不是为了历史科学的发展，而是为了皇朝的利益，很多极重要的信件都被删去。它自称包括了一切未曾刊印过，而又不是太琐碎没有刊印价值的文件，而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它的补编出版后，人们才看出这部巨著的编辑工作的不老实的态度。”（《19 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第十三章《拿破仑》）

拿破仑书信中的情书，是了解和研究拿破仑的直接材料中的一个分支，反映这个复杂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心态。所谓爱情，所谓信誓旦旦的诺言，如果拿他同一天写给约瑟芬和玛丽·瓦莱夫斯卡的信对照着看，对于这位震慑欧洲的新查理大帝，不过是和“民主”“自由”之类同样虚妄的概念。他在当权时曾对人说：“我不太喜欢女人，也不喜欢赌博——总之，什么都不喜欢，我完全是个搞政治的人。”政治和权力，是他一生热烈追求的对象。

约瑟芬的女儿奥坦斯在 1833 年发表了《拿破仑致约瑟芬情书集》两卷本，由巴黎迪多兄弟出版社印行，世称《迪多集》。原信中一切有碍

约瑟芬名声的部分，都被删除，使她的母亲成为举世无双的理想女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跟着德国霍亨索伦王朝一道倾覆，维也纳宫廷中流散出拿破仑秘密外交谈判的信件及致奥地利皇帝的私人信件等，其中包括商谈聘娶玛丽·路易丝的信件。1934年12月17日，在伦敦拍卖拿破仑于1810—1814年写给路易丝的318封亲笔信，成为轰动西方的新闻。结果为法国政府购得，经路易·马德兰辑注出版，这是唯一完整的拿破仑情书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政府印行了《玛丽·路易丝给拿破仑的信》，并从路易丝第二个丈夫奈珀克家购得路易丝和罗马王书信8000件。1968年法国作家安德烈·卡斯特洛刊行的《拿破仑传》初次引用了致波兰夫人的15封信，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注目。

1935年出版的马德兰辑注《拿破仑致路易丝书信集》，各件首尾完整，内容无缺，按日期编排。马德兰是法国学士院派拿破仑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以尊敬和颂扬的笔法来叙述拿破仑及其时代。1944年8月，在重庆的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过夏伯的中译本。

致约瑟芬的信则完全两样，一来至今还没有编订完整的专集；二来约瑟芬虽机敏、美貌，善体人意，但和波拿巴结婚前后，这个小伍长还没有表现出会有多大出息，而他所表现的“几乎达到了发狂地步的强烈的爱情”竟使她怀疑。她发现自己并不真爱他，婚后仍不修帷薄，根本不把拿破仑来信放在心上。她阅后往往随手一搓，扔在地上，被哈巴狗叼去玩弄一番，撕成碎片；有时干脆交由女仆拆阅。有材料说，他们结婚14年，只存下拿破仑250封信。1814年她去世后，人们发现不少信早已落入他人之手，有的被拍卖了。奥坦斯将残存的信编辑出版，其内容又改得面目全非，因而很难见到几封完整的信了。拿破仑情书中最著名的是他在第一次意大利战争中写给约瑟芬的战地书简，恰恰是这个时期的散佚甚多，有的仅能找到一两行，或仅片言只语。

在我国，1986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养冲、陈崇武选编的《拿破仑书信文件集》，这部书的前身是“文革”期间辑集和研究的成果，那时只印出了叙录性质的资料目录，侧重于政治事业和军事行动。其中所收致约瑟芬两信，实际都是击败奥军的捷报。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的《拿破仑文选》，是拿破仑本人晚年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时，由他口授而由别人笔录的关于几次战争的回忆，以及他的某些著作的摘要。近年武汉大学梅沱教授暨凯常先生等，从所能找见的34种法、英文著作、传记、书信集及其他文献资料中，辑译了拿破仑给初恋的少女、未婚妻、前后两个妻子及情人们的书信580封，其中有的出于尼尔松版《波拿巴的情书》，马德兰辑注《致玛丽·路易丝书信》，巴黎哈梯欧版《拿破仑一世，其书信、公告和宣言》，布罗汤尼、莱塞斯特各自所编的书信集，埃·霍华德选译的《拿破仑书信及文献选集》等书，像这样地辑成受信对象较多、内含较广的专题书简，在拿破仑书信集中尚属少见，借用某些史籍文苑传常见的套话：“呜呼盛已！”

手札情书，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件珍品。即便是出自虚情假意，矫揉造作，仍然不失为其人某个时刻的心绪照映。复杂如拿破仑，他的情书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戎马生活和思想情绪。将他写给不同对象的情书，例如写给约瑟芬，同时又写给玛丽·瓦

莱夫斯卡，按时序比照参看，可以看出他的诡谲，也可看出他的烦恼，对他就会有较深刻较贴切的理解。约瑟芬也懂得这一点，1803年11月13日，她给拿破仑的信中说：“信是心灵的镜子。”拿破仑给这些妇女的信中，常常反映了法国和欧洲若干历史事件的场景，也反映了他自身各个时期的情怀。

从拿破仑这些信札中可以看到：自古唯有情难尽。在拿破仑的字典里，权力是一切的一切。他的人生要义，就是必须挥舞手中的利剑，支配一切。不过，泰纳在《现代法国的由来》中把他描绘成披着皇袍的禽兽，说他认为原则、爱情、感恩和爱国主义都是毫无意义的，是一种恶意的攻击。其实，他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具有作为情人的角色所必备的丰富感情。权力和情爱不过是欲念的两个方面。1796年意大利战役中，展现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干，把人们对军功的追求同自由的热爱交织在一起，从而给意大利带来了新的生命气息；同时也展现了他的疯狂的苦恼的恋情。约瑟芬这个女人值不值得爱，是各人用什么标准衡量的问题，而且哲学社会学之类的法则都不适用于爱情的乐谱。即使每天要花许多时间处理战争及军事文书，却不妨碍拿破仑写出很长的情书，真像火山爆发一样，矢言对她的爱恋、专诚和渴望她的到来。与其说是出自一个新婚两日即赴前线的新郎之手，还不如说是一个在多边关系中角逐挣扎的情人的手笔。在信末，总写上给她千万个亲吻，吻到心窝的下面、再下面，甚至还表示吻她的哈巴狗“福蒂内”哩！罗斯因而在《拿破仑一世传》中说：“不知内情的人们总以为波拿巴是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人，哪知道这样奔放的热情，却出自他的肺腑。他的性格是有狂放、热情的一面的。有如月亮，它朝着太空的那一面，整个是坚冰一块，而朝着光芒夺目、炎威逼人的太阳的那一面，却是花岗岩浆熊熊翻滚。”这种狂热的爱情力量对他的指挥作战活动起着刺激推进的作用。罗斯接着说道：“无疑地，这种炽热的激情有助于在他的身上激发出惊人的精力，造成意大利战役即使在拿破仑战争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博利厄、维尔姆泽和阿尔文齐不是交战中的对手，而是对他那妨碍他获得爱情满足的讨厌东西。”他致约瑟芬的早年情书，在西欧常被选入语文读本中当作范文。虽然他很快就对约瑟芬的浅薄无聊感到厌烦，但也只有约瑟芬能适应他的生活。约瑟芬的感情未能形成一条专一的爱河，未考虑拿破仑的恋情对于她的真正价值。甚至就在意大利生活的后期，这只科西嘉雄鹰已在寻觅新的猎物，似乎已有越轨的行为，约瑟芬后来只得自怨自艾了。按当时社会风尚而言，在大革命的恐怖年代之后，及时行乐是新权贵们的人生信条，他们中间有的是色狼。相比之下，拿破仑热中于政治权力，重视官家礼仪和个人荣誉，战神马尔斯才是他的丘比特。他对约瑟芬以后不论怎么厌烦，总是余情不断。他写给她的许多信，在离婚后的最初几天，在续娶路易丝之后，在滑铁卢惨败后离开马尔梅松宫时，都流露出惓惓之情。他说过：“常春藤总是缠绕在它所见到的第一颗树上。简言之，这就是我的恋爱史。”这话里既有矛盾，也有实际。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其体魄想必是多种截然不同的构件拼成的吧？

从拿破仑这些信札中还可看到他的妇女观。怎样看待女性？这是一个社会、一个政团、一个公民的理性与文明的尺度。拿破仑在致约瑟芬、欧仁妮、路易丝等的信中，多次斥责女性的轻薄和巧诈。他泛指的一

般妇女，显然他的慈爱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的莱蒂齐亚，活泼可爱、尊敬兄长的妹妹波利娜不能排除在外。这很可能是由于他所亲近的妇女中浅薄无聊者居多，在他的宫廷盛会中出现的贵妇大多是没有灵魂的女人，其中浅薄轻浮之尤者莫过于他的约瑟芬了。他在信中痛骂过这个女人，“你是个卑鄙的家伙，非常蠢，非常傻。”“你这个坏心肠、卑鄙、残忍、专制、小巧美丽的怪物！”也正是这个约瑟芬，到死还萦绕着他的情怀，可见他又不能摆脱浅薄无聊。约瑟芬是十分庸俗的，除了衣饰、钻石、舞会、夜宴以及拿破仑所不反对的其他娱乐外，她什么也不想。如果说拿破仑曾经痴情地热爱过女人的话，那末，这只是比他大六岁的约瑟芬嫁给他的头几年的事。他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什么人，甚至连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在内，更不必说其他的女人了。巴黎悲剧演员乔治小姐颇能识透上流社会的闹剧，她谢绝充当拿破仑的玩物。拿破仑在战场上是深谋的统帅，在情场上则是个浅薄之徒。当他得知约瑟芬另有所欢，秽声四扬，他只是失去炽热的情感，而依然被她用一串串泪珠缠绕着。很明显，关键不在于约瑟芬的浅薄无聊，而在于这个拿破仑很需要浅薄无聊——这是西洋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普鲁士王后路易莎，可说是拿破仑时代欧洲出色的女性之一，她爱国、美丽、有见识，为了丈夫和臣民，尽力掩盖自己对拿破仑的厌恶，鼓起勇气和他周旋。拿破仑对她的仪容风度也十分叹服，但他意识到这个妇女是他奴役普鲁士的严重障碍。他曾屡次在官方报纸上侮辱她，把她画成一个身披铠甲的悍妇，领着她那一群人策马狂奔；最后则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她清白的名誉。昔日普鲁士的自豪感也没有抵销她受到的屈辱，不久便饮恨而死。

也许这只是个附属国的女人罢了，那末再看他如何对待同时本国著名的女作家斯塔埃尔夫人。她以精辟地评论德国精神生活的著作而名重一时。她出身于名门望族，并不一般地反对革命，只是温和的吉伦特派同情者。但她的贵族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却使她长时期不能见容于拿破仑。丹麦文学史家格·勃兰兑斯说过：“女人作为自觉的有才智的人在文学中出现，是她作为天才出现的第一步。我们已经看到斯塔埃尔夫人的头巾在天边出现了。”勃兰兑斯称她为“这个和男人一样有热情并参加了斗争的女人”。使全欧洲震慑、为许多国王跪倒膜拜的拿破仑不得不说，任何人在和斯塔埃尔夫人谈过话后，对他拿破仑皇帝的看法就差了一截。他派人去了解她到底想要什么，如果把她父亲过去交给财政部代管、如今仍被错误扣留的 200 万法郎发还给她，她是否会感到满意。不料她只回答说，这不是她想要什么的问题，而是容许她怎么想的问题。这个有教养的妇女，主张文学作品必须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上和历史上的真实，被文学史家称为“文学批评上的孟德斯鸠”。她的才智使拿破仑感到恼怒。塔列尔在《拿破仑传》中分析道：“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有人说，拿破仑千方百计地迫害斯塔埃尔夫人，不仅因为她具有自由的思想方式和反抗精神，这些他还能够原谅，而且还因为她是聪明而饱学的，他认为这个品性对妇女说来是不成体统的，他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这种品性。”

照此看来，无怪乎约瑟芬是他所眷恋的，怎么失德也不会使他生气。原始材料和传记作品都一致认为，拿破仑不是轻松地愉快地决定离婚的。

他是为了帝国后继有人，千秋永固。18岁的玛丽·路易丝公主，她爸爸弗朗西斯二世就把她看作是拿破仑手中的小木偶，幸运的是替皇帝生了个儿子。拿破仑给她的信中最常见的话是：“我身体很棒。”“诸事顺利。”没有真情实况。他教路易丝出任“摄政”，是拿破仑二世小罗马王的摄政，是巴黎宫廷中一个高贵的摆设而已。

拿破仑告诉约瑟芬：“我的愚见一直认为：妻子是为丈夫而设置的。”又教训她：“你该说：我的光荣寄托在丈夫的幸福上。”“你该说：我的光荣寄托在子女的幸福上。”很逗，这近似中国封建礼教“三从”的要求，“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妇女应该屈从于男权。女性由于依附男性而获得存在的价值。他在意大利利用当地民俗对约瑟芬进行思想教育：“有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人们到晚上十点就各自回家。在那里，妻子给丈夫写信，思念丈夫。人们为丈夫而活着。”

当拿破仑大帝国处于强大、光荣的顶峰时，唯一的缺憾是约瑟芬已不能生育。奥坦斯和路易·拿破仑生的小拿破仑又夭折了。野心勃勃的兄长约瑟夫生的又都是女孩，而他本人为王位继承问题经常与拿破仑吵嘴。拿破仑在杜伊勒宫接见约瑟夫的下属时有一次愤愤地说：“我并非一定要有妻子才有继承人的。我大笔一挥，孩子就有了。”大笔哪能代替肚子？卑躬屈节的大臣们请求陛下为帝国的前途而另娶一位妻子。结果奥地利公主实现了他多年的渴望，这位日耳曼洋囡囡由于生了小罗马王而更为尊贵了。议院懂得谄媚，一岁半的储君即举行加冕典礼，祈望国运长久。母以子贵，拿破仑非常注意她应有的荣耀，连旅行车队辆数、扈从人员构成和所携餐具，都在信中亲作安排；这和要求约瑟芬在巴黎只能去四个大剧院，并应在皇家专用的包厢里看戏一样，信中指出：否则“跟你的身份、地位不相称”。宫廷里装饰得如同仙境，满身珠光宝气的男女贵族廷臣沉溺在奢华的舞会与筵席上。这都是大帝国的华丽外衣，活动装饰。妇女是永不间断的节日里的不可缺少的道具。梅特涅曾任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外交大臣和首相。他说：“在拿破仑的极盛时期，我就一直看到他，研究他；在他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也一直看到他，注意他。”就是这个老练的奸雄，力主把路易丝送到巴黎去安抚拿破仑。梅特涅与拿破仑一道登上那个时代的舞台，从旁看拿破仑：“在他的嘴里从来没有对妇女说过一句文雅的、或者甚至措词恰当的话，虽然他的脸色和他的声调往往显示出他想尽力说上一句……”

他圣赫勒拿岛上口授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充分明白地道出了他的妇女观：“妇女是给男子生育子女的。妇女是我们的财产，但我们不是她们的财产；因为她给我们子女，我们男子却不给她什么。所以，她是他的财产；其理由正与树木是园丁的财产相同。也正为这个理由，所以一个单独的女子，是不能满足一个男子的欲望的。当她生病的时候，她就不能做他的妻子；当她没有能力再为他生育子女的时候，她就不能做他的妻子。男人的欲望，是不会因为年老及随便什么不便利的原因而止绝的；所以一个男子一定要有几个妻子。”在拿破仑时代，尽管人们早已响亮地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妇女不仅不能享有选举权，连靠劳动挣得的工资，还法定应交由丈夫支配。拿破仑关于女人的荒唐概念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里不由得想到 1804 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那正是在 1799 年执政官制度确立后开始草拟的，第一执政拿破仑和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亲自参加了该法典的制定。康氏原是《国民议会法典》的起草人，对编纂民法典具有丰富的经验，而拿破仑本人的积极参与，对该法典的顺利草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枢密院审议草案时，拿破仑积极参加，大大地影响和决定了很多条文的形式。经过征询各法院意见，而后分为三十六个单行法由议会通过。在拿破仑帝国建立后，被综合成《法国民法典》，于法国革命纪元十二年风月三十日（1804 年 3 月 21 日）最后通过。1807 年和 1852 年，先后两次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拿破仑十分得意地说：“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四十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法典对于巩固大革命成果，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后来对许多国家也起了示范作用。但是，1789 年的革命者曾大力提高妇女的地位，而拿破仑则力图贬低妇女的法律地位。该法典规定新娘必须在结婚典礼上重述服从丈夫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和亲子（女）关系上，该法典规定夫（父）是一家之长，按第 213 条规定：“夫应保护其妻，妻应顺从其夫。”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在夫妻共同财产制方面，丈夫不仅有权管理共同财产，且就对第三人关系而言，还有权作为共同财产所有人。妻子依法没有行为能力，绝对不能自行处理她的财产（第 142 条以下）。在离婚的法定原因上，保护丈夫在共同家宅之外与人姘居；在亲子关系上，只是父亲有权行使亲权；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大大低于婚生子女。所有这些歧视和压制妇女的规定，都用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掩盖着。该法典在亲属法方面显然较之大革命时期的立法后退了。我们用他制定的法律语言来对照他在书信中写下的甜言蜜语，不是很值得玩味和思索的么？

1807 年 5 月 15 日，在关于女子教育的一封意见书中，拿破仑明确地要求：“在女子公立学校中，宗教是第一要事。不管人们会怎么说，宗教是母亲和丈夫的最可靠的保证。我们对教育的要求不是女子应思考，而是她们应信仰。妇女头脑的薄弱，思想的不稳定，她们在社会所占的地位，她们需要永远顺从……所有这些只能用宗教、用温柔慈祥的宗教来对付。”虽说年老的教皇被他从罗马拘留到枫丹白露来，宗教却仍是可以利用的助手，拿破仑说：“我要它造就的不是妩媚的而是贞淑的妇女。”“必须从极其严格的宗教教育入手。”女子可以学点历史地理，但无需学习外语；她们尤其应做大量的针线活。

在为愚弄人民而设的议院里，拿破仑还公然宣称：“丈夫应有绝对的权力，去干涉他妻子的行动。”拿破仑利用富歇建立了秘密警察制度，又设置直接指挥的特务去监视秘密警察。他又用无休止的战争在国内外发挥绝对的权力，何止要干涉妇女们的行动，还要去干涉全欧洲人乃至东方各国人民的行动。贝多芬曾经要将《英雄交响乐》献给拿破仑，但当他知道这个拿破仑从一个公民变成了皇帝以后，立即决定不把这部壮美的交响乐献给独夫。社会历史不会在利剑之下停止前进，1970 年 6 月 4 日，法国以法律废除了丈夫为一家之长的规定；1972 年 1 月 3 日，通过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地位平等的法律。如果将拿破仑的若干情书来与历史书籍对读，那可能引发的思绪不止于以上所说了。

我从拿破仑的爱情与婚姻，谈到拿破仑书信的激情与诡谲，还讲到与法律及历史的对照，未免为发思古之幽情的陋习了。鲁迅在 1934 年写过题为《拿破仑与隋那》的杂感，其中说：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我唠唠叨叨地谈拿破仑，完全忘却了鲁迅先生的教导。《世说新语·轻诋》有言云：“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罪过、罪过！

（《拿破仑情书集》，梅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89 年 6 月李乔的《中国行业神崇拜》

读了李乔同志的《中国行业神崇拜》，我叹服他辛勤的劳动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写的人，真是万物之灵长，哪里有什么上帝造人，历来都是人在造神。我所执的业是读稿，这种行当可谓五味俱全，颇多苦趣，但读李乔的这部书稿，却别有滋味，觉得是我近年来所读中青年书稿中的优秀之作。

关于中国行业神崇拜问题，这部近三十万字稿中，分两篇加以讨论。上篇为这一问题的概论，研讨行业神的含义特征，形成经过，崇拜目的，敬神活动等等，并略论其在历史上和民俗上的价值。下篇为按行业的分述，将俗称三百六十行划为十七大类，分别叙述了一百四十个行业所崇奉的神祇，真是言之凿凿，洋洋大观，读来感到是很有功力的作品。作者为这一论题进行相当周密的思考，付出十分艰辛的劳动，写成的这部书稿，标志出作者的实际学力和成熟程度。我将此稿看作是十年来民俗学复苏后的难得的可喜收获。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说过：“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话、市语，自己供奉的神祇。这种种神灵，是现实和奇幻的结合，作为各该行业所应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的精神监督力量，起团结、约束和教育从业人员的作用，在中古的行会中，同时也有为雇主管制雇工的作用，造神的意义主要在这里。

作者的分析值得注意，书中说明行业神分祖师神和保护神两大类，而探讨的重点在于祖师神。至于对祖师神的崇拜，仍有区别性的说明，即确有创业之功者不一定就被作为祖师加以崇拜，这样的论述就精细入微了。同时，还说明了祖师的“神性”与“人性”，从而指出神灵崇拜的起源与社会意义。《周易·观卦》尝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在本书中，所谓“圣人”则是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工商业主，是他们创造并认可了这些神。这一部分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叙述；而是分几个层次来论述，于此可见作者运思的细致。

孔丘是个博学、切实的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有四

不说：“怪、力、乱、神。”《论语》里记述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起，原始人将某种动植物当作本氏族的保护者。最早的宗教信仰中，神祇的观念就是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而演化，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不断以人格化的方式在人们头脑中作出各种虚幻反映。在我国古文献中，《尚书》的释文认为：“天曰神，地曰祇。”而《周礼·春官·大司乐》注，又说天神是指五帝及日月星辰。适应社会生活各方面各层次的需要，造神封神越来越繁杂。鲁迅排遣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时，写过《五猖会》和《无常》，津津乐道童年的见闻与欢愉，引人神往，而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却不禁两次写道：“吁！鬼神之事，难言之矣。”

对于“难言之矣”的鬼神之事，李乔以颇为细密的剖析去说明行业神的特征，比如行业神有其庞杂性、行业性、虚构性与附会性，他接着便分别说明这四性的情况，但又不止于叙述表象，还进一步解释形成四性的原因。例如既说明行业神以虚构和附会为多，又说明何以虚构与附会者居多，还指出从业者心目中则不认为是虚构与附会，而当作是真实可信的。所谓“信则真，诚则灵”，神道与宗教信仰的主要支柱便在这里。书中阐明了行业神崇拜的精神实质，这就是民间对一些神祇之所以奉若神明的心态。作者的论述确是颇为细密的，我以为可以从若干传统节日习俗的形成得到反证。汉族不少节日活动的观念，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有些盛大的节日的形成，联系到著名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可又并非准确无疑。寒食节之与介子推，端午节之与屈原、伍子胥乃至曹娥，中秋节之与元末农民起义，重阳节之与费长房等等。在严肃的考据家看来，都属荒诞不经，缺少确证；而民间大众乐于接受这些附会，觉得倒也切合情理。人们有幸见过不少勇士挥舞铁扫帚，但至今未见伟大者站出来号召打倒清明节、打倒中秋节，与此不无有关吧。荒诞的构想丰富了节日的内涵和情趣，神喜人欢嘛！

书中接着写行业神的随意性、含混性的特征，继续贯彻上述的思辨，仍用一层一层讲论的笔法，说明二性的表现，再说何以具有这二性。“翁云何用知许事，但愿神欢乞神庇。”只要有个神来庇佑就得了。书中还把行业神崇拜与民间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论述。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通过民情风俗表现了它的力量。行业神的形成也是它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渗透的具体表现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在我国盛行的道、佛两教的作用。还应附带说一句，儒家文化与封建礼教的影响，当然也不应忽视。

读了本书的上篇，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的论述方式，不是开中药铺式，不是“而”字式，也不是一根杆子戳到底，却是由表层逐步展开到深层，一层又一层的剥笋式。这就避免了论说文的常见病：揪耳捏鼻，生吞硬灌；而它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事理，读来引人入胜，饶有兴味，显示了作者的思辨精神和驾驭材料的能力。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优点。很可惜，却有不少作者不善于说理，而只将结论硬塞给读者。书中讲造神的根据，行业神的形式，又联系到通俗小说和神话所起的推波助澜、启发成全的作用，都用这种笔法。进而论及行业神崇拜的原因、目的与作用，崇拜的活动，敬神活动的发展，都从各个角度去考察，而不流于简单化。最后写祭典、赛会、场所、神马、禁忌等等，既有循着历史发

展线索的观察，也有现实状况的相当具体的描述。这都不是泛泛之谈。有些行业的赛会是很豪奢的，所以鲁迅说过：“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五猖会》）全书上下两篇，上篇提契全局，综论造神崇拜的缘由作用，剖析说理，以统率下篇分论各式各样的神祇。这是本书构想成功的地方。

虽说上篇为剖析说理，却不是过去一度风靡论坛的以论代史的手法，不是用几个概念来罗织推理，而是每个论断都有材料根据，且非单文孤证。下篇便呈献材料，从而展示各类行业的神祇。我读下篇，好像走进行业神的陈列馆，一座座神灵，千姿百态，煞有介事地岸然高踞，仿佛真的统管一业的兴旺发达。作者便是陈列馆中的讲解员，听他娓娓道来，挤眉动眼，如数家珍，情趣盎然。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留待读者的慧眼去做客观的检验。

读李乔的书稿，有愉悦也有感触。通观全稿，没有连篇空话，没有吓人的大话，没有令人迷惑不解的词儿。尽管探讨的是行业神，都在虚无缥缈间，或在牵强附会中，然而，所有的神祇，都言之有据，有材料支持论点，凭着一件件材料说话。虽属不经之谈，荒诞无稽，可是一个个有根据，有来源，有书可证；其中有些材料，不光是从书本到书本，还有他自己的实地观察。不论分析解说，单讲把这些行业神一个个揪出来，介绍它是何方人士，哪路神怪，如何被制造加封，怎样发展崇拜，必须切实查检群书，找出根据。这就应如顾亭林所说，自出己意，“采铜于山”，而不能“买旧钱”“以充铸而已”（《与人书》十）。不谈一时充斥于摊头的秽乱下贱、非“打”即“脱”之作，即在某些貌似知识性学术性作品中，不乏只靠几种大陆旧籍或港台新书剪辑抄撮而成。甚至个别所谓翻译，不过是将前人旧译改头换面而成，有的竟然在他人旧译本上略改字句，便作为新译送到编辑部来了。在经济大潮的激荡下，某种人的桂冠，往往是攫取他人的绸缎或用红红绿绿的票子糊成的。李乔却完全比不上那些聪明的大马扁，他质朴老实，只在学术领域中一点一滴地做功夫。据人见告，他在业余撰写本书时，真是茹苦含辛，在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中振奋不懈。祝愿他继续保持务实的学风和诚实的生活态度。这本书当然绝不是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著作，不过是一本关于民俗学的学术性资料书，然而它不掺水掺杂，不弄虚作假，没有大队新词的游行，不以莫测高深来掩饰言之无物。它切实、具体、严肃，治学不负务实人，这是一次可喜的收获！尽管文化学术界的沙化面积日见扩大，我仍是从务实的中青年作者中看出了希望。

关于行业神的崇拜问题，有好多方面值得探索。造神封神，各式神祇，都是为造神者办事的。行会组织亦称行帮，英文音译为“基尔特”，是封建社会城市中的同业组织，有手工业行会和商人行会（商会）两种。这两种行会，是封建社会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为团结同行，笼络职工，限制竞争，规定生产或业务范围，解决业主困难和保护同行利益，由同业或相关行业联合组成。造神封神，作为同行的旗帜，或者说，等于某个氏族的图腾，某个阀阅之家的族徽罢了。在欧洲，10世纪前后出现的手工业行会，最初是师傅们的组织，14世纪间才出现帮工行会。在中国，隋唐时代城市中有行，宋代有了团行。明清时代更为发达。这些行会的种类和数量，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达而增

多。行会订有行规，有共同崇拜的神祇。行会的多寡和敬神活动的盛衰，常在会馆、公所及庙宇的碑刻中留下记载，为研究该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可在行业神崇拜活动中见到经济发展的踪迹，因为行会在反对封建主压迫和促进工商业发展过程中起过作用。不过，行会多为雇主、豪商所掌握，所制定的行规、业规以及公议条规等等，不仅规定经营范围，维护同行利益，成员应遵规则，同时规定产品规格价格，保持传统惯例，雇用帮工待遇、劳动条件和学徒制度。各式神祇在他们中间起着精神宪兵的作用，违则处罚。那些香烛纸马不是白白烧掉的，遇有同业纠纷、伙友争议、违章事件、本业习惯等等问题，神要充当仲裁的角色，要在神祇面前解决。由于行会本身带有封建垄断性质，神祇的迷信也是雇主雇主施展花招的掩护，在商品交换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行会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箝制和压迫帮工的工具；行会崇拜的神祇便成为愚弄帮工的帮凶了。在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悠久、古老而又落后的农业国，行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限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组织，行业神便产生和活跃在这片辽阔而深厚的土地上。这些千奇百怪的行业神的存在，不正可以说明这片土地里萌生出怎样的思维方法和弄神弄鬼的思维习惯啊！行业神有灵，能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行业神崇拜的研究，我以为，还有不少层面值得去继续探索。

我读过李乔同志的原稿，在排出清样后，他又要求我写篇序言。我自愧不是这门学科的专家，也没有权力地位的支撑，提笔写序是很僭越的了。然而我历来是个好事之徒，一向喜欢努力耕耘、自重自爱的人。出于情不可却，只得提笔伸纸，可是写起来又没完没了，为什么？因为我抑止不住衷心的喜悦，我为学苑的新收获而喜悦，我为务实的治学者而喜悦。谓予不信，那么，还是由广大的读书界诸君终审，——请！

1989年12月“吕思勉现象”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学术著作的遭遇，大致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所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与以酥胸大腿为重点，以侦探杀手为中坚的所谓“大众文学精品”，完全不配相提并论。即使有幸挤进书市，也不免遭人白眼。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混乱里面还有例外，仍然有人在庄严地工作。那种执着追求学术的精神，区别读者层次的认识，令人肃然起敬。吕思勉史学著作的整理出版，就是一项值得注意的学术文化活动，在近年金钱的激浪中未遭灭顶之灾。试向社会学家们效颦，我想称之为“吕思勉现象”。

吕思勉（1884—1957年），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辛亥革命后曾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后，执教于沈阳、苏州和上海等地。从1926年起，长期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教授。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回常州故里，在附近游击区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仍回上海光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解放后院系调整，到华东师范大学任一级教授。

据了解，吕先生从23岁起决心献身于学术事业，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50年间反复阅读三遍，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他又爱

好广泛阅读报纸杂志，十分注意当时从国外不断引进的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50年中，先后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和其他多种史学著作。毕生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如早年所著简短的《先秦学术概论》，言及兵家之书称：“《六韬》及《尉繚子》，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惟言用兵之理者较少耳。”在他谢世15年后，1972年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4900多枚竹简中，《六韬》、《尉繚子》与《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共在，长期以来关于这几部书的一些悬案得以澄清，不仅对于吕先生个人，而且是我国学术研究上的一件大事。

吕氏所著两部中国通史，即《白话本国史》，1923年商务版；《吕著中国通史》，开明书店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后者写成于抗日战争期间，最后一章为《革命途中的中国》，他用“大器晚成”一语预祝祖国前途光明，其后云：“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他借用英国诗人拜伦诗句作为全书的总结：“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这是对于当时践踏着几乎半个中国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抗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意到吕思勉的强烈爱国主义倾向，胡绳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与出版》杂志的文化评论中曾加赞赏；1956年11月他所写《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一文，又指出吕氏《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版）小册子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示了赞成的态度，同时也指出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这篇论文后于1962年还收在论文集《枣下论丛》中。

这里回到“吕思勉现象”的话题上来，吕氏的高弟杨宽在《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中说：“在现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他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的一位，又是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位。”毋庸空言泛论，且看近年重印出版情况：

先秦史	一九四一年开明版	
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版	15.75 印张	
吕思勉读史札记	新编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版	41.605 印张
秦汉史	一九四七年开明版	
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版	27 印张	
两晋南北朝史	一九四八年开明版	
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版	48.875 印张	
隋唐五代史	一九五九年中华版	
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版	45.25 印张	
中国制度史	一九二九年中山版	
一九八五年上海教育版	26.5 印张	
文字学四种	一九二六年商务版	
一九八五年上海教育版	10.625 印张	
先秦学术概论	一九三三年世界版	
一九八五年大百科版	5.125 印张	
中国民族史	一九三四年世界版	
一九八七年大百科版	7.875 印张	

论学集林	新编
一九八七年上海教育版	10.625 印张
史学四种	一九三四、四五年商务、永祥版
上海人民版	8 印张
理学纲要	一九三一年商务版
一九八八年上海书店版	8 印张

从 1982 年至今，可见已陆续出版了七百万字左右。吕氏著述，远不止此，但就近年学术著作的命运而言，这却是个很了不起的数字！我所指的“吕思勉现象”的形成，首先应该感谢上海出版界几个单位的鼎力支持，没有他们的赤诚相助，就不可能有上述十二种学术著作面世。我不能了解他们因此而盈亏的数字，这里用得着说一句豪言壮语：不算经济账！另一面还有吕氏史学论著编辑组的辛勤努力，杨宽先生主持其事。吕氏女公子、费定《早年的欢乐》译者吕翼仁（笔名左海），在其间奔走联系，更为一个促进因素。这也符合我国自来的编辑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皆是门人弟子或子孙、宾客参与撰定的。

近几年来，颇有一些出版者（包括其支持者），热中于反复穿行在刀剑、裤裆之下，乐此不疲。“吕思勉现象”的出现，我不免想起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言中所引爱伦堡的两句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我依然是个乐观者。上海编辑出版界鲜为人瞩目的“吕思勉现象”，使我深信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正在创造中的现代文化，肯定是会得到继续发扬的！只有学术著作、严肃文化（包含“吕思勉现象”）在出版物的总体中稳固地占有一定的比重，才能反映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知识文化水平！

1989 年 8 月文化的解说与追求

金克木教授所著《文化的解说》一书，尚不足 5 万字，小 32 开本 100 页挂零，读来却觉得意味不尽。陶潜《饮酒》诗有句云：“少许便有余。”我想借用来表达我读后的感受，因为由此体察到什么叫做“少许便足以对人多多许”。

文化是无声的语言，文字也是无声的语言。文字是符号。文字联贯成语言仍是符号，语言所说的事件还是符号，因为其中意义都是不可直接见闻的，是借文字语言而传达的。事件中的人和物仍可以是符号，其意义可因时因地因人而变换。那末，我们能不能用理解语言或者说解说语言的方式解说文化呢？作者回答道：“除专门研究符号的符号学以外，从哲学上或美学上或宗教学上研究各种符号和象征，在当前世界上正是热门之一吧？从这一角度来解说文化大概是也快从冷门转到热门了吧？”作者接着说：“不妨试试看。文化不能离开人，但我们可以把人放在意义一方，而把考察对象放在符号（现象）一方，看各种文化现象符号指示人的什么意义。人总是社会的人，文化也总是社会的文化，所以这样解说文化也可以说是解说社会。”

“试试看”是谦词。作者用符号学原理说明社会文化现象，事无大

小，通俗明了，而又生动活泼。例如他说：

从前人婚嫁不是看本人，只看生辰“八字”。仿佛“八字”是人的符号，其实是把人当作“八字”。“八字”便是人。“八字”是实的，人是虚的。有时嫁妆便是人，或则聘礼便是人。人不过是门第之类的符号。……称呼人往往称职位，因为他不是人而是职位。甚至谈恋爱也讲条件，因为人只是条件的符号。对象不过是身份、地位、财产等等的符号。

以上寥寥几笔，就把封建婚姻的精髓和时下说爱的奥妙道破了。用符号学来研究文化，诚然自有道理。

从18世纪中叶发表《美学》两卷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起，到本世纪初发表《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都曾程度不等地将艺术现象作为一种语言和符号现象加以研究。将符号学原理扩大到整个社会文化的研究方面来，则是晚近的创造性表现。山不在高，文不在长，本书是有关这方面探索的新收获。

在第一节如何解说文化之后，下四节，分别讨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涉及科学、哲学、艺术，宗教信仰，世界思潮，可以看作是全方位地探讨了文化问题。文化概念在拉丁语中最初的含义，是耕耘、培养、发展、尊重。文化体系包括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具有高尚理想和高度价值的高级境界的智能结晶。本书指出：一国文化之与外来文化积极沟通，使之日益接近世界潮流，是其发展的总趋势。

对于文化问题的解说，我感到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提问，二是比较。既是运思的轨迹，也是行文的路数。僵化，就提不出问题；禁锢，就无从做对比。每个文化实体如此，每个文化研究者也是如此。能提问，表示在思考；敢比较，表示在追寻。这不到5万字的小书，古今中外，南北西东，内含比它的体积大无数倍。通篇是活泼泼的，嘉言警句贯穿其间，引人入胜，益智开窍。

作者满腔热情地希望文化发展。他说：“不怀疑，无问题，何来思想？无思想，何来科学、哲学、艺术？无科学、哲学、艺术，谈什么文化？那就只有检别人现成的了。可是文化乞丐是当不长的。”他把希望寄托于新的发展与建树。“世界文化还没有老，还能不断产生新思想。中国文化有点老态，但还可以‘返老还童’。”

在第1页和末尾第103页，都可看到有一位白发老人在思考，在细语。在白发覆盖下，迸涌青春思想和青春的语言。这显然是作者的自况。我向爱智者推荐：请听一位白发老人吟唱追求新文化的青春之歌！

1989年9月日本的月亮

两位作者以其留东勤工俭学时所写散记示余，并自题曰《日本的月亮》。所记虽是个人的艰苦奋斗的经历，应该了解的生活琐事，都是在日本月光朗照下的漫记，这本小书的书名却多么清新脱俗！

这撩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又惹出了一缕幽思。我心中藏有不少扶桑的月夜。那是月明之夜，我们几个人谈笑着在银座漫步。天上的月华，市街的电光，把簇拥着的人群在繁华中融合在一起了。一个月夜，在横滨港口花园的高阜上，看着进进出出的商轮在月下忙碌着，货物丰足的

海港啊！在上野公园的小径上，月光照着短命的樱花残瓣，美的命运如此短促呀！在市内的日比谷公园，月光洒在惨绿的草地上，教人想起不可一世的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的葬仪曾在这里举行。在伊东温泉临海的暖香阁上，看海上生明月，细浪轻轻地拍打岩岸，伴着远处传来三弦的幽怨。在大矶，碧海松风，伫立岸边眺月华，不知人间天上。天秋月满，在修整坦平的隅田川岸边散步，悄然无声，然后走上 Y 形大桥，凭栏四顾，灯火明灭，不信闹市便在不远处。难忘的扶桑月！

可是，也不过半个世纪吧，同样的一轮明月，她曾照过一大片一大片废墟，照过饥饿与困穷，照着孤儿寡妇的一串串眼泪。她还照过勤劳的阿信的面庞，也照过我几位朋友少女时代枯黄的小脸。还是那明月呀，何以映照出迥然相异的境界和情思呢？

我不能不想到我们自身，我们热爱的祖国，中国的月色多么明亮温柔。从 1900 年起，一浪一浪的留学潮，男男女女学生们，飘洋过海去寻找济世救民的方策，不幸大都被历史老人无情地践踏了春青和芳华，或者被衰朽势力改铸成穿着洋装的仆从了。

现在睁眼看去，五十年岁月又成为过眼烟云，胜利者的月亮和败战者的月亮不是同一轮明月么？空说什么“弹指一挥间”！这一挥，挥去了多少人的青春，多少人的生命；这一挥，召来的是说不尽的苦难，令人发指的残酷！在异国打工向学的这对作者，对生养她们的祖国怀着拳拳的心，惦记着国内千千万万勤劳而又诚朴的劳动大众。日本的月亮固然美，然而，“江山虽美非吾土”！

中国的月亮自古以来也是美丽动人的，中国勤劳勇敢的百姓们，比月光更美丽。异域的生活，使她们对祖国对人们的爱更深沉。读她们的文稿，希望中国的月亮照映着花好人和，繁荣昌盛；一天劳累之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温馨恬静的月夜。

这是她们的愿望，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且朝前看吧！

1990 年 2 月海明威在中国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圣地亚哥的这一名言，曾经激励过无数读者。在美国现代文学家中，以描写硬汉性格著称的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确实备受我国读者的欢迎。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杨仁敬教授新著的《海明威在中国》，详尽地论述了我国译介和研究海明威作品的情况，对于理解海明威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手法及其影响，会很有帮助。书末附有海明威作品中译本目录，我国研究者的主要学术论著索引，既反映海明威的作品在我国引起的广泛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本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然而，这还不是此书的特色。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本书详细地介绍和评论海明威 1941 年春天的中国之行，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也是长期为研究者忽略的一节。本书第一次系统地以海明威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之行为中心，向读者阐述了此行的目的、经过、收获和意义，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译出了海明威所写的报道，他的新婚爱妻玛莎后来的回忆录，美国学者的评论，以及辑集的中国报刊的有关报道等，从不同层次来审视海明威对中国的访问。本书编著者在美国访问了卡洛斯·贝

克教授，研讨了他的权威性力作：《海明威——作家兼艺术家》和《海明威生平的故事》，并从普林斯顿大学、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哈佛大学怀登纳图书馆找到了昔日被忽略的材料，还跑遍了有“书城”之称的波士顿十几家旧书店，因而为本书搜集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有素的编著者，不但译出许多有关的论著与回忆，海明威中国之行的六篇报道，同时也尽量作了一些扼要的评论和分析。这是对于海明威研究的新贡献。近年来，研究海明威在国外的经历，已有《海明威在西班牙》、《海明威在巴黎》、《海明威和特列尔扬》及《海明威在古巴》等书。现在，厦门出版了《海明威在中国》，这一新贡献无疑地具有国际意义了。

1941年2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连天，海明威以纽约《午报》记者的身份，他的妻子玛莎·盖尔虹为《柯立尔》杂志的撰稿人，他俩经夏威夷飞抵香港，停留了一个月，于3月25日离港去韶关、桂林、重庆、昆明访问，曾在广东前线与士兵一起生活，研究战争形势，考察武器装备。此行满意地看到了奇特而复杂的中国大地。当时香港《大公报》率先报道，于三四月间最先发表了林语堂的《美国通讯》和林疑今的《介绍海明威先生》两文。林疑令和冯亦代两位前辈功不可没。林氏最早译出了《战地春梦》（即《永别了，武器》）；冯氏1939年前后在香港就译出了《蝴蝶与坦克》、《大战前夕》等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作品，引起了我国读者的兴趣。

在重庆，作为第一个来访的美国记者，海明威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欢迎，共进午餐，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据说，蒋在交谈时连假牙也没有戴上，传为对外宾的一种“殊荣”。经由王炳南夫人王安娜的介绍，又秘密会见了周恩来，给海明威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所译海明威访华六篇报道和玛莎《我和他旅行记》，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记录。海明威说过：“作家的职责是讲真话。”他要“用最简洁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的作品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注目，也曾受到批评家的非议。本书立足于新视角，提供了新资料，无疑将有助于理解其人与鉴赏其作品。据闻作者还在准备撰写一本通俗的海明威传呢。

1991年7月中国北方民族史的研究

中国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工作。在学术领域日益为流沙侵袭的今日，收到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育宁、汤晓芳伉俪的《北方民族史论丛》，颇生一些感触。

风光特异的北国，从富饶的东北地区，经内蒙、宁夏、甘肃，西至阔大的新疆，一直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大舞台。昔日对北方和西北各族，多泛称为胡人。东胡和匈奴，很早就展开他们在林莽中和草原上的活动。到秦汉时期或更早些时候，匈奴就以一个强劲的民族出现于历史了。稍后有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的崛起，再后则有契丹人，女真人，西夏人，最后为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扬鞭跃马，登上了历史舞台，先后演出过不少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戏剧。这些北方民族的历史活动，是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漏写他们应有的篇章。

对于历史学家说来，北中国不亚于八方风雨汇集的中州，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虽然社会发展及文化水平不同，各个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都对华夏祖国作出各自的贡献。从司马迁不朽的著作《史记》起，一部二十四史，都有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不过，对于北方民族历史详确的探讨，直到乾嘉时期才揭开帷幕。这无疑是一片广阔的土地，勤奋认真的耕耘者都会有所收获，像钱大昕、徐松、魏源、张穆等，都是钻研西北史地的大家。及至清朝末世，列强环伺，北方多难，推动不少学者观察搜考。洪钧出使俄德奥荷之便，接触到俄国人贝勒津所译波斯人拉施特哀丁的《集史》，亚美尼亚人多桑的蒙古史著作，纂辑西方资料，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于是启发了柯绍■、屠寄的蒙古史、元史的纠谬和新著。接着一代宗师王国维进入研究之林，陈垣继武前行，颇不寂寞。三四十年代而后，研究北方民族史成绩卓著的学者，以我寡闻，在讲堂、会场、寓庐所见，有韩儒林、王静如、马长寿、翁独健诸家。西方如伯希和，东洋如箭内互，他们的有关著作也译介过来了。日本还有一些研究中国东北民族历史的学人，那是在军部谋略之士的指挥刀下从事罗织，别有隐情，应毋庸议。

近四十年来，出于执行民族政策、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需要，养了几批研究民族史的科学工作者。我面前的《论丛》的作者们却另有蹊径。60年代从未名湖畔毕业，正赶上大革文化命。晓芳本可回到户口精贵的沪上，她却冒着扑面的风沙，来到荒凉的鄂尔多斯与育宁共命运，青春红颜，一住十年。哪里太阳晒不干衣裳，鄂尔多斯的山山水水养育了贤伉俪。他们跨越了“红海洋”，承受了严峻的“再教育”，在策马奔波工作之余，他们翻阅文献，踏勘地理，调查风土人情，思索万古愁题，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他们携手走进科研机关大门以后，这些切身的直感，理性的思考，终于化为若干篇学术论文。字字看来是汗水，十年辛苦不寻常。绿鬓红颜已改，他们的年华凝聚在这本《论丛》中。纵使不及王国维、科兹洛夫与斯坦因，这却是他们伉俪捧出的心血。

《论丛》中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及其交流，鄂尔多斯地区民族关系，经济开发，在西夏历史中的地位，以及沙漠化形成的历史研究，不乏深刻的见解和新颖的观点，反映了他们艰难生活的经历和史学研究的追求。其他如蒙古与西夏关系的探讨，元朝文化的估价，鄂尔多斯蒙古族风情的记述，都是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在学术上，即使前进半步多么艰难，非身历其境者不容易尝到其中甘苦。我与育宁、晓芳伉俪有过多次交往，看到比我年轻的朋友有成效的努力，自然涌出衷心的喜悦。

1991年8月往昔的挽歌

不能否认，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一种尺度。谢世已五十年，作品仍为世人热爱不衰的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证实了这个奖金并非文学的唯一尺度。尽管这位奥地利作家曾为艾·辛克莱等好几位作家填写申请诺贝尔奖的表格，并不停地为高尔基要求过，但这个文学奖却未能分享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大师的光荣。

《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年至1940年，当时欧亚和北非硝烟弥漫，

德意日法西斯猖獗肆虐，茨威格在流亡异乡中完成了这部生平最后的散文作品。当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

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自幼在维也纳浓重的文化气氛中成长，具有非凡的文学天才。他的作品丰富多彩，感人肺腑，成名早，交游广，渴望和平与社会进步，服膺人道主义。因此，1933年4月，希特勒政权首次公布包括44名德语作家在内的禁书名单中，就列上他的名字。从此作品被焚，住宅被查抄，终至被迫流亡国外，再也没有回到在那里成人长大的世界。这部《昨日的世界》，就是往昔的挽歌，悲悼生灵与文明涂炭的挽歌。茨威格起初以诗人的飘逸姿态走进缪司女神的殿堂，《昨日的世界》便是他的天鹅之歌。

读这本书使我赞赏不已，清丽的文笔，罕见的情怀，到处洋溢着艺术家的智慧，能够听到出自一颗伟大、浑厚而又忧郁的心灵的倾诉。这并不是通常的自述，而是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他这样说：“我自己就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引人入胜的是，作者把我们领进欧洲文明的迴廊，在文化名城维也纳、巴黎、柏林等地漫步，或是登上萨尔茨堡的卡普齐纳山，文化艺术界的胜流如云。多少值得我们脱帽致敬的名流啊！罗曼·罗兰、托马斯·曼、房龙、威尔斯、乔伊斯、路德维希·勃兰兑斯、勃拉姆斯、里夏德·施特劳斯、托斯卡尼尼、里尔克、纪德、罗丹·叶芝、萧伯纳、克罗采、霍普特曼、巴比塞、弗洛伊德、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一串辉煌的名字。许多前辈大师，如歌德、瓦格纳、惠特曼、李斯特、赫尔岑、福楼拜、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佚闻，也有所叙述。关于他们的警欸、谈吐、风仪，令人赏心悦目，读来深受熏陶。我不想一一转述，正如苏东坡读陶渊明诗，每日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应留待爱书者自己品尝。

偶然性每使人惊讶，茨威格在萨尔茨堡住宅的对面，就住着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他称为“那个把我们这个世界搞得无法安生的人”。

在他生息、热爱和眷恋的世界里，他用了半个世纪所培养的理想全部撕碎了。他在书中写下一队年轻人用急促整齐的步伐跑出来，挥舞看棍棒，才使他认识法西斯主义“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力量”。他看到自己为人喜爱的创作被焚，慕尼黑会议竟引动欢乐情绪的爆发，希望之光又迅速幻灭了。他痛心地承认：“又当了不可救药的傻瓜”，也了解到父辈生活的“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照耀过他童年的星辰黯淡了！

也许人们不仅痛惜而且还会责难茨威格伉俪的自尽，可能认为理想主义的局限苦害了他呢。然而想到他焦急地谢世四分之一世纪后，竟还出现一支支小小的冲锋队。今天还有人跪吻希特勒当年的座椅。额前垂下一绺头发、唇上蓄着一撮小胡子的无赖青年又在发动骚乱。这部往昔的挽歌不也是警世的哀歌么？

打从“史无前例”以来，在当代中国的歌德译介者中，有三位应受重视：钱春绮、董问樵、杨武能。前二位都在上海，各自译出了歌德的毕生大作《浮士德》；后一位在四川工作，新译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和中短篇小说，还写出几十篇论述歌德的长短文章。尽管学术领域中沙漠化趋势在发展，就译介和研究歌德而论，老一辈的如冯至等，也还没有搁笔，同时年轻的歌德译者和研究者仍在萌生。不知可否借用歌德的作品《亲和力》一词来比喻文化的力量，优秀的学术文化，耐磨耐烤，终能保持鲜艳的色泽，钱春绮的《浮士德》原来是在大革文化命之年以前翻译的，在十年灾难严重的内乱时期，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两个下半部，随着他的全部藏书都化为纸浆了。到了1979年又重新补译出来，印装相当雅致（名家陶雪华小姐装帧），很引人入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可见秦火终归要熄灭的。

杨武能将他近年的研究成果《歌德与中国》贡献给读书界。这本小书包括两部分：一是歌德与中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国已有人研究歌德对中国的了解认识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问题，作者只将前人的重要成果加以归纳总结，系统地介绍给国内读者，附加一些分析和评论，成为此书的上篇。另一为中国与歌德，回顾百年来的介绍、研究和接受的历史，以及歌德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青年的影响，这个方面迄今还未见有深入、系统的考察和论述。比较文学中有所谓影响研究，这本小书反映了作者奋力的探讨。

这书中不仅论述了歌德与中国的关系，它的序言更值得玩味。季羨林教授这篇一千四百字左右的小序，有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他认为：“这样一本书，无论是对中国读者，还是对德国读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都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于德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读者，从他们最伟大的诗人对待中国文化艺术的态度中，将可学习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看待一切。对于中国的读者呢？序言称：“看待自己要有全面观点，历史观点。”“盲目自大，为我们所不取。盲目地妄自菲薄，也决不是正当的。”季羨林先生序言中有一段话值得照抄：

一个民族，一个人也一样，了解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例外。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大势，昏昏然，懵懵然，盲目狂妄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夜郎之君，井底之蛙，不过如此。现在读一读当时中国皇帝写给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的所谓诏书，那种口吻，那种气派，真令人啼笑皆非，不禁脸上发烧，心里发抖。

序言说到鸦片战争后旧中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流风所及，至今尚余音袅袅。妄自菲薄与盲目自大，都不可取！“怎样来改变这种情况呢？端在启蒙。应该让中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真正了解自己，了解历史，了解世界大势。”最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感、所作、所为应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从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中，生发了上述的思考，难道是节外的枝叶么？不，孔二先生说的好：“学而不思则殆！”

1991年9月“群情尽望春”
——关于《号角与火种》

这一包回忆录稿，躺在我的书柜里已经七个年头了，它总像一团火燃在我的心里。那还是在《中国学生导报》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前后征集的。中国学生导报社这一青年革命团体，经由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上报，业经中共中央组织部1990年干审字第38号文件批准，确认为党领导下的青年革命组织。《导报》的弟兄姊妹们的这些回忆，不仅仅是用墨水写在白纸上，而首先是用切实的无畏的革命行动，用鲜血和生命写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历史中了。

受命编订这本回忆录，不单给我从头细读的机会，还牵引我重温当年共同的遭遇。许多动人的情景来到眼前：深夜摇曳的烛光下编写手抄刊物，追求光明的活动冲破了当局的禁锢，沉寂的校园出现了革命风云，学习小组里热烈的讨论和争辩，节省有限的零用钱来创办自己的报纸，繁重琐细的发行推广工作，抗暴示威队伍中震天价响的呐喊，跋山涉水克服重重障碍奔向解放区，城市姑娘到农村当丫头发动农民斗争……还依稀看到：柯以圻想方设法推出了《导报》上海版；江竹筠秘密散发《导报》地下版；陈以文肩负神圣使命在崇山峻岭中疾走，最后与江姐同一天被杀害于渣滓洞的电台岚垭；杨奚勤带领起义队伍上华莹山；王朴高呼革命口号，在大坪刑场英勇就义；陈作仪被囚渣滓洞中，镇定地回击敌人的威胁与劝降；胡作霖打着手势，放声高唱《囚牢之歌》；还有张永昌、施■、吴景琦……正向我走来。“故人生死各千秋！”党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学生导报》把许多男女青年引领上革命道路。《导报》吹响了召唤青年学生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号角，传播了青年学生争取民主自由、反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呼声。《导报》在青年群众中撒出了满把的火种，大家团结在《导报》的周围茁壮地成长起来。我们这一代男女青年，无不记得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下的对生命的颂歌：“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导报》弟兄姊妹们，已经把我们的青春和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这本回忆录就是证明书。

在我编订的过程中，又一次接触到美好的心灵，看到理想的光辉，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和真理，使自己的生命开花。许多弟兄姊妹们的各式不同的命运，都表现了坚定不移的共同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在于付出。这里对当年的回忆，也许是今天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不可思议的；可是，历史肯定会理解我们这一代。世界史业已载明，19世纪30年代前后，欧洲第一次发生了一系列的自由风暴，接着便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从罗伯特·欧文到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潮从此激荡全球，成为一百四五十年来光辉灿烂的真正精神文化的代表。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我们中国，当时内政腐败，外侮日亟，敌骑纵横，河山破碎，民生凋敝，哀鸿遍野。对于我们这一群知识青年，救亡与启蒙的要求是并行的，救亡必须启蒙；启蒙才能救亡。我们不约而同、成群结队地围绕在党的周围，谛听党的教导，学习讨论，自觉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活动和斗争，为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为建立富强、繁荣、幸

福的新中国，大家自愿地献身，奉献青春，奉献生命。时至今日，霜雪满头，还和年轻时代一样坚持自己的理想。近五十年风吹雨打，我们《中国学生导报》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任何人蜕化变质。尽管如备受委屈的一位女同志所说，我们只是一点萤火，但我们从不背叛，绝不助长腐朽与黑暗。我们的理想纵使被歪曲，受践踏，遭破坏，但我们深信：伟大而壮丽的理想中有价值的成分终久会得到实现，将会以更恰当的形式体现真善美。理想使我们永葆青春，青春无悔！

这本回忆录的内容是不完全的，还不足以反映我们学习、成长和斗争的历程。最近收到《导报》有些同志的来信，他（她）们来不及讲述为《导报》工作的经过。许多同志“施不望报”，而且拙于言辞，不少感人的情节还缺少表述，或是笔难尽述。编者可保证的是，本书没有涂饰和夸张，没有一个人想借回忆之名来编写生祭自己的悼词。我们都不过是和苦难的中国人民一起度过“恐怖年代的孩子”（借用勃洛克的诗题），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而且自愿做的一些事。没有洞天福地的山头，更没有妄想混进先贤祠，不过是向有理性的人们诉说我们亲身的际遇。

我们把这本回忆录定名为《号角与火种》，自身觉得是当之无愧的。《导报》的出现和存在，就是对于反动统治的抗议，就是要求社会进步的呼喊。为了我们祖国的富强康乐，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衷心祝祷历史新时期的火种燃得更旺，号角吹得更响！

这本回忆录是对于逝者的纪念，也是对幸存者的慰藉。这本回忆录当然称不起革命史上的丰碑，但却是青运史上的一章一节。

许多同志和我曾在一起编辑了《中国学生导报》创刊号。岁月无情，已有好多位离开了他们为之献身的人世间。四十七年之后，我还被同志们授命编订《导报》回忆录，世事推移，佳人已老，“无可奈何花落去”，“百年初半欲何之”？不禁迷茫交织。全稿编就，犹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在渣滓洞赴刑场途中口占就义诗有句云：“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这不正是逝者与生者的殷切的共同盼望么？

1991年2月诗画合璧之美

周作人传世之作，论装帧设计印制的精美，大约无过于这一册《儿童杂事诗》了。此诗1950年曾在上海《亦报》发表过，并有丰子恺插图。作者晚年编定的《知堂杂诗抄》中列为第六。《杂诗抄》全稿经香港郑子瑜珍藏二十七年之久，后提供给长沙岳麓书社于1986年出版。然而，这《儿童杂事诗》从未单行，如今与丰子恺画珠联璧合在北京出版，想必为海内外爱书者所慕求。这位自称为“可笑老人”，如果泉下有知，也会展眉的吧？

“五四”时期老一辈作家中，周氏昆仲都十分关念将来的。大先生说：“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他在1919年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1918年便呼喊“救救孩子”。二先生早就注意妇女与儿童问题，再三再四和“人的发现”联系在一起论说，是知堂作品中一个重要方面。比如1923年《〈土之盘筵〉小引》称：“有一个时代，儿童的游戏被看作犯罪”，而他却“随时抄录一点诗文，献给小朋友们”。同年《儿童剧》序一说：“我们没有迎

合社会心理去给群众做应制的诗文的义务，但是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我们却是有的，正如我们应该拒绝老辈的鸦片烟的供应而不得不供给小孩的乳汁。”

《儿童杂事诗》却不是写于北京八道湾苦茶庵，而是1948年成于南京老虎桥圉园中。1950年以东郭生笔名发表。诗七十二首，丰子恺为其中六十九首画了插图。这七十二首诗分三篇：甲篇儿童生活诗，乙篇儿童故事诗，丙篇儿童生活诗补。1960年8月14日重录一遍。据是年日记，20日从人借阅毛润之语录，23日尚阅其论文艺，日记即止于是日。距重录《儿童杂事诗》仅九天，叔河《笺释后记》叹曰：“盖即其绝笔矣。”

作者自谦：“我本不会做诗。”又为何借用诗的形式呢？自序称：“偶读英国利亚（Ed.Lear）的诙谐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略师其意。”“我这一卷所谓诗，实在乃只是一篇关于儿童的论文的变相。”甲篇附记还解释：“儿童生活诗实亦即是竹枝词。”《十堂笔谈·风土志》中有几句话，希望关心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可说明写儿童诗的旨趣了。诗分三篇，甲篇以岁时为准，乙篇为历史故事，两篇则以名物分类。

叔河笺释，甚见功力，首引知堂文，另引用会稽范寅《越谚》及他书不下六十余种。每诗画后安排两页，各十二行，对作者所写双行夹注亦有校释订正。有些悲哀的故事需解说者，又以“附记”殿后，不损版式，颇具匠心。

丰子恺先生为画苑大师，擅长儿童画，所作画图，尤可宝贵。展卷观赏，深感妙笔力能挽回似水年华，又享儿时乐趣，令人感激。

笺释本诗影印周氏手迹（原大），画据《亦报》原图复制。全书双色套印，银灰封面，外加腰带，比大32开本尚高5公分，计320页。叔河经营此书多年，终能将这一册风俗画卷面世，老少咸宜，出版者也是很有识见和果断的。

1991年11月人世几回伤往事

此刻读《日瓦戈医生》（编者按：港译《齐瓦哥医生》）作者的自叙传《人与事》，自然更觉得别有一番滋味；想到小说中寻找拉拉的尤利■倒在莫斯科街头，再也没有起来，反映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期如此严峻的风貌。七十年烟云飘拂，现实的嘲讽格外显得辛辣与无情。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年）以其传世之作抒情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俄罗斯作家中，此外仅有蒲宁（1870—1953年）于1933年获得这一荣誉。蒲宁是俄国最后一位古典作家、诗人，在流亡生活中曾译了许多名著，译文之优美达到了典范的程度。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高雅深奥，有褒有贬。斯德哥尔摩宣布授奖决定后，他在国内立刻受到自上而下的猛烈围攻。幸而他精通几种外文，溯自20年代末苏联流行庸俗社会学后，在文坛的宗派主义统辖下，他已主要从事西欧古典名著翻译，介绍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及裴多斐、魏尔伦等人的名作，成为翻译莎氏名剧的权威学者。他的著译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在谢世前的两年间，尽管身处危境，他仍以高昂的格调写成了组诗《雨

霁》，并完成了自传性随笔《人与事》的修改工作，表现了对生活的执着和追求的积极气概。

这个中译本是帕斯捷尔纳克两篇散文体自传的辑集。第一篇自传题为《安全保护证》，脱稿于四十岁以前，1931年曾出版单行本。书中回顾早年的生活经历和文学活动：童年对钢琴家斯克里亚宾弹奏的爱慕；旅途中邂逅奥地利作家里尔克，从此醉心于他的诗作；在德国的留学生活，到意大利名城威尼斯旅游；回国后的感受，诗坛的集会，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印象，以及自身生活所起的变化，从而阐述了年轻的心态和艺术创作观点。他将这篇传记用来纪念仅识一面而毕生倾慕的里尔克。第二篇自传题为《人与事》，1956年春写成，1957年11月曾有修改。死后七年才被杂志刊布。全文分五章：幼年，斯克里亚宾，九〇〇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个影子。原稿删去的部分里说：“我根本没有想把五十年的历史写成几卷的书，写出众多的人物。”“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后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作者坦率地谈到对同时代人的看法，不过他的传记随笔的句号落在1917年间。他说：“继续写下去，过于艰巨。如果按顺序写，就得写革命时期的岁月、情况、人和命运。”可是，作者说：“写它，应当使心脏停止跳动，让人毛骨悚然。”以至于极其苛求与激烈地说：“用千篇一律的老一套手法描写它，写得不能打动人心”，“索然无味”，他竟说：“这样写——卑鄙低下，厚颜无耻。”

作者行文思想跳跃幅度大，宏论玄虚难琢磨，译者乌兰汗严肃谦逊，自译第二篇传记，邀请老翻译家桴鸣译第一篇，说是“担心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会被我的译文糟蹋了”。然而，他所辑译的三篇附录，即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一束，共二十二封，美国女记者奥·卡里斯莱的会晤记录和苏联老作家科·楚科夫斯基的回忆录，却都可补充自传中所未提及的人与事，特别是他晚年生活的一些状况；同时也是《日瓦戈医生》事件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么译书就搞活了，读者会感谢的。

帕斯捷尔纳克与文学编辑奥·伊文斯卡娅之间有一段凄凉痛苦的爱情，她是《日瓦戈医生》中拉拉的原型。她两次身陷囹圄，连她的女儿也被判刑。帕斯捷尔纳克赞美“她是乐天派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由于她的英勇和坚韧才保存了我的生命”。译者（用高莽本名）另写苏联三大诗人的爱情悲剧（《诗人之恋》）一书，其中《上帝和天使》一章，就是他俩的辛酸故事。

人生本是苦难的历程，现世更严酷。读了《人与事》，举目怅望，想起刘禹锡两句诗：“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1991年11月《石鼓文鉴赏》序

1989年孟夏，汉中尹博灵君由友人介绍，过余敝庐，出所临写唐拓石鼓文摹本来视余。自言学书有年，临摹家藏，沉迷日深，探索研讨，汇为稿本。不敢厚自宝秘，甚愿呈献同好。以我服役于出版界，属为推荐。

噫！我于古刻全然门外。闻言惊诧，心念此一叠写本，若果系临自

唐拓石鼓文摹本，无异为唐初石鼓被发现以来之又一次发现，为宋拓“先锋”、“中权”、“后劲”三本外添一可供学术界书法界研究之新资料。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着眼，固当效绵力。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然亦极严肃端重之公事。是故首应酌情为之敦请专家予以鉴定与指导。

第念笔迹之存者，关中石鼓最古，世称千古篆法之祖。李嗣真《书后品赞》云：“史籀堙灭，陈仓藉甚。”唐初大书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共称古妙；复经杜甫、韦应物、韩愈等歌咏，由此著闻于世。其质地为花岗岩，其形则似一高装馒头，并非如鼓。石刻文字不及青铜铸件抗磨稳定，寿命久长，因其暴露原野，风雨侵蚀，人为破坏，以致石皮颓落，原迹废毁。杜甫因有“陈仓石鼓久已讹”之句，韦应物谓“风雨缺讹苔藓涩”，韩愈注意到“雨淋日炙野火燎”的损坏。唐代确有拓本流传，韦苏州说过“令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只以原石损坏，捶拓效果不好，“忽开满卷不可识”^④。韩昌黎十分重视石鼓的历史价值，建议太学祭酒予以保护。他是看了拓本的，《石鼓歌》第一句便说：“张生手持石鼓文。”然而，“辞严义密读难晓”，“年深岂免有缺画”。拓本为纸质，更经不起天灾人祸，几番风雨，鼠啮虫蚀。石鼓幸能在唐初出现，其厄运不下于生民。北宋梅圣俞诗云：“传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近人偶见安碓床，亡鼓作臼割中央。心喜遗篆犹在傍，以臼易臼庸何伤。”当日就有雷氏子好古，“日模月仿志暮强，聚完辨舛经星霜。四百六十飞凤凰，书成大轴缘锦装。”存字系举其成数而言。欧阳修云，所见拓本“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有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郭沫若就《中权本》所存字数，分全字、重文、半字、合文、赘文以计算之，“全字之数四百六十五，与欧阳所举数目相同。然如并重文合文而言，则远在其上。”

有关石鼓文及其研究，隋以前未见著录。左丘明、司马迁似未之见。唐初其名尚不甚著。唐宋诸家对其时代之考订，主宗周说者居多，亦有以为宇文周者；惟南宋郑樵首据秦器推断为秦篆。前二说要皆考据未精，率尔臆断，后人讥为“幼稚可笑”。我国近代考古学前驱马衡，于20年代撰《石鼓为秦刻石考》，“特为正其名曰‘秦刻石’。”末段强调其名称亟宜辨正：“唐以来著录此刻者，苏勗、窦■皆以为‘猎碣’；其余皆以石鼓名之，此尤大谬。当刻碑未兴以前，只有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凡言颂德诸刻，多曰刻石，或曰刻所立石。”“立石又谓之‘碣’。”“此十石之形制，皆与之同。其刻上小而下大，顶圆而底平。四面有略作方形者，有正圆者；刻辞即环刻于其四面。此正刻石之制，非石鼓也；苏、窦‘猎碣’之名，差为近之。”关注考古论坛之郭沫若，1963年序马衡文集称：“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盖以马衡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于抗日战争时期，维护转运保存秦刻石鼓十具及故宫珍贵文物于西南地区，劳绩卓著，“凡德业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今仍名石鼓者，盖从俗耳。

然石鼓之研讨存在问题尚多。立石之年代，十石之次第，原文之释与复原，拓本、写本、撰述之审理，均以尚缺信而有征之文献根据，石碣剥泐又难辨认，于今徘徊三昧原上，纵情畅想，恐亦难得其解。其不可臆定者，严谨之学者付之阙疑，不敢妄断。以此石鼓文之聚讼久矣！真贋杂陈，好事者穿凿附会，学者间纠纷不已。韩退之已慨然叹曰：“嗟

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比韩文公晚生七百余年的杨慎，本是好学穷理之人，惨遭朱明政府下放云南边鄙之地，好务博欲胜人之秉性未改。余尝游其新都故园，乡人谓慎于书无不览。猎奇搜异，记忆惊人。投荒之日，老而弥笃。记诵之博，论古之丰，居明代之首，然亦难免时有疏失。所撰《石鼓文音释》三卷，自序称其前辈诗人李东阳得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将为手书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东阳旧本录而藏之（14）。《金石古文》亦言升庵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冯维讷《诗纪》亦据以载入古逸诗中。《四库全书总目》云：“当时盖颇有信之者。”后陆深作《金台纪闻》，始疑其以补缀为奇。至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证古本以揭示杨慎强增字句，“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其释“■”字“尤为欺人明证”。且“苏轼《石鼓歌》自注称，可辨者仅‘维■贯柳’数句，则称全本出于轼者妄”。“即真出东阳之家，亦不足据，况东阳亦伪托欤！”对明嘉靖间锡山安桂坡十鼓斋藏本，郭沫若尝云：“此间（指日本学术界——引者按）学人因有疑安氏二本为唐拓者，今案此说不确，事由《作原》一石可以判定。”可见唐拓甚为学术界钦慕想望也。对郭氏石鼓文年代之考定，马叙伦亦不以为然，特著《石鼓为秦文公时物考》及《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逾万言，举正郭说之遗失，彼此间讨论热烈。勇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之鼎堂，坚持其秦襄公时物之论见外，亦言“马说虽与余异，然足以补正余说之处甚多”。前辈论学风仪，诚为学术研究领域中可喜可敬之典范。

尹博灵君以其所据、所临、考辨、论说及白话译解就商于余，尤以石鼓文唐贞观拓本摹本一事，余不能知，勉以访师求友，励志问学，再图精进之方。余以为按情理思之，应不厌其繁难。石鼓叙事史诗，为吾中华民族文明进化过程中之重要一环，为人类文明宝库中之稀世瑰宝。尹君为余讲述其创获时，余立忆及郭沫若《诅楚文考释》中呵责同时代之专家某君谓：“读书不细心，不能有所发明，竟连别人的发明也不能了解，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我引以鞭策自身，并建议尹君恭敬求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处学者专家，为之介绍访谒国家文物局之专家及当今学界之诸老。余向以为君子爱人以德，诲人不倦。学者奖掖后进，即所以自大其身，所谓薪尽火传，学业道术不知其尽也。十数年来，学术界气象有所开朗，老辈多了然指示后学以津筏之重大意义，新秀亦知敬老尊师与受业传道之关连。余勉尹君毋庸拘束踟蹰，应有立雪精神。纵遇个别高明或名高者，仍习惯于自我封闭，口是而腹非，亦不足怪，细心聆其片言只语仍可有所启悟也。

历史文物之鉴定，为极其严肃的学术工作，非徒口舌之争。真实无伪之物证为第一性的，它如师承、学衔、名位乃至政治等，都属第二性或第二性以下之名目而已。据云所临唐拓摹本不幸毁于丙午大火，亟宜根据已知线索，于天壤间穷源追本，尽人事以待机遇。《史记·封禅书》亟言九鼎之神秘，“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郭沫若论断“石鼓是襄公作西畴时的纪念碑”。向传师于北宋皇祐间搜得《作原》一石后，曾以石补复之。郭氏论及其事云：“此代替之石及传师所补半石，意必尚存于人间。即《作原》原石之上半为北宋土人所削去者，其零屑碎片亦必犹有残存。如再于风翔附近从事搜索，其被削去之文字或

将有重现之一日也。”善哉！大手笔之畅想曲也。博灵之所临，果为唐拓之物证，幸能大显于世耶？尹君闻言沉思，余拭目以待之。

谨严从事与严酷萧瑟截然不同。学问之道，宜庄重和顺，即《诗·召南》所谓“曷不肃雍？”《书·洪范》谓“恭作肃”；《礼记·乐记》云：“夫肃肃，敬也。”应为对方设想而恭敬之。王国维乃一代宗师，论学则避咄咄逼人，所著《宋代金文著录表序》中综论诸书云：“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复兴，辄鄙薄宋人之书以后不屑道。窃谓《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纪，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出其范围。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之所不能免也。”《庄子·天下》尝言：“君子不为苛察。”海宁所言，有气度，识大体，洵为学术评论之准则。彼攀引师门，以烦琐苛刻为明察之辈，轻薄而不晓为学甘苦者，余恐其三读而仍无愧汗下也。

春去秋来，篱菊三放，博灵萧然青■，复抱稿本来见。云幸承京华长者多人指点，审阅批改，大加增益；又蒙周谷城、赵朴初、启功诸大老题署赏识。尤可欣喜者，归后忆及摹本旁有小注一行，记陕西耀州有清刻唐拓本石鼓文碑。乃亲至耀县药王山“小碑林”寻访，竟于豢养大狼狗院中，觅得顺治十六年据唐拓制成之石鼓文碑刻，可与曩昔摹本相印证，足解历年临摹吟哦之劳。

余未能身登华原，扫尘剔垢，摩挲审视，惟展朱拓观赏而已，既引以为慰，且殊以为憾（21）。与此同时，玄武湖畔好音传来，欣闻苏省决予版行，以扶持后进，兴化右文。值此拜金之风劲吹之际，此举诚令人感荷。是故余不能已于言，请以二事为出版者与读书界陈明之。

此稿为学术研究提供探讨驳难之资料。谭浏阳尝言：“哀中国之亡于静。”“言学术则曰‘宁静’”，“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卒成“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嗣同诚慨乎言之，故重视对待之理，即今人所谓树对立面也，以期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昌明学术与治术。余料尹君此稿面世，必可引起驳议，诸如唐拓摹本之流传，华原刻碑之依据，左重耀《刻石鼓文铭》与杨用修“伪本”是否为旁系血亲，白话译解妥贴与否等情，盼有宏论公表。

余以为朱竹垞亦解人也，设如得见华原碑刻，将赏玩默想，当如何反思其对用修之严厉责难也耶？近年学者之辨伪者，于“伪书”行间每善窥知其一二真价，引以为研讨之助，而不欲一律格杀勿论矣！犹记1985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邓散木编著《石鼓斠释》，系其亲笔临写，据安桂坡十鼓斋本校补得四百七十三文，合重文三十九，合文四，共得五百一十六文。注释博采众说，参以己意，正其讹舛。十石次第，依宋绍兴时王厚之说，与郭鼎堂等殊。邓氏为篆刻名家，校释、摹写甚见功力。其不可臆定者付之阙疑，不欲苟同。彼书虽薄而有份量，惜乎未闻好古者评述之。知音如不赏，石沉大海焉！来自石鼓故土之尹君，或将有大幸运，若有呵而问之者，即其难得之福祉也。

于此又忆及王静安《毛公鼎考释序》论文字考释之难云，“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讫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

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学术堂奥之探测，不能不允许迷失。闻尹君幼承家训，少而好学，言动与浮薄奔竞之徒有别。余切盼其稿为识者说三道四，前指后戳，甚至大张挞伐，推翻而粉碎之，即零落成泥，亦可供稍稍改良现时古典学术研究、弘扬传统文化之壤土也。

此稿亦为书法研究提供欣赏临摹之资料。石鼓文书体介于古文与秦篆之间，世称大篆，为研究我国大篆以及由大篆演进为小篆之重要资料。我国使用篆书，由商至秦，约有一千五百余年之历史。由春秋起，文字形体渐有改变。下及战国，许慎言“诸侯力征，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定出小篆，用火与剑来贯彻“书同文”。追本求源，大篆在我国文字演进发展过程中居重要地位，而石鼓文为大篆之典范，世以为史籀之遗迹。唐窦泉《述书赋》云：“篆则周史籀、秦李斯，汉有蔡邕，当代称之。俱遗芳刻石，永播清规。”徐浩《古迹记》有“史籀《石鼓文》并为旷绝”之言，以其书法体态浑穆，画如屈铁。潘迪《石鼓音训》故云：“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籀篆者，不可不宗也。”康有为《书镜》谓：“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迩来学书青年，渐知其中韵味，颇有爱好临摹者，则此稿出而增一写本，以广闻见，可供参照。

石鼓文非徒法书，且亦有关文史研究。郭沫若谓其“直接的社会史料虽然不多，但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却当作不同的评价。《石鼓文》是诗，两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辞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这就足以证明：尽管《诗经》可能经过删改润色，但在基本上是原始资料。因此，我们对于《诗经》的文学价值，便有了坚实的凭证。而且，石鼓刚好是十个，所刻的诗刚好是十首，这和《小雅》《大雅》以十首为‘一什’的章法恰恰相同，这也恐怕不是偶合。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余以为鼎堂此论，颇受韩愈《石鼓歌》之启发。退之诗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被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世人每以退之为铁杆正统思想，其实此处所言大不敬。彼生存活动之年代，无不确认孔丘编辑、删定《诗经》，竟以《石鼓诗》不收入《诗经》而斥编者为“陋儒”，如此胆大，可知退之文学见解深刻，看出《石鼓诗》与《诗经》之时代联系。尹君稿本得以印行，非徒有益于书法艺术之观摩也明矣！

江苏近曾印行清末人周鼎《石鼓文》藏本，今又拟印尹博灵之《石鼓文鉴赏》，于汹涌之“向钱看”冲击波中真能坚持向前看。吾乡古谚有“版版六十四”之说，以讽拘泥陈规、不灵活者流。今苏省出版界富有开拓意识，致力弘扬祖国文化，奖掖青年新秀，推动学术探讨，版版不沾铜绿臭！素有声名文物之邦称号者，可告无愧于读者矣。苏东坡《石鼓歌》云：“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万古斯文，触动诗

人遐想，“遂因鼓鼙思将帅”。余为昌明学术者合十。

公元 1992 年 1 月 10 日，
射水戴文葆谨识于京都东城。

④石鼓文之唐初拓本，据云日本尚有存者。尹君所藏《考论石鼓文·叙言》抄本略称：“民国戊辰冬客大连，获睹日本影印旧拓石鼓文未剪裁本于满铁图书馆，其仅第八鼓残字廿有四，余皆画完整，句读分明。跋语有云：神代时获自支那。原本藏官府，影本分陈各国立图书馆云。其珍秘可知。考日本神代即唐贞观时。”按神代系指《日本书纪》、《古事记》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以前之时代。日本史籍谓神武天皇于公元前 660 年即位。唐贞观元年为公元 627 年。叙言所云年代有误。日本藏有初唐拓本事，尚须查证。

(14)明杨用修木刻本，世称《函海》本，谓系唐拓重摹本。石鼓文重刻者极多，宋淳化间有李■摹刻本；宋歧下翻刻本，即郑樵、薛尚功等所见本。宋《甲秀堂帖》缩刻本，为庐江陈氏所刻。薛尚功据歧下本缩刻本，见《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

(21)前文注④引尹君所藏抄本《考论石鼓文·叙言》中，曾言丁亥冬友人以新得耀县学宫刻本见示。据其所叙原委，似与《函海》本有相近处，尚未知其评。此刻之重新发现，可资考据研讨，为石鼓文之探索添一新资料。学术之探讨，首重资料之占有，不为无米之炊，而后继以比较分析，方得显示其实际价值。予以为逸篇遗文，搜讨不厌其多。惟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均赖冷静辨认鉴定而判明之，毋庸轻率挥斥叱责而抹煞之。余自审所知有限，不敢贸然论断，附识于此，以供他日修正。

附记：

《石鼓文鉴赏》作者尹博灵君，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由于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仇海清君访问组稿过程中认识了尹君，他当了伯乐，经由该省教育出版社领导同意采纳尹君石鼓文研究书稿，并在京将尹君介绍给我，因而得与尹君切磋讨论多次，定稿后嘱我撰文介绍。我觉得：编辑应当不断寻觅与发现作者，了解审视作者成果，在原则范围内尽可能帮助作者出书，尤其要为新进作者开路。然而我并不是这方面的研究者，只能略述所感，也不隐瞒对他的研究的看法，写在正文中，还在注文第 4、14 及 21 中质疑。肯定是我的序言写的不好，让有的人居然看不懂。该书出版后，我方从江苏仇君处得知，一位研究石鼓文的老书法家早已向新闻媒体投函，对这个年轻人竟大肆攻击辱骂，我读那信后只能付之一笑。他还向报界宣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决将出版其大著，当时我是北京三联书店工作人员，从未有所闻。这位先生还指责我在序文中抨击了一位学者。实不得已，我商请《编辑之友》（山西）主编杜厚勤同志考虑刊登《鉴赏》中拙序，幸蒙俯允，特加编者按语云：

《石鼓文鉴赏》是一部集考订、译注、书法、欣赏为一体的学术专书，编著者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年人，该书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里发表的《〈石鼓文鉴赏〉序》作者所采用的是一种与该书本身内涵相贴近的文言文文体，文章旨在说明：（一）有关学术上的问题应当欢迎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提供新资料、新观点。（二）应当让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有机会公之于世，以便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正。（三）学术争鸣应当是严肃而平和的，讨论各方应当是平等的，决不能按政治地位或学衔来论高低；更不用说，不宜以恐吓和辱骂来代替学术争鸣。本刊将这篇《序》发表于此，意在为编辑同仁提供一个借鉴。

这次收进本书时，为遵守统一的体例，将二十七条注释，仅保留第 4、14 及 21 三条，仍标原来编号，用以存照，俾察愚衷。

1997 年 6 月

关于宋庆龄在鲁迅 葬仪上的演说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寓所溘然长逝。党中央派到上海来的冯雪峰，当即打电话通知宋庆龄。她立即来到虹口，向鲁迅遗体致以深切的哀悼，并与许广平、冯雪峰等磋商治丧事宜，决定与蔡元培、沈钧儒、胡愈之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向社会发表讣告。21日，宋对《立报》记者表示应完成鲁迅伟业，“把他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22日，出殡安葬，宋庆龄与蔡元培等执紼，由殡仪馆送至万国公墓，并在葬仪上发表演说。据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宋庆龄选集》第96页《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原文如下：

现在鲁迅先生死了，可是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追悼鲁迅先生，须效法先生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

（《鲁迅纪念集》，北新书局1936年出版）

宋庆龄的这部《选集》，继1952年《为新中国奋斗》之后，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时在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百年诞辰之际，正值假借无产阶级名义大革文化命向高峰发展的时候。

按1966年版选集《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所注出处，查阅《鲁迅纪念集》，颇有疑问。

鲁迅1936年去世后，一年间《纪念集》出了两种：一是北新书局1936年12月30日出版，署“鲁迅纪念会编”；另一是1937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书名有“先生”二字，系鲁迅纪念委员会所编，扉页作“纪念集（评论与记载）”。文生版为大32开本，750页左右，汇集了治丧的详细经过和先生逝世后海内外的悼念，材料很丰富，但没有专门报道宋庆龄的文字。子冈的《伟大的伴送》，记10月22日送鲁迅先生安葬情况，也只有一句：“孙夫人在热烈欢迎中和群众见了面”（悼文第三辑页145）。署名“衡”的《出殡的行列》说：“到达万国公墓，已经5点钟了，在那边有好些人演说，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接着摘记沈钧儒、章乃器、田军的演说，“末了邹韬奋含着泪说了几句”（悼文第三辑页191）。也没有记下宋庆龄的演说词。

《宋庆龄选集》1966年版注明出处为北新书局版。北新版《纪念集》，为小32开本291页，从鲁迅先生逝世前后起，文章分五辑，都是记述、悼念和回忆；第五辑为白话诗。这五辑诗文，作者近九十人，并无宋庆龄的专文。

不过，有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偶有关于宋庆龄出现的报道和记述。第一辑中，送葬执紼者，提及“参加的有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等卅余人”（页34），“跟在灵柩后面的，则就是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等”（页42）。十九日起到安葬的速写一文中，则有详细而感人的记述，该文的小题目为《国母三顾仪馆，盛情可感》，文云：

宋庆龄女士是从来不和官场酬酢的。鲁迅先生死了的消息很早传到她那里后，她第一

个跑到施高塔路一弄九号（即大陆新村）周寓去吊唁，在 21 日那天下午，他又参加大殓典礼。22 日那天，她又参加执紼送殓。她已是快五十的年纪了，领导民众艰苦奋斗的精神，从吊鲁迅先生的死上面也可以看见。她以国母之尊，居然徒步在马路上奔走。她的精神真堪钦佩。她穿着一件绿呢大衣，素黑色的旗袍，留着发髻。三次光临的时候，不断的拿着手帕，揩着眼睛，两眶红红的。（页 60）

至于宋庆龄在鲁迅葬仪上的讲话，由于到场群众踊跃，人数众多，情绪悲哀而热忱，加之当时政治条件和扩音设备的限制，有些人竟以为她没有讲话，其实抵达墓地后就按着原定的程序，由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讲话，继由田军代表治丧办事处作简短致词。《纪念集》中《一代文豪鲁迅先生出殓记》称：

到了万国公墓，已是下午四时半的光景了。徒步的人群，虽因路途的遥远与沿途不绝的歌唱呼喊而感到疲乏，但在纪念堂前举行告别式时，反而精神加倍地唱着悲壮的哀歌，伸长着颈子倾听纪念堂上诸领袖之沉痛而雄壮的演词。而且每在某一演讲者说出奋发激昂的言词时，振耳的掌声和喊口号声像巨涛般的激荡着狂吼着。其时有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章乃器、内山氏与邹韬奋先生的演讲。（页 38～39）

可是会场人如潮涌，悲歌呼号，因而演说词往往听不清楚。《纪念集》中《鲁迅从殡仪馆到墓地》称：

一到墓地，安排了行列，立刻举行告别式，在鲁迅先生巨幅画像之前，仪式虽简单，情形却非常的热烈。所以，如蔡子民、章乃器、宋庆龄的演辞，都给群众的呼声所淹没了。（页 50）

宋庆龄的演说，群众因而听不清楚，《辛报》10 月 23 日《鲁迅在群众的热忱里安息了》一文称：

宋庆龄女士经群众要求，也讲了几句话，但她的话，也可惜不能达到我们的耳朵里。（《纪念集》页 54）

《辛报》10 月 24 日报道群众颇觉遗憾：

宋庆龄精神很健活，并不衰老的妇人，她经群众大声呼唤而出来讲，可惜这柔弱的声息，我们一个字都不能听得出。这，认为是遗憾的；宋庆龄女士向大众说话的机会，我们很难碰到的。（《纪念集》页 50～51）

据此看来，1966 年版《宋庆龄选集》中在鲁迅葬仪上的讲话，是怎样从北新书局的《鲁迅纪念集》中选录出来的呢？——它是从《纪念集》第一辑的许多报道中拼凑起来的，而这些报道各不连贯，有的并无引号。这里将《纪念集》中所述宋庆龄的演说，依次抄录如下：

嗣由沈钧儒报告鲁迅事迹，又由宋庆龄演说，略称“追悼鲁迅先生，须效法先生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页 10）

宋庆龄先生的演说，是在群众之热烈的掌声中出现的。她说，现在鲁迅先生死了，可是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完成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工作。当时“中山先生万岁”的口号，便由群众大声地喊叫出来。（页 39~40）

宋庆龄女士说：“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精神，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页 46）

这里即可清楚地看到：1966 年版《宋庆龄选集》是怎样编连组合出宋在鲁迅葬仪上的演说的。《宋选》1966 年版的《出版说明》说：“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注明了此次付排所依据的底本。部分文章在收入本选集时作者曾作了一些修改。标题大部分依据底本，少数系由编者代拟的。”值得注意的是，1966 年底正是个空前异常的时期，许多工作都越出了正常的轨道，编辑文集时篡改代拟、拼缀组合等情，都不足为怪，且编者考虑也具苦心。但依编辑学与文献学的要求，即使辑佚钩沉，网罗碎金玉屑，也应逐条分列，各自注明确切来源，不得擅自编连搭配成为一篇完整独立的文稿。

鲁迅先生的葬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不能出面主持，于是由宋庆龄、沈钧儒等为领袖的救国会出面的。至于照料具体事务，则由胡风、肖军、黄源及雨田等。宋庆龄于 1977 年 8 月 2 日回忆道：

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我在会上致了悼词，可能有人记录下来了。记得当时在法新社工作的胡愈之亦在场。（《追忆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 年 1 月第 1 版页 2）很可惜，至今也还没有见到可供发表的宋庆龄悼词的正式稿本。

《雪峰文集》第四卷有几处讲到鲁迅病逝前夕及治丧的情况，冯雪峰这样说：

[10 月]18 日下午，我去看他时才知道他的病已转为剧烈；……

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回忆鲁迅逝世》，《文集》卷四页 265）

第二天我还没有起床，周建人就来电，说鲁迅病已垂危，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孙夫人。我赶到时，鲁迅已断气半小时，过了一会儿孙夫人也来了，立即在孙夫人参加之下商量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初的名单记得有毛主席、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肖三。毛主席是我提的，宋庆龄也同意。……

20 日沈钧儒、宋庆龄、许广平和我去看了坟地。棺材是宋庆龄送的，价三千元。……

对出殡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游行示威，走很多路；一种是反对走远路，主要是要开成墓前大会，只要开成墓前大会就是胜利。……我们主张后一种办法，宋庆龄、沈钧儒都同意，结果，墓前大会开得很成功。鲁迅逝世形成了一个政治性的运动，成了革命力量的一

次大检阅。盖在遗体上的是一面“民族魂”的锦旗，当时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时期，觉得用“民族魂”三个字可以概括鲁迅精神。字是沈钧儒写的。（《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四《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及其他》，《文集》卷四页 496～497）

胡风不幸入狱后，1976年11月16日，照监狱当局转下要他写有关鲁迅葬仪的材料，以《关于鲁迅丧事情况》为题，用《我所经历的》为副题，开始说道：“不久，冯雪峰赶来了，好像是对遗体面部吻了一下。马上要我同到楼下客厅，这才看见宋庆龄先生已经坐在那里（不记得是否还有别人）。”其中还回忆了一些关于宋庆龄的情况：

队列到公墓后，就在公墓进门不远的灵堂前空地上从灵车上将灵柩抬到凳子上搁着。在灵堂前的台阶上举行仪式。除了很少在公众面前讲话的宋庆龄讲了话以外，救国会沈钧儒（似乎还有章乃器）以政治人物的身份讲了话，肖军讲了话，但他们的讲话内容我没有任何记忆。姚克也站到了台阶上，记不得他是替孙夫人翻译还是自己也讲了话。当时谁愿意站到台阶上去都不会受到阻止的。最后是，救国会献的一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字的红旗，由救国会的王造时、李公朴还有两个谁，每人拿着一个角盖到了棺上。

在整个过程中，我是站在围着棺材的群众里的。

补充一点：宋庆龄在殡仪馆有一次有记者托我要求她发表感想时，她要我代表她讲几句。我回复记者她此时不能表示什么，因为我担心说不出能代表她的适当话来。后来，在入殓前，从我禁不住充满热泪的眼里看去，她也在一面走向棺材一面不断揩着涌出的泪水。在整个丧事中她和坐在殡仪馆大厅一边、穿着整齐西装的内山不断地流着泪。在仪式上她的讲话很短，而且是急急忙忙用英语说的。看得出她感情很激动，不说几句在感情上过不去，要说又激动得不能多说。

丧事两三天后，我去看许广平，看到茶几上放着包着一厚叠纸币的信封，上面写着孙中山式的粗笔划“周同志”三个字，下面当有“丧礼”之类的字吧。我模糊记得，开始救国会曾声明过他们要担负全部丧事费用，但后来没有拿出钱来。（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198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版页第19～20页）

我见闻狭窄，宋庆龄在鲁迅葬仪上的演说用英语讲的，还未见他人说起。如此看来，原本简短的演说在匆促和悲痛中不易记录，可想而知了。然而，前引宋先生的《追忆》，她说：“可能有人记录下来了。”她显然企盼着的。

这里应该扼要地讲一下救国会了。救国会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简称，是以上海文化界、妇女界和大中学校学生为主力发展和组织起来的。当时是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三个月后，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出版，进一步发扬《生活》周刊的旨趣，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光辉旗帜。接着，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钱俊瑞、金仲华、徐雪寒、周谷城、王造时、周建人、张仲实、郑振铎、许杰、钱亦石、杨东莼、沈兹九等283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加之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展开，沈兹九、史良、胡子婴、陈波儿等发起成立妇女救国会，在全国各地获得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最后，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全国

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作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6月1日，发表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6月5日，国民党上海市长公然诬蔑救国会是“少数野心家”操纵的“反动的东西”。宋庆龄于同日致函救国会领导人称：“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毛泽东于8月10日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声明同意救国会宣言、纲领和各项要求。救国会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正如一位支持者在《救亡情报》上写道：“我们的领袖充分地表现了他们对于民族的忠心，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权威的不屈！”

与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列名于治丧委员会的胡愈之，是鲁迅在绍兴二中的学生，1933年9月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在上海同鲁迅关系很好。他是我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与韬奋在鲁迅邀约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于抗日救国运动所作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和帮助沈钧儒等建立救国会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在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写的《我的回忆》中说，1936年4月间，完成了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汇报情况的任务后，与潘汉年一道由莫斯科回国，此后由潘汉年直接领导。潘对他说：“你以后只管救国会的事。”冯雪峰从陕北出来时，胡愈之说：“党中央领导同志告诉他，可以先去找鲁迅和我，以摸清上海党员的情况。”鲁迅逝世那天清晨，他就接到冯雪峰打来的电话，“冯雪峰还告诉我，鲁迅先生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组织来办，比较合适，要我和救国会联系和组织。”他虽在救国会中没有担任职务，但人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团体里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夏衍曾说：“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永远也不能忘记愈之同志所作出的难以估计的巨大的贡献。”楚图南说：“1936年，他和全国各界救国会一些领导人一起，通过组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救国会的负责人主持了送葬仪式，沈、宋、章、邹都在灵前发表了简短演说，胡愈之宣读了悼词，据我所读到的回忆当年文章，有些鲁门弟子可能还不了解救国会的政治全貌。

那时，中共在救国会中的党组书记是钱俊瑞。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每星期日出四开一张。遇有特殊情况加出增刊或号外，秘密发行。编辑人先后有徐雪寒、刘群、恽逸群、吴大琨等，归钱俊瑞、胡愈之及钱亦石领导。

关于鲁迅的丧仪，《救亡情报》第二十四期（11月1日出版）刊载了题为《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的记事文章。作者署名静芬，曾经以《救亡情报》记者的名义访问过病中的鲁迅。我与张小鼎同志谈及此人，他立即帮我查阅《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原来静芬就是名记者陆诒。我听徐雪寒同志说，当年担任《救亡情报》的记者有两人，一位即陆诒，另一位是恽逸群。静芬笔名首见于《何香凝先生访问记》，载1936年5月6日《救亡情报》创刊号。陆诒又以“芬君”笔名，写了《鲁迅先生访问记》，载1936年5月30日《救亡情报》第四期。静芬

(陆诒)这篇写于22日送殡归来后的报道,内有《万众送别他们的前驱》、《壮烈的游行》、《墓畔演讲》等记述。在《墓畔演讲》的第三段写道:

宋庆龄女士在群众的热烈要求下,也出来激昂的说话:“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我以为,从记述较为完整,文句不觉突兀,出处正规可信等因素说来,《救亡情报》所载宋庆龄在鲁迅葬仪上的演说,可辑入宋氏文集,而以1966年版拼凑的两段话,作为附注用,以稍稍弥补演说词失记的遗憾。

为宋氏演说,搜讨经年,未能圆满解决。此稿征引繁杂,多而寡要,只算是读书杂抄,敬质于大雅方家。

1992年10月附:陆诒前辈复信

拙作《关于宋庆龄在鲁迅葬仪上的演说》在《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发表后,得知陆诒同志在沪住址,即请中国福利会友人为我往访求教,不久即得1993年5月19日复示如下:

戴文葆同志:

您好!

我为《救亡情报》写的为鲁迅先生送殡的报道,当时记述了许多人的讲话,其中也有宋庆龄女士的讲话。您所引用的材料正确无误。我记得很清爽,那天她讲的是上海话,略带浦东话的腔调,(实际上上海本地人讲的就是浦东话)决不是讲英文。可以估计,她在群众大会场合,也不会讲英语的。我至今尚保留《救亡情报》合订本,您有什么需要,我还可以找原报核对。勿此

敬颂

著安!

陆诒上

五,十九。人生采访者的人生

那还是红旗插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夏天,我被雇用的报馆着意激扬爱国主义,开辟了《中国的世界第一》专栏,配上图像,刊登在显眼的要闻版上。我受命写的第一篇为珠穆朗玛峰(不用“额非尔士峰”旧称)。每星期一都认真地讨论下一批选题。这些五六百字的系列专稿,后来汇编成小人书形式的几本专集。当年我是个奶油小生,无知而愉悦。比我年长一倍以上的前辈,也都未能预见到一个好题目:价廉物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堪称“世界第一”的名物。在众多的知名与无名的知识者中,报馆的台柱成员萧乾老师,其后的经历证明,他无疑是优秀的代表者之一。

萧乾那支笔常撩动读者的感情,十多年来所写的文学回忆录尤其耐看,像《未带地图的旅人》(《散文特写选》代序)、《一本褪色的相册》、《往事三瞥》、《在洋山洋水面前》、《北京城杂忆》,以及这

本 328 页与前揭代序同名的回忆录，读来无不令人带泪微笑。人生嘛，酸甜苦辣咸，本来是五味调汤。唉，多么富有传奇情调的一生，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斑斓多姿、笑啼皆是经历啊！

早在燕园伏案日，他就要选择一个接触人生最广泛的职业，选中了新闻事业，而且特别看中跑江湖的旅行记者生涯。接着如愿以偿地走进天津大公报馆，开始接触广泛的社会生活，并有机缘在海外转悠了许多年。1949 年 8 月，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于故土的决定。从此寒来暑往，风吹雨打，雷鸣电击，直面 1957 年的 6 月雪，奋力泅过 1966 年的红海洋，接触到的社会生活更加深入，格外绚烂奇巧。不过，就其本身而言，并不配用“生活”这个庄重的美称，只是签了死契之后的“存在”。“存在”即寿长可真算是福气，终于听到了 1976 年 10 月喧天的锣鼓，挨到了 1979 年的春天。这本回忆录前后七章，从 1910 年“黎明曲”起，1979 年则被惊喜交并地题作“重见阳光”了，尽管那时还在臭水沟旁的门洞里栖身。

这位人生采访者的人生很不平凡。他说：“我一直把人生当作采访的对象和场地。”“我一生崎岖坎坷，然而心目中始终有所追求。”他自命为乐观主义者：“我一生受过罪，吃过苦头，可也有过好日子。”这回忆录中就坦率地说明多年所持的祸福观就是阿 Q 式的。莎士比亚尝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说的是，生养阿 Q 的土壤至今还很肥沃哩！只是作者仍抱着遗憾，总爱说自己是“未带地图的旅人”。“未带地图的旅人只能是个盲目的旅人。”人世间的旅行究竟要带甚么样的地图呢？需要绘有威武的山头、坚实的靠山、交通灵便的关津、四通八达的码头，以及可供蹊谋的隧道吧？未带地图使作者屡屡引以为憾，可惜书中并无直解。

许多情节写得催人泪下，令人品味。讲到少年当羊倌时说：“妈妈死后，除了老姊姊，广漠的人间对我成为冰凉的了。每当我推开栅门，三四十只咩咩叫着的羊向我扑来，就不禁感到一种温暖，一种慰藉。”它如写暮色苍茫中过马恩河，在瑞士的思索和二等火车上的聊天，以及童年挚友二秃子的相识和宴请等，莫不引人入胜，殊难一一列举。

天时有阴有晴，人事也有个否极泰来。琳琅满目的作者履历表上，织地毯、送羊奶、书局学徒、干校泥水匠、“文艺界的王耀武”之外，又添上人民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了。台湾岛上给他出版了《我的人生采访》。他早在 1949 年就感到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没有错，他熬到了漫长的黑夜的尽头，当之无愧地成为价廉物美的知识界的代表之一。这也表示出所谓中国特色之一。

在这本回忆录中，作者有意淡化了感情生活中的折腾和遭际，读者可参看他的《搬家史》，文洁若发表在《百花洲》上的“臭妖婆”自述，还有李辉那本《浪迹天涯——萧乾传》。培根说得好：“史鉴使人明智。”可是，人生之旅竟如此艰辛叵测，明智又谈何容易？

1992 年 6 月

附：萧乾老师来示

萧乾老师著《未带地图的旅人》回忆录，蒙他厚爱，先后赠我两册。我读后思考颇久，写了一篇短短的感想。他三次回奔祖国，充满赤诚的

爱国热情。然而我凭直感，以为他口袋里缺少一册《祖国政治形势图解》，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他未带的“地图”。他读拙作后来示赐教，指出我对他“似有些不甚了了”。诚然，1946年夏在上海才在靳以老师当面介绍下识荆的。当时我正年少，不久我们同在报馆里，背后人们戏称他为“小大英”，因为他和英国新闻界、学术界关系密切。他本人却是十分爱国的！我多年跟着感觉走，认为吾师旅行忘记带政治形势图了。幸蒙指正，兹将来示照录如下：

文葆兄：

昨天会后没来得及聊上几句，我正想谢谢你在本期《读书》上的大文。您在文中对《未带地图的旅人》，似有些不甚了了。其实，在弟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发表在1979年《当代》第一期）开头，即提起1929年弟与已故杨刚在圆明园中一段争论。她塞给我不少苏联文艺理论（如卢那察尔斯基的），原文抽象，译得又莫名其妙（二三行才见一标点），我实在读不下去，就退给了她。她说那不能不读，那是地图。我说，我要自己走路，“没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她说“会掉进深渊，或在茫茫的生活森林中迷了路，给狮子老虎吃掉”。我说没关系，狮子老虎肚子里比埋在黄土下面还暖和……”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带了一辈子地图的旅人，却先我而逝！你我都是幸运者，所以非跑好最后这一圈不可。

勿问

著安！洁若附候。

弟乾上

92.7.1.

我感谢萧乾老师，他不过是听了热情的靳以老师的介绍，还未见到我，便为我扬誉，把我引进了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并非仅仅因为我投寄三篇论文蒙王芸生总编辑录用。我也怀念老大姐杨刚，在报社讨论社评选题，或是商量管理事务，人员工薪，不但在狭小的会议室里拜领过她的高见，那时还承她特别关注，到我的住处教诲。二人对坐，讲到深刻处，我把自己全面解剖给她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她那平板的面庞和严肃的眼神。她是老前辈，谬蒙错爱，她调动工作后，还教人勿忘和我多接触，不使我产生孤独感。更难得的是，她在宫阙办理机要、公务繁重中还记住我这个并无作为的人，竟然使我在大人先生中间博得了不实的浮名。其实我稚嫩无知，对许多事从不深思记挂，悠然自得，在工作环境中从来没有一点儿孤独感。即使后来在亿万人被唤起大革文化命、我当清洁工时，仍然觉得我还和千百万清醒的人们在一起，愚昧和野蛮隔离不了我们，身旁天天有人以“安贫守拙”相慰勉。我和乾师一样，深感刚强纯正的老大姐走得太冤太早，黑色的五七年也未能跨过。她如健在，一定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这几代人太抱憾了，那时报国无门，投诉无路。乾师，是的，“非跑好最后这一圈不可！”

1994年6月河西文化的考察

穿越我国甘肃河西走廊，通往新疆及中亚的丝绸之路，也是文化艺术之路，民族融合之路。汉武帝时先后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至昭帝时又置金城郡。由于军事的原因，徙民充边，促进了河西的开发。经济的发达，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兴盛。至十六国时代（公元 304 至 439 年），五凉政权控制下的河西地区，号称“多士”之邦，在中原鼎沸、兵荒马乱的情势下，表现出对学术文化的尊重和热情。《五凉文化述论》的作者，在铁马金戈的沙场之外，作了一番文化艺术发展的考察，不足十万字，却是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有特点的专著。

河西先后出现的五个凉国政权，即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可从西晋永嘉、建兴之乱算起，到北魏拓跋氏统一北中国时，前后一百多年间，在保存和发扬中原文化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时值中原板荡，战乱相乘，百姓避难流徙，或奔辽东，或下江南，再则逃命凉州。自刘渊起兵后，洛阳有识之士，“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晋书·张轨传》）河西走廊继续发挥独特的历史地理作用，成为江南以外的另一文化中心，形成了取代中州系统的五凉文化，学者或称河西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

读《五凉文化述论》，想起陈寅恪先生。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在历史研究中提出过不少新见解。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指出：逃到凉州来的中州人士，对五凉政权的建立，河西胡族的汉化与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提出“河西文化”为隋唐制度三个源头之一。“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轮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他强调指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后，继绝扶衰。”

河西地区的文化，不仅保存了中原儒学的传统，而且充分汲取了西域、中亚的外来文化。石窟艺术，音乐舞蹈，佛典译述，都城建筑等，对南北朝及隋唐都有显著影响。灿烂的敦煌艺术洞窟，正是河西文化的瑰宝。从五凉史事中看到：割据一隅的各族统治者，多能理解发展文教事业，培植与延揽人才对于稳定政权的作用；胡族本较落后，积极与中州流人相结合，进步很快，识者因有“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的赞叹，可知华夏文化为各族共同创造；河西文化既注意保存与振兴中原儒风，又传播与发展了佛教。传统文明的继承，域外文化的吸收，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共处融合，终使河西成为当日中国文化的先进地区。中国历代文化的辉煌发展，多在王朝统一上升的年代，但在中土残破荒落之际，某些一隅边远之地，却能为文化的光辉所掩映。这种特异的历史文化现象值得深入研讨。

五凉文化的研究，困难首在文献不足。大陆学者中，前有曹道衡致力于文学方面的论述。本书作者博采前代典籍，兼取今人成果，参以自己心得，全面研讨五凉时期的学术论著、文学创作、宗教传播、教育措施及艺术活动，提供了五凉文化的比较清晰的轮廓。在材料的整理方面，如查考久已散失的《敦煌实录》佚文辑录工作，又如发现文学家二十二人之多，均见功力。河西历史还有不少空白待补。地域文化的考察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了。

1992 年 3 月形神兼备的肖像画

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1879—1940），在经历了国内严重的纷争后，于1929年被赶出苏联，旋赴土耳其，开始了文学活动，撰写自传和俄国革命史。此后在流亡生活中，写了一些人物评论。他本想将原在国内发表的人物评述合编在一起，计划出版《肖像集》，可是有几篇还未写完，在墨西哥就碰上斯大林挥动的利斧结束了生命。

《肖像集》是费尔什京斯基从美国哈佛大学档案室所藏的材料中选编而成，同一题目的未完稿也辑集在内。计有十三篇，各篇的题目是：约瑟夫·斯大林，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马克西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关于杰米扬·别德内，克拉幸，沃罗夫斯基，越飞，谢列布罗夫斯基，叶努基泽，布柳姆金。这个人物传记集由美国查理兹出版公司于1984年出版。

传记作品，写真入真事，首重考信。托洛茨基知道人们把他说成是斯大林的宿敌，照例说他“仇恨”斯大林。他声称：“私仇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上一般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和可鄙的感情。”在致《生活》杂志编辑的信中说：“仇恨毕竟是一种私人关系形式，而把我同斯大林分离开来的却是这样一些如火如荼的事件，它们能把一切私事烧成灰烬，不留痕迹。”在前苏联业已解体后，如火如荼的事件也成为历史的灰烬，读者在认识上势必有所变动了。

然而，《肖像集》对于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仍旧具有认识价值，尤其是人们经受历史事变的烈火煎熬之后，会冷静地辨识某些评述的真实程度。这些人物早年在革命风云中的言语举止，后来在克里姆林宫墙里面的论争分合，作者根据逼近观察，把他们的形象描绘出来。尽管充满了政治的评述，却也不乏文学色彩与深层发掘。本书是一叠粗线条的肖像画，有几幅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不少描绘可补史文之阙。

书中展示了高尔基各个时期的精神面貌，“在这位非凡的自修成功的作家身上，最为深刻地蕴藏着对文化的崇拜。”作者称：“高尔基在他已经再没有任何话可说的时候去世了。”写卢那察尔斯基在全欧俄国侨民中活跃地工作，说俏皮话，用左嗓子唱歌。他有多方面的修养，深得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喜爱。写布哈林只有几个片断，说到斯大林控诉他在1918年打算谋害列宁时，作者说：“天真烂漫、一往情深的布哈林极为尊敬列宁，像婴儿热爱母亲一样热爱列宁，只要他在辩论中顶撞了列宁，便马上屈膝下跪。”斯大林其人其事，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从1913年在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京城维也纳不寻常的一瞥起，叙述他的家世与成长，在十月革命时期的表现，剖析他固有的性格，列宁和斯大林最后的斗争和决裂，列宁的逝世和安葬等；还有“双星：希特勒——斯大林”之类的比较论述，涉及20世纪前期国际关系与重大事件，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这些分别写成于1939年底和1940年初，铺陈事实，文笔犀利，如老吏断狱；且预言：“历史的报复比最强有力的‘总书记’的报复更为可怕。”不幸而言中了！

1988年，前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30年代的四起重大错案平反，包括托洛茨基两案。暴力专政与海外放逐，都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了。

先秦礼制研究，是个繁难艰苦的课题。古代社会异常重视礼，一步一趋，事人事鬼，无不与礼制相关。唐人孔颖达“毋轻议礼”的告诫，适足以说明礼仪礼俗十分重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在游说困厄之中，还领着学生习礼于大树下。他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是行为规范，不仅是立身处世之本，也是为政治民之本，与政治社会（即礼治）关系至为密切。《左传》隐公十一年概括得很全面：“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中还有如下界说：“礼，政之舆也。”“礼，国之干也。”故何休《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注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这里是指礼乐刑政的传统，制度和习俗，人们在国家中的地位，形成一整套严格而冗杂的体制，不能与常言的精神文明等同相看。

《仪礼》《周礼》（古称《周官经》）及七十子后学们所纂辑的《礼记》，是研究我国古代礼制的最重要文献。然而，《三礼》却又是古代典籍中最模糊难读的一类书，虽有疏解、释例和图解等导读，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关制度规定，先王奥义，进退揖让，名物礼器，以及历代损益变革，头绪复杂繁缛，深入影响官民生活，甚至形成法律性的约束力量，令人厌烦生畏。自汉以来，治礼撰述成书的，不下千百，就中以东汉郑玄、唐初贾公彦、清末孙诒让功力最深。郑氏博学多闻，融贯会通，写成简约的注本。比如他对《仪礼·丧服》“君至尊也”的“君”字注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礼之为用，在事君父，郑玄注释这个“君”字，把封建社会从国到家，乃至入闺闼，各级掌权的至尊都说透了。读鲁迅1933年杂文《沙》，其中说：“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旧中国的大小统治者都是“沙”

（Uapb），揭示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权力构成。我觉得是这条郑注最妙的发挥。前人覃精研思，毕生致力，不外是解释字、词、句，说明章节意义，考证人名地名，史实典故；最上者则借注释来阐述本人思想观点。至于《三礼》何时成书，何人撰著，历史真价何如等等，只研名物训诂而不涉及，或是各承师说，终身研之而不能明。《周礼》一书，说者最为纷纭，从刘歆、郑玄到孙诒让，都认为是周公致太平之书，而与郑玄时代相近的何休，却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王安石废弃《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程颐、朱熹等则指陈《礼记》之文多谬误，非圣人之言。学者之间驳难不已，而维护礼制则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学术界对每种重要经典几乎都作出新的注解，《三礼》方面可称道的著述不下三四十部，可惜与古史均未能扣紧。

我国历代王朝的驭民之术，都重视礼制。走马灯式的王朝，从三代到清朝，都各有一整套礼仪制度。孔子就说夏礼、殷礼“吾能言之”。礼制对于巩固尊尊卑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宗法制度，具有重大作用，目的在使皇基永固，亿万斯年。故将礼制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考察，必能大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而不在于争论或论证制礼作乐究竟为周公抑为孔子了。

乾隆中叶，江藩为初学治经者写有《经解入门》一书，靠实立说，甚为阮元所赞赏。其书卷四谓经与经、子、史相表里，第二十一说：“经与史异学，而古史多与经相表里。”他指出司马迁书“所搜辑多先秦故

制”。比他早二十多年的章学诚，已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对治经主张从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其立意在于将治经引向治史。《三礼》内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供取用。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学，就倡导“不把他当作经学，而把他当作史学”，利用这些材料来进行文化史、制度史、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从而发掘经书内含的认识古制的价值。吕思勉《经子解题》中又说：“礼原于俗，故读古礼，最可考见当时社会情形。”王国维16岁（1892年）以幼时储蓄之岁朝钱购读“前四史”于杭州，其后经历戊戌维新，东渡扶桑，研究流沙坠简，殷墟甲骨。正如他所说，新发现引起新学问，他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一代大宗师。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他从搜集新资料入手，掌握综合分析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就古音以求古义，坚持二重证据法，锲而不舍，不慕名利。他光大了他亲历的新资料发见的时代，既为文化精神凝聚之人物，以读书为生命，又熏陶和造就了若干读书种子，指示出为学津逮。业绩具在，毋庸赘言；流风教泽，以育后学。二三十年代以来，疑古派、实证派及马克思主义派，都从王氏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论文中获得教益。现今健在的学者专家，篋中犹存未刊稿，垂老尚带博士生，这里不能一一说及他们。

礼学礼制的研究，毕竟是个冷门，但从这个冷门望去，可以遥见古代社会的风貌。近来冷门之内传出一些音响。我从台北《新史学》和京港台同时出版的《中国文化》上，先后读到金春峰的《周官》研究新论，全面驳难徐复观的《〈周官〉成立之时代》。金君为张岱年教授之弟子。新近又承玄武于风凉涧中以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转赠予下走。陈君常年以来在沈文倬教授指导下研究古礼，据闻用力颇不少。金君全稿十四章二十余万言，尚待版行；陈君博士论文已由湖南方面出书。两君如入英伦巴力门，将坐在后面凳子上，通称“后座议员（back benches）”。他们是礼坛新秀，提挈纲领，侃侃而谈，读来令人瞿然而起。

《先秦礼制研究》六章，陈君首论礼的真谛与起源。引其本师沈文倬所下定义：“礼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建立的“很大一部分制度规程就是‘礼’”。作者认为这固然道出了礼的真谛，但他补充说：“鄙意所不同者唯以为凡人类社会皆有礼。”在先秦礼书一节中，扼要介绍了顾颉刚及其同时与其后学者们，深入研究三礼，结合地下考古资料，作出令人信服的成绩。在“礼不下庶人”一节中，说明国家出现之后的先秦社会，的确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庶人自有庶人之礼。礼制本来就是要区分等级的，乐亦不下庶人。至于礼的因革，作者强调“各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礼制”，“世上何曾有过无因无革的一代之礼！”绪论阐明与礼制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后，从第二章开始，逐步展开对先秦各个时代的礼制研究，由先殷起，讨论有虞氏以前与虞礼、夏礼；而后为殷、西周之礼。第五章讲春秋时期周礼的衰变，第六章为战国时期周礼的崩溃。另有余论，略说先秦边远民族（所谓夷狄）之礼。

重视礼制研究的杨向奎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作者详考博辩，以《仪礼》为中心，旁及《礼记》、《周礼》及多种古文献与考古资料，运用二重证据，清晰翔实地勾划出先秦礼制的起源、盛衰的全貌，提出了一

系列的问题，根据他自己的判断，解决了许多古史中的疑难，也推动了礼学的发展，对我国古代精神文明与物质建设的认识与评价都有积极意义。”本书的特色，就是重视利用考古发现以论古史古制。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纸上的材料与地下的材料结合起来，将古文献与出土文物结合起来，相互参证，推求结论。王国维开《古史新证》课所推广的方法，在本书中有充分地运用。而王国维所未能见到的大量的考古发现，广泛的民族调查，在本书中又得到充分地运用。所以，胡厚宣教授序中提及杨宽《古史新探》中七篇古礼的探讨后称：“《先秦礼制研究》正是利用这样的方法撰述而成。他花费了不小的功力，广泛引用了大量古代礼籍和经典文献，仔细参考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和民族调查的资料，结合近人考证的论文，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胡氏审阅过这书的底稿。由于引用民族学资料，本书的某些段落便展开三重证了。

作者在论述中，不时给自己提一些问题。例如礼与夷夏之辨，他认为“历来诬蔑夷狄根本无礼无乐的论点，乃是根本错误的”，“夷人与华夏族各有礼”。“礼制之相异尤当注意。此即礼与所谓夷夏之辨。辨是为了弄清各民族礼制的演变，推广而及中华民族全部文化的发展情形，清理出若干规律，或于今日之文化建设有益。”这个意见是相当可贵的，但由习俗进而作深层的考察，必须凭借确切的材料。司马迁曾就礼与法的作用回答上大夫壶遂称：“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作者也说：“此事谈何容易，而于先秦领域尤难，因为夷夏之辨的根据，无论是地下资料，还是可靠的文献记载，都是很缺乏的。仅仅比较那些从各考古文化得到的地下实物，也难于得出夷夏之辨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孰夷孰夏，提出个设想罢了。

作者也申明，有些论述与考古学者们的意见有同有异。例如有虞氏前葬礼的萌芽，讲到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就作者所见材料论，由于已发掘两千座墓葬，对大汶口的葬俗已有较多了解。这一文化遗存发现不下百处，正可利用典型遗址所反映的文化习俗与经济状况，进而稍稍测度其礼俗。又如夏代，司马迁写的《夏本纪》很简略，考古学上的夏代仍是个谜。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还在豫西和晋南一带进行，用考古手段去丰富和证实夏代的历史，可从而补充说明其礼制。又如在太湖流域发现了许多良渚文化的墓葬，有的随葬品属于礼器性质的玉器达几十件之多；且在浙江余杭县安溪乡瑶山还发现一处面积约四百平方米的祭坛。在辽西地区发现了约五千年前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东山嘴遗址有圆形祭台和方形祭祀基址，还有作为崇拜对象的成组立石，以及包括裸体小型孕妇像和大型人物坐像在内的陶塑人像二十余件。牛梁河祭祀遗址出土了彩绘泥塑人像残块，圆润的肩膀，用晶莹的玉球嵌成的炯炯双目，发育不同的乳部，肉质感很强的修长的手指，显然是供奉姿态优美的女神群像的所在。附近山梁上还有七处大型积石冢群，一般有数十人并列而葬。诸如此类的祭祀遗迹和墓葬，都透露着原始礼制的信息，是通向文明道路的标记。到国家出现后，“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礼制的渊源也可循此论述。此外，说一点极微小的事：书中几次论及帝王践祚，都称“登基礼”。学术著作中，还是用“登极”为宜。

作者在后记中说，此书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又是他计划写的《中国礼制史》上册。老师教导他：“礼学与利禄无缘。”“礼学应为终生之学。”两汉虽列于学官，延阁温室，久化灰烬，礼学早就是异常寂寞的学问，几部焦黄书，一条冷板凳。及今假冒伪劣商品猖獗，公平买卖竞争甚难，有头有脸者动辄异化，如顾亭林所说，“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毋怪乎作者想起孔老夫子话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我读其书尚不知其人，只从包封勒口上得知，他二十岁时碰上大革文化命，即罹文网而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江畔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所幸中华大国毕竟曾是礼义之邦，耍阳谋乱舞铁扫帚不得人心。时来运转，他终于又进了高校之门，蒙几位老师循循善诱。在踊跃争先向钱看的热浪冲击下，他仍然坐在冷板凳上，坚持治礼，不曾懈怠。我从不鄙视阿堵物，举双手赞成鸡鸣即起，孳孳为利，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可能幸福。同时，我甚望冷板凳不要撤，还请酌情多设几条，召请有志于学术者来坐。作者后记里有一句话使我感动：“二十余年来求学不易。”可见颇知国情，非徒自叹。二十年前“反革命”，二十年后礼博士。这真是历史新时期的佳话，不但实现了个人的价值，更重大的意义是，具体生动地表现着乱邦危邦的转机，岂不猗欤盛哉！

冷板凳上说礼，冷门书还能印行，这说明什么？还是引顾亭林《日知录》里一句话：“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

1992年9月词人终古泣天涯
——汪荣祖著《陈寅恪评传》读后

那还是80年代之初，我专程南行，直到陈寅恪先生为学术而献身死难的地方，满心企求寻觅一部介绍其人生平学行的专稿，以供学界后进观赏考索，时承友人惠允代达。北归后专函屡摧，音讯渺茫。自知隔世有年，疏离士林，鄙陋寡闻，以致所求匪人；且又甚感我所企望的对象，之所以拒不作复，原来是颇知惭愧。

其后，相继读到俞大维、赵元任、许世瑛、余英时诸家悼念文章，以及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辑集的《谈陈寅恪》、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先生历年心血所寄的专著、诗文，也在他生息的祖国出土面世。加之彼时印制工价不断上调，出版单位掉头“向钱看”去，自知力不从心，便抱憾地搁下了觅稿的念头。

在读到关于陈寅恪学行的综述中，寓美学者汪荣祖的作品引起我的阅读兴趣。他的《史家陈寅恪传》，1976年由香港波文书局印行，限于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海内外研究所深切的思索尚待开展，全传仅七万言。后来一些有关陈氏的资料陆续刊布，他的新写本增为十五万字，于1984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刊印。匆匆又过了八年，有关陈氏学行的研究及有意义的资料续有公表。他见闻益增，汰芜添新，又有新写本《陈寅恪评传》的撰作，顷已收入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国学大师丛书”问世了。

陈氏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史学大师，在许多研究领域，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学、敦煌学、突厥学、藏学、佛学，以及诗文小说证史等方面，都是前驱先路，取得了重大成果，指示了探讨的门径，后

迪了后学的思路。尽管对他的某一观点、结论不能首肯，但人们对他的才、学、识、德不能不低服。这种成就是有深厚的基础的。季羨林指出陈氏在国外求学的勤苦情况称：“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后生小子在大师面前首先想起一句话：“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这本新写的评传约二十万言，正文十六章。第一章“旧时王谢家”，言其家世，一门三代英才。第二章说明其一生文化态度。第三章起，阐述其学术生涯，“较诸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为不古不今之学”即指国史中古一段，申论其毕生研究的专业。其后叙述去国治目疾与流寓岭南，晚年目盲体衰，治学锲而不舍，完成《柳如是别传》长篇鉅制。最终“废残难豹隐”，死于文化大毁灭之时。末附参考书目十八页。作者历年的研究论述，得到海内外不少学者的赞同。这本新写的评传，既有他个人的研究心得，也吸收时人的研究成果。

寅恪先生的嫡侄陈封雄说过，他“最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使他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但是在他四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只有最初在清华大学的十年算是未受到很大的干扰”。寅恪感怀诗有句云：“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这两句竟成为他自身命运的谶语！

想到陈寅恪之死，国宝云亡，不免联想到莎士比亚《辛白林》中所说：“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让我再补上一句：我们诅咒这样的时代！

1993年3月百题系列的新制作

书市上年以来颇出现几种标明“100”的图书。这“百”字的含义，是举成数以言其多，从某一方面揭示历史或现实中的某种社会现象，将其有关知识比较完满地介绍给读者。这种策划意在促进知识的普及，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张秀平等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中国100系列丛书》、《世界100系列丛书》，是这类百题系列中值得注意的新贡献。

认识祖国的历史文化

《中国100系列丛书》，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战争、著作、文化为主线，分五个专题，以一百为限，来说明这些重大事件和个人活动、各类战争和文化典籍，对于中国历史脚步的走向，社会的礼乐法度，内外关系，分合演变，兴衰治乱，价值取向，传统心态等等，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依此引导读者认识祖国历史的灿烂内容，从而思考把握超越往昔辉煌的现代追求。

这种百题系列丛书，不同于一般通史著作。通史的编撰，在于通贯古今，纵论大势，如《史记》、《资治通鉴》等。近现代学者之作，如夏曾佑、周谷城、范文澜、吕振羽、郭沫若、翦伯赞及尚钺诸家，虽称

史稿、纲要、简编、讲话等，都从宏观下笔，综论史事，表述历史发展的
大体进程。至于某一人物的作用，事件的曲折，战争的经过，以及文
化的传播，名著的内容等，限于体例，难以多着笔墨。读者欲知其详，
需读纪事本末、专史、“三通”、会要、笔记，以及其它特辑、杂史。
这对于一般读者，颇不易寻。广西人民版《中国 100 系列丛书》，则提
供学习中国历史的便利，按求知之需，一卷在握，从古到今，于某一专
列，可获初步了解，随性之所近，再求精进。这部系列丛书，想来或可
受到读书界垂青的了。

这部系列丛书，各册由专家学者作序，能帮助读者进一步思考。例
如过去长时期只认定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不承认历史人物传记
是学术专著，又好像历史的天空只有一轮红日高悬，却不见满天星斗的
光华。白钢在《影响中国的 100 个人物》序中以《贵在历史的真实》为
题，他说，这是人物传记，“但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它不是全面、
系统地论述传主的一生，而是挑选传主一生中对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
事迹进行描写、叙述，寓论于史，文章做在‘影响中国历史’这一点上。”
他接着说：“从传记创作来说，倒也别开生面。清人郑板桥曾经写过一
副楹联，其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把这副楹联移
送给《影响中国的 100 个人物》，我想是恰当的。”陈高华在《影响中
国的 100 次事件》序中说：“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由大小历史事件
组成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来是历史研究的热点。”他指出：“本
书的内容，上起夏、商，迄于‘五四’，时间长达数千年。编者在选择
历史事件时，颇见匠心；执笔者在叙述时力求平妥准确，从中可见研究
有素，而行文的生动流畅，更便于读者的接受。”郭化若在《影响中
国的 100 次战争》序中指出：“这些战例的选取，遵循了这样的标准：决
定或影响某一阶段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某些王朝或民族兴盛衰亡的重大战
争；兼顾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在军事上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能
反映中国军事发展水平和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说及文化的内含是复
杂丰富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之一，只是近代由于专制制度
对学术文化的扼制，以致进展迟滞落后，张岱年在《影响中国的 100 种
文化》序言里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
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存储在传世的精神产品中，本丛书特意列举和评介
100 种著作，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瞿林东在序中指出：“尤其是哲学著
作和历史著作，曾经产生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每一位读者思考
和研究的。”他说及这种有限的列举难免存在局限性，然而却是一种尝
试，“毕竟是人们渴求了解精神的历史、智慧的积累之愿望的一种形式。”
“从而增益智慧，明确抉择，启迪新的创造。”对于这套《中国 100 系
列丛书》的编撰，也可作如是观，转引这几句话作为评价颇恰当。

这套丛书总计 180 万字，如加苛求，则文化一册尚嫌泛而欠要，事
件一册简而不详，框架与组稿都不容易。在全书整合上，各册行文明白
畅达，尤以目录的编制最具匠心，通常编者只把目录看作是单纯排列文
章题目，其实这是编书开门见山的第一页，要善于揭示内容，使读者一
目了然；立即获得深切印象。本丛书目录的编辑，在近年面世的图书中
最具特色；可惜在文化一册中未能贯彻到底。

这几年间，大街小巷，水陆码头，不断涌现黄色黑色书刊，污染生

活环境，毒害读者心灵。严肃文化处境日益困难。从我国西南边陲邕江之滨编印出这套《中国 100 系列丛书》来，健康而带新意，但愿以其设计之精巧，内容之严谨，能博得广大读者的青睐——我是这样希望的。

1993 年 9 月观察世界的窗口

自从明清之际以来，认识世界、了解环球列国的情况，一直是中国朝野上下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至今依然需要我们严肃地对待。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世界 100 系列丛书》，就是可以帮助读者观察世界的窗口。

回顾历史，清高宗弘历可说是对中国疆域的奠定有贡献的执政者，但在他晚年却错过了一次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乾隆五十八年（公元 1793 年），英使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要求与高层正式接触及扩大通商贸易，而 83 岁高龄的皇帝最后不予同意。早在明朝末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已进献世界地图。到乾隆年间，欧洲经过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7 世纪英国革命，随后爆发法兰西大革命，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东西方航路业已开通。这位对中国古典文化颇为精通的皇帝，却昧于世界大势，傲视外邦，自诩“天朝抚有万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把闭关锁国当作民族自卫，所谓“立中外之大防”。鸦片战争的洋枪大炮声，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林则徐、魏源呼吁开眼看世界。可是到甲午中日战争惨败，西太后那拉氏的重臣见到洋人还以扇掩面，而在事实上落后就得挨打，西太后屈服于帝国主义面前，她苟安媚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执行卖国的外交政策。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斗争中学习逐步认识中外关系问题，有两次大会制定的政策最值得指明：中共二大宣言在全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来没有哪个政治派别正面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终于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对外开放方面开始迈出了大步。拨乱反正的明智措施，活跃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心愿，从而推动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信息交流，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友好往来。

这套《世界 100 系列丛书》，既是改革开放、认识世界的要求的产物，反转来也大有助于改革开放和认识世界的努力，为读者了解外部世界作出了一份贡献。丛书包括《影响世界的 100 次事件》、《影响世界的 100 次战争》、《影响世界的 100 个人物》、《影响世界的 100 本书》和《影响世界的 100 种文化》五个分册。各册之内，按事件、战争、人物、书籍和文化对当代或后世的影响，再分列若干专题。《事件》一册内，上溯到公元三千多年前古代文字出现，下至今日举世瞩目的信息革命。《战争》一册内，从有和约传世的公元前 14 世纪的埃及与赫梯战争，直到今天前南斯拉夫的内战。《人物》则包括从古到今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学术泰斗与文化艺术大师、男女精英，汇集一册。《文化》与《书籍》二册中，内容颇为繁杂，从古代文明到传世典籍，荦荦大者，琳琅满目。分别而言，可随意选读；合而观之，对于世界历史的主要项目可得一种整体认识，这是系列书籍本身的长处。不过，这种系列书的编撰，由于选题内容涉及不少方面，既有重点，又有牵扯，不易截然划

分，难以做到全书各得其所。加之多人撰稿，某些题目有前后联带关系，评论有时贯串不周。有些选题阐释文字此长彼短，不免畸轻畸重。这些小疵，在本丛书内未能全然避免。

就认识世界看来，本丛书属于“知彼”性质。与本丛书类似，上述《中国 100 系列丛书》，也是以事件、战争、人物、著作、文化为主线，属于“知己”性质。在现代化追求的实践中，应当认识世界，认识本国，知己知彼，才能前进。再以本丛书内容时间跨度而言，对外国状况多属“谈往”，我请求考虑再编一套“说今”的系列书，讲述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知彼知己，谈往说今，将更有助于理解当今世界了。

最后再说一点阅读本丛书触发的感想，希望致力于祖国现代化事业的人们，要经常保持对世界精神生活的关注和认识。

1994 年 3 月海洋的召唤

生命成长的摇篮

浩瀚无垠的海洋，是原始生命的诞生地，也可以说是人类远祖的乡里。因为没有水便没有生命，所以说海洋是生命成长的摇篮。地球上的海洋分为主要部分和附属部分，主要部分叫洋，附属部分叫海。海是洋的一部分，都指辽阔深广的咸水区域，只是从地理学的观点来说，海是比洋小的水域，其面积约占海洋总面积的 11%。据一项资料表明，海洋中的水量约占世界水储量的 97%。其余的水基本上蕴涵在南极洲和格陵兰一带的冰层中。直接可用的淡水，只占世界水储量的 1%弱。海洋覆盖着地球表面总面积达 70.78%（一般视为 70.8%）。

海洋学家讲过一个笑话：我们的行星（指地球）起错了名字。远古人类站在大地上极目四望，看到周围都是陆地，于是把它叫做“地球”。古代西方人按他们对整个地球的猜想，在好几个世纪中都认为，除去地中海和黑海那样狭小的水域外，地球表面几乎全是岩石和土壤。他们还把大西洋看作不过是围绕大地边缘的一条狭窄的河流而已。假如那时他们晓得地球真正的相貌，那么，他们便一定会依照约占地球表面 70.8% 的汪洋大海，把它改称为“水球”，而我们人类则是“岛民”。

对世界上大洋的划分，各国的分法并不完全一致。在我国一般称为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至于海，据国际水道测量局计算，全世界共有五十四海。全球主要海洋中，以太平洋最为深广。南海的面积，又次于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与地中海，而平均深度则大于北冰洋和地中海。

我国沿海地区的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向海洋索取渔盐之利，从辽东到广东，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中的长山群岛，南下到台湾岛、海南岛，在漫长的海岸上，有许多新石器时代人们留下的贝壳堆，考古工作者称之为“贝丘”或“贝冢”；至今还有不少村庄，如苏北沿海地方，仍保留着用“灶”命名，都表明那时沿海已有原始居民从事生产活动，利用海洋，捕鱼煮盐。斑斓多彩的贝壳，不仅用来做装饰品，并且作为经济活动中的货币，汉字中的财、货、贷、贸、贵、贱等字，正是用作交换手段的“贝”组成的。《说文·贝部》称：“至秦废贝行钱。”

歌颂大海大洋

我们的国家是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曾为海洋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辉煌的贡献。他们在海岸边和在海上活动，遐想高远，构思了不少有关海洋的神话，如海外三仙山，海龙王行雨，多情龙女牧羊，南海蛟人织绡赠珠等故事；最感人的是精卫衔木石填海，激发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人们看到海洋的千姿百态，感慨万端，化而为诗文辞赋。我国最早的诗文选集《昭明文选》中，收有西晋木玄虚（约公元 290 年在世）的《海赋》，这是一篇描写海洋广阔怪异的名作，诉说舟人渔子艰险奋斗的生活，描绘了惊人的气势和奇异的景物，其中赞扬海洋壮观的佳句，令人心动神驰。这里转录一段白话今译大意吧：

波涛奔腾，万里无际；排山巨浪，重重叠叠。多么壮美啊，浩瀚的大海！汇集天下水流，多么广阔，多么神奇，又多么宏大！大海时刻动荡，连绵不断，浮天无岸，水势深广，横流漫延，巨浪好似连绵的峰峦，忽合忽散，吞吐百川。

这是对海洋庄严妙相的动人心魄的描述，表示了作家是何等热烈地歌颂大海大洋。海洋是值得歌唱的，科学地如实而言，我们人类就是从这种惊涛骇浪之中来到大地，主宰大地的。

全开放型的海岸

我们祖国位于北半球，处于世界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的东部，东临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南部的南海诸岛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领土、海域面积辽阔广大，海陆兼备，固属大陆国家，但更重要的又是一个开放型的海洋国家。欧洲历史上以航海经商著闻的希腊、罗马、迦太基、西班牙、葡萄牙等地中海国家，它们依靠长 58 公里、最狭处仅 13 公里的细小瓶颈似的直布罗陀海峡，才得通往海洋。中国沿海地区则是全开放型的海岸，与大洋水波相连。我国类型多种多样的海岸带，就是海洋的起点。

我们中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地理环境（如气候、河流等）、经济生产（如农业、交通等）都有重大影响。举纬度位置来说，位于 4°N — 53°N 之间，南北跨越的纬度近 50 度。海陆位置是位于亚洲东部和太平洋西岸。这种区位优势为我国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纬度跨度大，北回归线穿过我国的南部地区，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属北温带；南部有一小部分在热带，南沙群岛距赤道不远。南北气候有一定的差异，有利于发展多种农业生产，南部是热带经济作物的宝库。东西跨越经度 60 多度，使我国濒临太平洋，兼有海陆之利。东南部广大地区受海洋影响，雨量充沛，不仅有益于农作物生长，沿海地区还可发展海产业，便于同海外各国交往，开展经济、文化的合作。

我国的海岸，漫长而曲折，壮丽多姿。海岸线是沿海岸滩与平均海平面的交线，我国大陆海岸线，现今北起中朝两国交界的鸭绿江口，南达中越边界上的北仑河口，全长 18000 多公里。如果把沿岸 6500 多个大

小岛屿岸线也算起来，海岸线就更长了。

辉煌的航海大国

我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有广泛的管辖海域，有极为丰富的海洋资源。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衰与荣辱。为适应当前建立起的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形势需要，制定和调整海洋发展方针政策，促进和完善海洋立法，与国际接轨，加强海防建设，加大海洋综合管理力度，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维护海洋权益，已成为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

海外有些学者，至今对中国在海洋事业上还有不少误解。他们说：中国是封闭的大陆；从来没有可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及西班牙、意大利航海相比的时期；在 6 世纪前中国人没有航海到印度等等。可以谅解，古汉语典籍不易读懂，颇难确切地接触中国浩瀚的历史文献，才表现出茫然无知。

我国出土的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如山东荣城湾郭家村的独木舟，辽宁丹东夹砂红陶制作的独木舟模型，山东章丘、泰安的石制造船工具，浙东余姚发现的雕花木桨等，都是我国先民与海上活动密切关系的明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世本》、《竹书纪年》、《山海经》、《墨子》、《吕氏春秋》等典籍，都表明中国人早在 7000 年前已制作舟船在江河湖海中航行了。因此，春秋时代列国纷争，孔丘讲仁义不见用于世，才会喟叹地说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来。秦始皇重视海上航行，他亲自多次到沿海要地视察。《汉书·地理志》有“自合浦（相当今广东开平、新兴以西，广西容县、横县以南地区）、徐闻（在今雷州半岛南端）南入海”的大段记载，伯希和未读懂原文，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在其学术报告《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里认为：“《前汉书》的记载极有价值，因为它表明了中国自古就与印度洋诸国有了贸易关系。”东汉时给日本国王以金印，至近年仍有金印出土，为彼邦人士所称道。三国鼎立时，公元 231 年前后，雄据江东的吴国曾派出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访东南亚，他们回国后分别写成了《扶南异物志》和《外国传》，是我最早的关于东南亚的专著。据阿拉伯人曼苏的记载，大约在 5 世纪时，中国船已到达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口，访问过亚丁港，至迟在公元 360 年左右，幼发拉底河畔巴达尼亚地方每年一次的商业贸易集市上，都有中国商品参加交换。东晋名僧法显赴印度求佛典，399 年（东晋隆安三年）由长安出发，在印度学习和考察后，于 412 年（东晋义熙八年）在斯里兰卡乘中国商船由海道回国。途中遇风，到次年春回到山东青岛崂山。他将艰险经历写成了《佛国记》，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史地的重要资料。

唐代海上行程更远，除去与日本海上往来密切外，自广州出航，直至阿拉伯。据 9 世纪时经常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中写道，中国航海船很大，乘风破浪，顺利到达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港。宋代造船技术更加提高，泉州港海外交通繁荣。宋元时期与非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非洲，约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二百多个地点，大量发现中国唐代的古瓷，就是中国远洋航海事业发达的铁证。明代郑和七

次下西洋，是航海史上最光辉的篇章。荷兰汉学家戴闻达 1947 年 1 月在伦敦大学演讲中指出：郑和第五次航行到了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第六次到今索马里的布腊瓦、摩加迪沙。郑和的壮游产生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部远洋航行史上的名著。李约瑟在《四海之内》一书中说：“在明朝中叶，中国的国旗飘扬在太平洋上空，从桑给巴尔经过婆罗州直到堪察加半岛。”

郑和宝船踏破了惊涛骇浪，雄辩地说明中国是个海洋国家，航海大国。多么可惜！光耀世界航海史的郑和下西洋奇迹，缺乏先进生产方式和开明政制的配合，并未能推动社会进步。后来却实行“海禁”，那首先出于防御东南倭扰及荷、葡、英国侵略的需要，但同时含有镇压地方、禁锢思想的意图，大大阻碍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即使在那严厉的闭关自守、压抑生机的年代，出海受阻，沿海各省百姓迫于生计，仍暗自外流，移殖南洋，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互通有无。到乾隆年间，广东海员谢清高（1765—1821 年），随洋商船周历海国，记其岛屿阨塞，风俗物产，他口述的《海录》被整理付梓后不数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便以鸦片飞剪船配带洋枪火炮前来伶仃洋面叩关了！

发挥海南的优势

南海中我国断续国界线内的水域及其诸岛，即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历史上是历代出航远洋、发展对外关系的要道，在近代是西方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入侵中国的线路。南海清澈晶莹的雪浪，经常喧腾不息。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南岛解放，中国南海诸岛及其周围水域掀起了渔业捕捞和海岛开发建设的热潮。

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南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64 年成立了国家海洋局，下设海南分局。1984 年 5 月 31 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成立海南行政区建置。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连同南海诸岛，海域广阔，气候温和，海洋油气、水产和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据调查，可供开发的旅游点有 123 个，其中 40 多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全岛有 600 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 99 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和广东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给予海南较多的自主权，加快了海南的发展速度。但由于受许多条件的限制，仍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开发海南，有必要单独设立海南省，由中央直接领导，使其各项优势充分得到发挥。1988 年 4 月 13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全文如下：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决定：

一、批准设立海南省，撤销海南行政区。海南省人民政府驻海口市。

二、海南省管辖海口市、三亚市、通什市、琼山县、琼海县、文昌县、万宁县、屯昌县、定安县、澄迈县、临高县、儋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黎族自治县和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海南建省，简称为“琼”。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同日通过《关于

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使海南比较独立自主地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特殊政策，有利于简政放权，提高办事效率，统一组织领导全省的开发建设。

应该注意的是，海南岛本岛原是次于台湾岛的我国第二大岛，而在整个海南行政设置上，先后在行政区建置和其后建省的决定中，都写明统一管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在国防、交通和开发海洋资源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增强海洋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海洋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事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主要海洋产业的总产值 1993 年为 900 多亿元，1995 年已达 1700 多亿元。

我国是人口众多且自然资源不足的沿海国家，发展海洋事业，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对于解决食物、能源、水资源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对于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有着促进作用。至于丰饶的海洋资源，临海的优势区位，综合管理、开发利用的远大前景，详见本书中各章节的说明，这里不必赘述。在此应强调指出的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一股强劲的潮流，21 世纪将成为海洋开发时代。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从现在起，乃至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站在战略高度来认识海洋，改变过去那种片面的大陆观念，增强海洋意识，加强海洋管理，维护海洋权益，重视海洋科学，保护海洋环境和资源，使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乃是当务之急。我国 18 世纪航海家陈伦炯自序其 1730 年撰成《海国闻见录》的目的是：“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阨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惊。”

我国深广的海洋，从渤海到碧波万顷的南海，是一个巨大富饶的宝库。请听：海洋在召唤！让全国人民了解海洋，热爱海洋，尽快发展高新技术，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巩固持久和平，造福全球人民，再度为世界海洋文明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这也正是我们编写这本《中国南海诸岛》的目的。

1995 年 3 月石继昌遗著《春明旧事》

亡友石继昌先生关于京华里巷风习人物漫记等遗作，得弥松颐先生等帮助，辑集为《春明旧事》，由北京出版社付排时，我即感到十分欣慰，同时也涌起推不开的哀伤。

石继昌（1925—1994 年），字守常，本为满族汉军旗人，世居北京。论其远祖，为明末清初之石廷柱，其先为苏万人，姓瓜尔佳氏。高祖卜哈，明成化间授建州左卫都指挥僉事。曾祖阿尔松噶，嘉靖朝入贡袭父官。至万历间，石翰避仇，移家广宁，遂以“石”为姓，任明指挥，于是成为辽东人。石翰有子三人，曰国柱、天柱、廷柱。万历末年，廷柱为广宁守备，天柱为千总。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启二年（1622 年）挥师渡辽河，兵临广宁，天柱等首先出迎，廷柱即从众献城，初授世职游击，统辖降众。有关石氏远祖的史事，《辽海丛书》中《雪履寻碑录》卷八，

收有康熙时徐乾学所撰墓表；《辽阳县志》卷三五，载有《一等伯石汉墓道碑诰命》。《清史稿》卷二三一《石廷柱传》，便是据上述碑文撰成的。

廷柱自此随清军征战，初为镶红旗固山额真。崇德四年汉军旗制始定，廷柱隶正白旗汉军。其后“从龙入关”，累立战功，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镇海大将军都统一等伯。顺治十二年，始设镇江驻防，廷柱为第一任将军。廷柱六子，三子华善，康熙时任甘肃巡抚；四子石琳，官至两广总督。到光绪年间，继昌祖父长和为杭州驻防将军。石氏历代显宦，在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的直省大臣年表中，以及《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与《清史稿》的诸臣封爵世系表及列传中，均有记载。继昌平日讳言家世，很少谈及他的先人；这里不过是为读者“读其书、知其人”着想，了解其出身背景、文化环境罢了。

八旗首善，颇为彬彬，济济多士，在文化上涵濡深厚者尤不乏人。继昌早年攻读文史，学习勤奋，在大学生时，从金受申先生等游，相得欢甚，即常为《新民晚报》撰稿。1949年后，曾服务于银行业，以体弱多病告退，为人整理文稿，缮写誊录，赖以生活。“大跃进”后，中华书局选取明清笔记，点校刊印，闻继昌熟谙清朝人物史事，以及刊本稿本情况，特邀其入编辑部，从事选题、校勘、整理等工作，贡献颇多。

不意狂飚天降，浩劫临头，继昌休闲家居，在“文革”中献出京畿道及花市等处房产以求安。所幸当时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他每日在琉璃厂一带，推车扫地，检字纸出卖，贴补家用。王孙沦落，真验了“斯文扫地”一句古话。作有五言诗一首见寄，读来心酸，不敢秘藏，付之丙丁。五口之家，岂能仅靠捡拾废纸■口呢？所藏明清笔记珍本稿本两大书柜，悉数忍痛卖出，仍难疗饥。

夫人唐音氏，名国勤，生一子二女，阶平、陆平、隆平。娘家远祖为蒙古族。努尔哈赤崛起时，为增强势力，与蒙族上层结盟联姻，唐氏祖上亦为清廷勋贵，国勤夫人幼时尚可称“郡主”。多亏夫人识大体，能耐劳，抓住本市拆城墙、修地铁的机遇，放下架子，破门而出，毅然挤进民工行列。见尊长、亲串犹检衿行礼的闺中静女，抡洋镐，搬城砖，手掌出血，坚持不退，发扬了先辈的塞外风概。自助天助，夫人终于补上了正式工，养家活口，熬过十年浩劫，并为后日退休奠定了自立的基础。

乌云拨开，玉宇澄清，继昌得以应聘参与《文物》月刊编辑工作，学有所用，得心应手；又蒙纳入正式编制，感受历史新时期阳光的温煦。在本单位审稿编稿之暇，业余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单位之约，点校整理有关北京民俗、清代掌故及《雪桥诗话》、明清小说若干种，撰写学术性前言，提供有历史价值之未刊稿本；且在《燕都》、《读书》等期刊发表论文。退休后，又为中国新闻社海外专稿撰文，辅导有志研究北京史之青年朋友。他还有一些笔记提要、小说资料，未及整理定稿便撒手而去；早年撰有《八旗耆旧名录》等稿，为人借阅失落，俱堪痛惜！

今知继昌遗著《春明旧事》即将问世，是令逝者与生者感激的美事。首先要感谢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们，感谢古道热肠的弥松颐同志，暨北京出版社的领导。纸价飞涨，工本费高，旧稿新出，殊属

难能可感！但我想到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北京轶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满汉民族的团结友好关系，可能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曩昔我研读明清史籍时，常遇一些疑难不解的问题，辄向继昌兄请教，可说他是亦师亦友。责成我写序是不敢当的，只能乘此介绍作者生平，同时以不学的朋友身份，并代表其家属，向各位赞助者致以谢忱。

1995 年 12 月巢峰的《品德千字文》

那还是 50 年代，每逢一年两度的盛大节日，在天安门前看到，无数孩子们盛装列队，手持万紫千红的花束，欢呼行进。孩子们比鲜花还美，叫人感到满怀欢悦，他们可真是祖国的花朵啊！转而又想，他们岂仅点缀了今朝的节日，长大成人，是祖国明天的擎天玉柱！少年儿童代表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未来，是肩负国家各项重任的公民，他们将创造共和国的新历史。他们的体质、智力和人品，尤其是人品端正抑或庸陋，将决定国家未来的面貌，预示着民族前景能否呈现春天的美好繁华。关注兴国的有识之士，便会考虑到应该让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理解为他们编写出版优秀的少儿读物，是培养新世纪栋梁之材的重要事业，关系到国运昌隆的百年大计。

犹记儿时向孔夫子牌位磕过头后，所读的识字课本，开头几页写着：“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我认得的第一个字便是“人”。莎士比亚曾以无比豪情歌颂了大写的“人”：“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莎翁又说：“人类是多么美丽！”（《暴风雨》）而后我又念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开宗明义写道：“人之初，性本善。”这一断言，是根据孟子的“性善论”而来，殊不知在《孟子·离娄章句下》里，这位亚圣还说过一句惊人警世的话：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这就不免令人十分诧异，诧异会引人思考。孟子说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其本真的意思，是认为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可是孟子并非住在传说中神仙所居的玉宇，他生活于诸侯相征、生灵涂炭的战国时代，世衰道微，他揭露社会上率兽食人的现象，直指为“是禽兽也”。两千年过去，历史的长河里出现过多少恶浊的乱世，目睹亲历，今人比孟夫子见多识广。“人”这个字，由一撇（丿）一捺（㇏）组成，结构很简单，即使幼儿执笔描红，写来也不难。可是，被培养成人后，走上社会，按其怀抱的志向，举止言行，待人接物，与天下人相见，理当还报社会。这就必须以毕生的力行，不断的自律，刻苦的学习，去抵御各种妖魔鬼怪的引诱，金权美色的蛊惑，承受憔悴贫困、污蔑诬陷的折磨，迈上坎坷的道路，无惧梗塞的险阻，总还要堂堂正正地做个人。千难万苦，也要保持清白的人品。这才是正直做人一生所应执着无悔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 1877 年写成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现实主义流派代表作《社会支柱》前后，对社会腐败作了

严正的抨击。同时，在《四行诗》的前两句写道：

生活就是——同心中的
魔鬼作殊死战。

读书与做人，本来是世间第一快事。品德并非一个虚空的概念，也不是徒有其名的矫饰，而是人生一切资性素质的复合，是良知、禀赋、健康、学养、技能、习性、持志、毅力、坚贞、胆识、爱心等的综合体，在社会的洪炉中经过劫火百炼而铸成。世人自应依靠科学智能和道德力量逐步改善生存环境，享受生活。人类的生产生活、社会管理的一切措施与活动，都表现为其自身品德与创造性思维的外化。工商有序，农不失时，医有医德，为学有恒，文品出于人品，干部要干好事，首脑带头做表率，言行均须有益于将来，各行各业都有行为规范，道德要求。明清之际的大变动中，顾亭林指斥某些世风败坏，有些人“学为不似之人”，就是异化为不像个人的人了！严正地指出人和禽兽差别无多的孟子，是看出人的动物性，饮食男女，和禽兽同样地需要，但人的动物性之外，还有异于禽兽的社会性。在群体生活中受熏陶，受教育，受礼乐兵刑的约制。所以孟子认为人人皆可善学好，强调自我修养，“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汉书》里明白记载着，有些皇子王孙有“禽兽行”，出身于深宫之内的贵胄子弟，已经失去人形人味了。因此，通过教育诱导，环境熏陶，社会制约，可以端正人品，提高人的素质。父母认真教育子女，国家切实关注少年儿童教育，力谋道德行为上文明进步，就是维护国格，净化国家形象，缔造国家未来的清明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参加缔造世界人类新历史的伟大事业。

现今人们十分关心使孩子如何越来越聪明，提出不少英才教育计划，学英语，教数学，做作文；节衣缩食买钢琴，购电脑、小提琴，外带补脑饮料，从三五岁就做起，别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未举步就落后于他人。所有开发智力的办法都是值得注意的。然而，不能忘却品德修养必须与智力发展同步协调进行。当今不需拥立小皇帝，侍候娇公主、培养新贵族，而是应当造就优秀的公民，养成够格的父亲母亲，国家未来的主人公、保卫者，要让他们在我们的肩上成长为跨世纪的现代化新人，要保护他们免受社会恶俗的毒害。只知要好的吃，要放肆地玩，在家庭里、邻儿前作威摆福，在学校中傲然不群，那将成为可悲的废品。他们并非节日的道具，盛会的布景，他们是新世纪的主宰。在晚清，人们从八旗贵胄子弟的仪态作为中，便看出了大清帝国的末日。出娘胎就享受俸禄的天之骄子，早就不是老太后、王爷、国公们晚年的希望，大地已在他们的宝座下颤动了！

年前得知巢峰同志着意编撰此书时，体会其命意旨趣，即触动了我的思绪。“贤彦风渐远，江湖思绪萦。”（陆龟蒙：《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虽说绝不应忘少年儿童的成长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或然或否，方方面面不免从自身的角度去拨弄十三档算盘。作者本着所持信念，秉笔直书，利用传统的幼学读物《千字文》的旧形式，酌情改造，注入新意，内容深入浅出，比较生动地撰写了十六篇：惜时、好学、躬行、立志、奉献、爱国、修身、谦逊、磨练、思过、信诚、大度、

团结、勤俭、廉洁、遵纪守法、礼貌孝道。每篇介绍传统美德，兼有时代精神，注明出处，附加释文。各篇配以精美画图，含有直观教育用意。本书编排体例以图先文后，相互对照，读来引人入胜，令人回味。

早在 1994 年 8 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即已指明：“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和培养好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工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与心愿。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国家教委 1995 年 2 月正式颁发的《中学德育大纲》中，关于道德教育一项，首列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教育；在《通知》中强调德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来，书市上颇有几种《三字经》形式的作品，现在又改造了《千字文》的形式，也许被目为“趋时”。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要言不繁地指出：“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先生着重要求：“多发挥这一点。”要使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做“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德育应是国家提高公民素质的一项长期坚持不辍的系统基础工程，撰写出版三五本书尚不足以形成大气候。我们希望各方面专家学者，社会政治工作者，为少年儿童撰写各个学科的益智进德读物，务须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这与期待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问世同样重要。同时盼望在全国范围内整治环境，清除恶浊腐败气氛，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扬正气，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清正廉明的社会风气，积极执行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开拓进取，扎实工作。

本书作者巢峰同志，与我都在出版系统工作，既有密切的公谊，又有亲密的乡情。我俩年龄相距不大，都出生于黄海之滨那片贫瘠的土地。曩昔灾荒连年，民不聊生。抗战爆发时，这个全省面积最大的县份，只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而后烽火漫天，颠沛流离，只能在血火流光中断续学习。巢峰尤为艰苦，早岁参加革命工作，在恶劣条件下坚持自学，成为全国闻名的经济学家和编辑出版家，在上海多年主持一家学术性出版社工作，一度又兼一家政治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正如罗竹风前辈所说：“巢峰是有心人。”在繁重工作中，他念念不忘亿万少年儿童，十分关怀祖国的未来，继去年撰写出版的《品德三字经》之后（当年即印行了两次），又写出这部《品德千字文》来。他好学力行，认真工作，秉性直爽，不托空言。他责望我为本书写个序言，实不敢当，而推荐有心人力作，我所在的单位领导人也责成我动笔，情不可却，谊不容辞。千字文写作的难度颇大于三字经，且又不能拘泥于前人运笔之成说。因而浅陋地写点读后感，寄语少年儿童读者和他们的父母们，我在这里静听读书声及反应和评论，以供作者进一步增订完善，使本书更获得小读者的喜爱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我这样希望着。

1996 年 12 月《书的故事》的故事

在 M·伊林的著作中,《书的故事》还排不到最前列。他是 30 年代苏联儿童文学作家,原名伊里亚·雅可符列维奇·马尔沙克,写过许多通俗科学读物,其中《十万个为什么》最为我国青少年读者所熟知和喜爱。《书的故事》也很生动有益,书中说道:“一本书的命运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书的生活断不能和人的生活分离。”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此书的译者、我国新文化出版事业的开拓者胡愈之前辈来。

1936 年 4 月,从法国马赛港开往香港的轮船,行经印度洋上,初夏船舱里闷热,一个身材不高、额头突出的人,伏在小桌上译法文版《书的故事》,这人就是郁达夫常爱称的“矮小的大人物”胡愈之。他是二月间到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共同联合抗日的经过情况,任务完成后,带领不懂外语的潘汉年回香港开展工作。五十年后,愈老回忆道:

“1936 年 4 月间,我和潘汉年又经法国坐船回香港。在旅途中无事可做,我还从法文版转译了苏联作家伊林著少年读物《书的故事》,后来在生活书店出版,这也算是一个额外的收获。”

政治活动按下不表,且说《书的故事》,一名《白纸上写黑字》,上海生活书店于 1937 年 1 月出版,正文 114 页,大 32 开,横排精装,还印上了厚书 N·Lapashina 所绘的插图,非常精美,确是给青少年的一件礼物,初版定价只有三角五分钱。

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六章,谈文字的起源与演化,先说口口相传,靠唱歌和诵读传述英雄故事,人就是活的书。以后结绳和绘画备忘,接着发明文字,懂得计数了。书中说:“中国人发明纸、火药、磁器、印刷,比欧洲人更早。中国人使用象形文字,也要比别的民族更早些。”下篇讲各种形态的书:石头的,芦草的,蜡版的,羊皮的和手工造纸的书等等。造纸的方法从亚洲传到欧洲,书中赞美道:“中国人是何等有忍耐力和创造天才的民族啊!”不仅增长中国青少年的知识,也培养他们的志气。

后来回到上海,才知道国内已有两种译本,他总从大处着眼,体谅人,便觉得没有出版的必要了。后来,偶然发现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在内容上却有出入,首先是删去原书最后一章末尾几段文字。这一章叫《书的命运》,讲到一本书都是有命运的,书有爱她的朋友,也有恨她的仇敌。关于书的命运,举了一些事例,比如古代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里烧掉的那些书,修道院里丢失的藏书,宗教裁判所下令焚毁的书和战争中毁掉的书。接着还很有意义地指出:

书的命运,往往跟着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而转变。书这东西不但是记录过去的历史,指示各科的知识,书的本身也参加战争与革命。

英译本更荒唐的是在上篇第三章后面加上一个胡编的故事,嘲笑黑人的愚蠢,散布民族歧视的谬论来毒害读者。于是他请张仲实用俄文原著校订他的译文,发现法译本比较忠实,英译本竟对原著任意增删。他还将原著对于中国文字了解的一些错误在译文中予以改正。严肃认真和对读者负责,是所有著译者和出版者的第一准则。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要凭学识和良心。胡愈之通过这本《书的故事》向学术文化界和出版界

提示了以身作则的榜样。

胡愈老的一生，就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书的故事。从1914年以一名中学生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练习生，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刻苦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译著文章。1915年任《东方杂志》编辑。早在五四运动前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随后不断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及写白话文，和沈雁冰发起“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参加“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指导群众斗争的开展。通过《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培养了一批新作家和社会学家，积极支持创办开明书店。“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同时与邹韬奋共同主持著名的《生活周刊》，并推动创办生活书店，为我国现代新文化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在上海，在武汉，在桂林，在香港与新加坡，组织出版期刊、图书、日报、编印第一本国际问题刊物《世界知识》，第一种文摘性期刊《月报》，第一部《鲁迅全集》。到了中国震撼世界的1949年，6月在北京创办和主编《光明日报》，11月1日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署长。如果仅仅以出版家来看待这位当代文化巨人，那是不周全的。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傍晚，他鞋底上沾着革命群众的血迹，立即奋笔疾书抗议信，揭露“此率兽食人之惨剧”，登报要求严惩有关官兵。就在译成《书的故事》、回到上海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华北，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的活动，终于掀起了全国各界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活动。夏衍回忆30年代上海的革命斗争时谈及胡愈之说：“他的远见卓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并把愈老称为生活书店与救国会的“灵魂”，盛赞他“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真可以说是无可伦比的”。到了多病的晚年，在“文革”期间，他还勇敢地痛切晋言，要求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他用自己的言行，为我们留下了20世纪中国一个思想家的故事。

今年9月9日，是胡愈之诞辰一百周年，特介绍他怎样翻译出版《书的故事》，谨表纪念。

1996年4月“木头”是个什么人

1933年3月，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宣布成立三个月后，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的讲话中，痛斥英帝国主义分子伍德海道：

我们要求释放数万中国政治犯，我们也必须要求立即释放保罗·鲁格夫妇。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另外却有一批人应该监禁起来，像英帝国主义分子伍德海。哪一个国家能让这样一个冷血动物胡作非为，天天游说中国将军，要他们带领军队投降日本呢？

我们当年编辑《宋庆龄选集》时，觉得这段话里已将伍德海的罪行揭发，只注了其人的简历，考虑到避免注释文字枝蔓，简单说明他长期在华从事新闻工作，反而忽略了对他一贯罪恶活动的揭露，未能帮助读者理解宋庆龄何以说应该把这个恶棍监禁起来。

这个伍德海（Henrge George Woodhead 1883—1959），或者像邹韬奋将这人意译为“木头”，这根“木头”是个什么人呢？很有一说的必

要。

木头于 1902 年由英国来华（另一说为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来中国），后在上海英商《字林西报》任职。这个《字林西报》，创刊在 1864 年，主要反映英国在华经济、政治利益，一贯敌视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活动，因其顽固反动，上海新闻界人士称之为“外滩老妇人”（报馆设在外滩）。“木头”这块料，正好符合“老妇人”的需要。孙中山是推翻封建帝制、共和国的缔造者。伍德海化名为“萨奇塔里乌斯”，写了《孙逸仙博士的奇异的神化》一书（英文），对中山先生完全采取咒骂的态度。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应邀北上，会商国是，同时“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孙中山的话）。中山先生与宋庆龄途经上海时，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而《字林西报》公然发表荒谬社论称：“孙博士在政治上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目前在上海居住将会毁坏上海的中立地位，并危及安宁。”“因而必须禁止他进入上海由外国人管理的区域。”这一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言论，被化名为“人马星”的“木头”得意地引用在他恶毒咒骂孙先生的书里，反映了他作为英商《字林西报》等顽固报刊评论员的立场。

在 30 年代，上海租界当局极力散布种种保留帝国主义“治外法权”的荒谬言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他写的宋庆龄传记第十三章的第二十四条注释中严正指出：“在散布这种论调中，最起劲的是在上海英国记者中最顽固的 H·G·W·伍德海。”（中译本在这里把“伍德海”写作“伍德里德”了。——引者）

1939 年 9 月 3 日，宋庆龄在香港致美国友人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还说：“请告诉《新群众》的人，关于我的情况，千万不要利用伍德海的《名人录》。”她认为这个“木头”所写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从本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进行疯狂侵略，这个“木头”认为正是他为虎作伥、替侵略者效劳的良机。日本侵略军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强占沈阳，进占我东北三省后，又于 1932 年 1 月 28 日进犯上海。据“西报”所说，日本预计三小时内可唾手完全占领闸北，视中国完全为寡廉鲜耻的懦夫所组成。（据《生活》周刊《紧急临时增刊》第二号，1932 年 2 月 5 日出版）。日本驻东北侵略军头目本庄繁等上日皇电奏中也说过：“臣等敢于放言，对于支那领土，可于三个月内完全占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这个专写蔑视中国人文字的“木头”，他同时在上海英文《大美晚报》撰文，为日本侵略者帮腔呐喊。他谩骂中国为“A nation accus-tomed to defeat and humiliation at the hands of foreign armed force”（“中国是习惯于溃败与耻辱的民族”）但是，英勇抗敌的我国十九路军，于 1 月 28 日晚 11 时立即奋起抵抗，为全国同胞人格与生存而战，保我中华民族的国土与光荣，给本庄繁、“木头”之流最坚决、最响亮的驳斥。

这时，伟大的爱国者邹韬奋，在上海日寇炮火的威胁下，在外国帝国主义的讥讽蔑视中，坚持编辑出版已享盛名的《生活》周刊，激励国人团结起来，作持久的抵抗；同时注意分析西人所办报纸言论，密切正视和揭发新闻界帝国主义吹鼓手“木头”的卑鄙无耻的活动。到五月间，日本鉴于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十九路军的勇猛抵抗，更非意想所及，觉得当时在上海唇畔，不啻给中国人提供一个团结的机会。日方急于结束沪案，又想以停战来获得作战所追求的果实，通过举行所谓“圆桌会

议”，使大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共管下的“自由市”。这时“木头”以所谓英侨协会会长的身份，甘为日本侵略军的马前卒，力助日方阴谋。《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二十一期“一周要闻”栏（5月19日至25日），韬奋以记者名义报道《上海各团体反对日人在沪阴谋》，内称“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以日人勾串外侨破坏上海领土主权，英侨协会会长木头尤力助阴谋，存心恶毒（参看本期《小言论》），特于23日发表宣言反对，力斥木头之无理取闹。”指出所谓圆桌会议为宗主国对殖民地而设；上海事件与东省事件系中日间的整个问题，绝不能单独解决；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反对任何人或任何国有变更我原有行政组织行政方式之任何企图，断不使所谓自由市出现。

热爱祖国、力主抗日的韬奋，配合新闻报道，还在5月28日出版的同期《生活》周刊第一页著名的《小言论》栏中，以明白晓畅的笔法，写了一篇揭露“木头”（伍德海）的短文，类似匕首投枪，谨录于后：

木头大起劲

有英人木头者H·G·W·Woodhead，他断定“中国是习惯于溃败与耻辱的民族”，惯在《大美晚报》专做偏袒日本及外侨中之“死硬”派以攻击侮辱中国的文字。当我国十九路军英勇抗日之时，他力为日本辩护，力劝中国自己从早退却以全颜面！自日人以种种鬼蜮伎俩，勾结在沪少数外侨，阴谋促成圆桌会议以设立所谓自由市以来，这块木头更大起其劲，怂恿不遗余力。最近竟以上海英侨协会会长名义，大发通告给各国在沪商会，谓欲保障上海租界安全，须速开圆桌会议，解决（一）越界筑路之管理权，（二）免除上海周围驻扎华军之危险，（三）改良特区法院。总之是要使上海更殖民地化，乃至“上海周围”都牵入而殖民地化就是了。这块木头处处以最近中日战事做这种无理要求的根据，他何尝不知这次是日本利用租界作根据地以进攻我国土（租界原也属我国土），我军始终未攻入租界，试问谁破坏租界安全？木头虽木，绝非不明白这样浅近的道理，他无非咬定“中国是习惯于溃败与耻辱的民族”，所以可以无理由的加以尽量的压迫与侮辱。这块木头屡在《大美晚报》上极力赞许日本在侵沪时要求上海周围二十基罗米突不得驻华军。我十九路军即为此事血战二十余日，木头如有勇气，尽管大胆挑衅！

韬奋义正词严，把这块朽木的黑心完全剖示于公众之前了。

经过中国军民八年艰苦英勇抗战，经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罪恶滔天的日本侵略者终于无条件投降。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成，着手审讯日寇东条英机、畑俊六、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等二十七名战犯。审讯就在日本军部的巢穴旧陆军省进行，十一位各国法官高坐审判席上，这个场景，是和平与正义之神对侵略者的有力讽刺和报应。“满洲国皇帝”溥仪以证人出庭，他宣称是被日方强制前往东北的，是被日本军方绑架的受害者之一。为战犯辩护的日本律师团首席鹤泽总明博士，为梅津美治郎辩护的律师美籍布莱克尼少校，在法庭上千方百计想从历史上证明溥仪是自愿登上满洲皇位，而不是日本军方一手制造的。这时，一辈子在远东造谣生事、兴风作浪的木头伍德海，虽届晚年，狼心未死，他竟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书面证词，指出溥仪自愿充当傀儡，力图为日本大小战犯开脱罪责。

木头当年曾由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作者）介绍，访问过溥仪；在天津时，溥仪也曾多次接见过他，到长春后也接受过他的访问。木头本人的印象，先后写在《一个记者在中国》和《满洲国访问记》中。1947年9月10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木头的证词，据国民党中央社9月10日东京电称：“在华担任记者多年之伍德海，今晨于送致此间国际军事法庭之证词中称，傀儡皇帝溥仪并非被迫为君主。……并非被日本人自天津绑架至东北者。按：在宣读伍德海氏供词之前，检察官及辩护律师对于是否容纳此一证言曾展开半小时之激辩。伍德海之证言系以其1932年9月在长春访问溥仪时之谈话为根据。”木头到老还力图在日本战犯开脱罄竹难书的罪责。

历史的真相不容歪曲与涂改。溥仪成为“康德皇帝”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培植和阴谋布置的结果；同时也是旧中国封建复辟势力多年想望和活动的结果。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屠杀和掠夺中国人民七十年的历史罪行，绝不能因此而减轻和开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终于用绞刑架严惩日本诸战犯，来回答木头伍德海的证词。“木头”是个什么人？他在远东种种罪恶活动，最后还企图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他已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自供。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的《新闻学大辞典》第776页有伍德海其人一个条目，全文如下：

伍德海（1883—1959）英国记者，报刊评论家，毕业于蒲拉伊东高等学校，任私人教授七年。辛亥革命后以《字林西报》特派员身份来华（一说1902年来华），历任朱淇所办英文《北京日报》总编辑、英文《京报》总主笔、天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总主笔。1930年后为上海英文《大美晚报》撰稿人。抗战爆发前后兼任英文《远东周报》的总编辑，积极宣传抗日，以其丰富的东方知识，分析日本军政情况，其评论文章在上海风靡一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方以‘其所为之谍报宣传，促使日本之国际环境恶化’为由，予以逮捕。抗战胜利后获释。著有《一个记者在中国》、《中华民国真相》等十余种书。

有些人不免是复杂多变而又难测的，尤其是来到远东“冒险家的乐园”的某些西方记者。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是当即将欧美侨民拘捕起来。而关于“木头”其人其事，宋庆龄、邹韬奋等在30年代均据事实揭发，指明这块“木头”专与中国人民为敌。到日本侵略者蹂躏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地区各族人民，战败后受到正义审讯时，“木头”依然为虎作伥，出面为罪大恶极的战犯开脱。上述辞典条目的编写，不知是否仅依据英文的某些材料，而未察及他在三四十年的无耻勾当。

1996年6月仁者寿，书也寿
——徐雪寒及其文集

一个郁闷的暮春傍晚，我倚窗阅读巴金译的薇拉·妃格念尔《回忆录》第二卷《狱中二十年》。正看得出神，门道里传来了剥啄声。原来是对门老布尔兄，送来印行多日，颇难购得的《徐雪寒文集》。色泽浅淡的封面上只飘着两片六角形的雪花，倒能表现作者玉洁冰清的品格。我很高兴地拜领了。

转而一想，又不免涌起一阵惶惶惴惴。徐雪寒前辈大半生的岁月，竟与监狱有着障道因缘。他被羁绊的日子比妃格念尔长，经历的生活远比妃格念尔严酷。妃格念尔是 19 世纪 70 年代俄国革命团体民意社的出色女将，徐雪寒从本世纪 20 年代中叶就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十月革命后，1942 年病故前，妃格念尔曾在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博物馆里担任职务；徐雪寒为党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后，1955 年潘汉年事件发生，他从外贸部领导工作岗位上，又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金藤捆扎到笼子里去了。1965 年蒙提前假释，可是“妾身未分明”，十年动乱期间，只能享受牛棚批斗和干校改造的待遇。直到 1981 年原判撤销，党籍恢复，才又从牛进化为人！文集《后记》说：“收入文集的文章共五十九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写的，第二部分是建国后写的，第三部分为回忆、纪念性文章。若按创作的时间顺序看，其实只有两个部分：从第 1 页到 191 页，是青年时代从国民党杭州陆军监狱出来后写的；从第 192 页到 437 页，是 1981 年冤狱平反后写的。岁寒松柏，文集反映作者在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学术造诣，更显示作者经受累继困厄遭际时的人格力量。司马迁说的对：“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治学与做人两方面，作者正是这样豪迈开阔的人，虽然长期“囿于粪土之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爽然而宠辱皆忘。

作者的老友，八十多岁的著名经济学者薛暮桥，特地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既有理论解说又有感情色彩的序言，与时下有些类似小贩叫卖的前言截然不同。序文开头说：“徐雪寒坎坷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我和雪寒同志结交已六十余年，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雪寒同志出生于浙江慈溪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十五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担任过杭州地委组织部长。薛暮桥也是这个时候参加党的。1928 年初，在宁波被捕，移押杭州陆军监狱。薛暮桥说：“和我同在狱中，一起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的难友至今仍以‘牢监大学’的学生而自豪。”1933 年夏，徐雪寒刑满出狱。比他早出狱几年的薛暮桥，在著名学者陈翰笙的领导下，与钱俊瑞、孙冶方、姜君辰、王寅生等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工作，1933 年又组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出版了著名的学术性期刊《中国农村》。与此同时，钱俊瑞、姜君辰等人，在上海《中华日报》创办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经济情报社。这个学术团体全靠十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笔耕的微薄稿酬来维持。经薛暮桥介绍，徐雪寒和 1933 年冬出狱的骆耕漠先后到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从而投入了经济研究事业。

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同仁，在搜集和研究资料的同时，必须努力写作来换取稿酬，以便给这个学术团体不断输液，维持它的存在。这里没有后门，也未设置铁饭碗，是一个“自紧自”的严肃的研究部门。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锻炼出一批专业理论工作者，不仅个人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各自有所建树，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我党的革命活动。年轻的徐雪寒没有辜负良友的瞩望，在这期间，不仅为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撰写论文，而且在 1935 年创办并主持了新知书店，显示出他在理论宣传工作方面的出色才干。薛暮桥序言评介他早期的学术工作称：“雪寒同志在 1934 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写的文章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了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到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的

中心思想是：一、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二、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攫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的主权；三、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市场的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1936年，英美帝国主义用高价收购白银，迫使中国废止银本位制，改变为依附于英镑和美元的法币。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是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雪寒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丰富的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一部分著作随着作者学识的增长，愈到后来愈精彩，特别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英美共管中国货币吗？》、《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和《列强对华投资问题》等篇章，确具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很有价值。”

作者早期的论文不但有其历史价值，有些论点在现时学术研究中仍有指导意义。武昌起义后清王朝覆灭，革命派无力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政权，中国出现大小军阀割据争夺的局面，帝国主义分别利用这些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有关地方军阀史和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不能忽略社会经济条件的探讨。文集中论及土地关系、市场分割以及农民负债百分数的增高，都和军事勒索、军阀内战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正常发展的历史情况相反，各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阻碍国内市场形成的功用，帝国主义和地方特殊势力相结合，不仅部分地使市场趋于分割，而且扶持了军阀势力的形成和滋长。武装割据，截留税收，币制紊乱，税捐重叠，汇兑行市差异巨大，度量衡制度不统一，地方主权廉价出卖，帝国主义垄断原料的魔爪深入农村，列强炮舰政策与势力范围的划分，构成了各派军阀产生和争斗的因素。文集中所接触到的诸方面，对于今日军阀史、地方史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薛暮桥序言中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有人可能要问：一个中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怎能写出这样高质量的经济论文？”他紧接着说：“我以为答案只有两条：一条是在牢狱中和出狱后认认真真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一条是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而后者是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所严重缺乏的。”这两条足以说明《徐雪寒文集》蕴涵的学术价值，同时也说明他的学术研究对于今天理论工作者仍然具有榜样的意义：巧言如簧腹中空的宏论少写为佳！

1981年冤狱平反后，他被调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文集的后半部都是在这个环境中写成的，真够是“老干已如铁，逢春又着花”！他终于得以重新展现才华。首先是1981年发表了两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后来又继续写了两篇关于人口控制的文章。自从1960年马寅初被打倒之后，“人越多越好论”取得了彻底胜利，人口理论成为思想禁区，无人敢于问津。徐雪寒将三十年来有关人口理论的研究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综合比较，对于粉碎“四人帮”后人口问题的理论突破予以高度评价。他十分赞成宋健主张的中国人口“U”形发展的战略。在控制人口工作处于关键时刻之际，于1982年又写了《坚决贯彻农村人口政策》一文，指出当前人口失控的危险，主张坚决把农村人口生育降下来，同时提出逐步增加人口投资的建议。城乡劳动力大量过剩，和铁饭碗硬性安排就业，大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技术进步，使粮食等农产品商品率低下，而国家还要多支付工资和给予农产品补贴。在人口问

题的理论与实际中，他的视界很宽，看得比较远，不是把压缩人口的希望单纯寄托于避孕套中。要使农业适应实现“四化”的要求，要在农业方面培养财源，他发表积极的主张：

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现在就应当逐步增加人口投资，一以支持农村控制人口，一以支持农村推行普及基础教育。目前三十岁以下男女青年中，有成亿人是文盲半文盲。如不普及农村基础教育，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自觉控制生育，乃至科学种田，等等，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 1987 年，他又发表论文批评“开小口子”的生育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了重男轻女的封建生育观念”，“使我国人口与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将全面处于爆炸性的关系中。”

作者保持着青年时代密切联系实际学风，并不因为高踞红墙之内而流于泛泛空谈，在他的文章中看不到假、大、空三兄妹翩跹起舞。《发展商品经济，改造和振兴上海》一文，直如促膝对话：“我对于长期的、五十年以后、百年以后的事情说不清楚。（引者按：谁能自命说得清楚百年之后事情呢！）近期则不能要求过急；再是和谁比，是和自己过去比，和兄弟省市比还是和别的地方比，看来，着眼于祖国的统一，有必要和香港、台湾比。”“上海要把对外开放摆在重要位置上，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如果不能通过对外开放，不能吸取世界之长，消化吸收创新提高，就不可能服务好全国，就不能起到上海应起的作用。”他的论点生动具体：“上海人灵得很，只要有正确的政策，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政策的关键，是要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这里面没有一点官腔和昏话。

在讨论面临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问题时，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 70 年代曾经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只有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讲到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了由国家高度集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后，只用一段文字，冷静、全面、中肯而痛苦地概括了我国四十年经济建设史：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处于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国际环境中，对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又缺乏经验，客观上造成照抄照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做法在中国落脚后，似乎找到了更适合于自己生长的土壤，以更极端的面目把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相对立，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相混同，不仅排斥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货币关系，而且还限制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全社会的发展，特别在“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价值规律，批“资产阶级法权”，取消按劳分配，使国民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在国家高度集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实物化计划管理体制下，国家用指令性指标控制了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使生产和需要脱节，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国家通过部门和地区管企业，限制了企业供产销活动的横向联系，妨碍了生产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国家各级领导机关管了许多管不了、管不好和不该管的日常供产销活动，使得国家机构臃肿、办事拖沓、公文旅行、互相推托，助长了官僚主义，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指令常常以“党的领导”名义下达给企业，企业成为多头婆婆任意摆布的“算盘子”，失去了相对独立的职能。而另一方面，财政上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或变相的统收统支，不尊重企业应有的财权和物质利益，使企业失去改善经营管理和改进技术设备的积

极性，只好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职工则端企业的“铁饭碗”，影响了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

这一段谨严而形象化的描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风情画。中国竟成为苏联模式的最佳土壤。怎么对待呢？作者还是引领人们向马恩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商品经济是资产阶级‘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摆脱小生产影响，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尽快实现现代化，除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外，别无其它任何灵丹妙药。”这可说是这个文集后半部论文的主题。

作者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他自谦地说：“是一个在漫长的革命运动中跑龙套的人”。他的理论分析和文字表达，都植根于对社会现象的实事求是的观察。他直言不讳地论及“问题确实很多，乱得确实够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密切关系”。早在1983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一文中，即已建议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随后进行建立中央银行、改革外贸体制、特区建设步骤以及关于治理整顿等项目的研究。他说：“开放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小溪和浅滩能够摸着石头走过去。想用试试碰碰，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办法过长江、黄河，却是断乎行不通的。”这就强调指出理论研讨和保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性。在《通货膨胀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文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需要上层建筑保护，上层建筑能够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理论，提出了两种力量配套发展的卓见。他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有两个：一是精神的力量，是党心、民心；一是物质的力量。两个力量都不能缺少。我们要采取配套措施，尽快治理。

这个提法比两种文明建设的内容更深刻些，与作者的书斋通向十字街头显然有关。文集的后半部，包括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纪念文章，文思敏锐，语言率直，有些还带有可口的辛辣。论文笔锋所向，都能触及敏感部位。从活跃的内容到质朴的标题，体现了坚持“二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方向的旨趣。

这部文集是象征作者生命历程的年轮。不论是春材或是秋材，理论勇气都十分旺盛，探讨态度又都认真坦诚。尤其令人钦敬的是，大声疾呼“必须埋葬掉大批判这种方式”！他指出50年代两次人口理论大批判，不是什么大辩论，“因为辩论应该是双方平等的，允许对方答辩。而当时是大批判，批判的对象已判定为敌人。”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高谈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可是，“我国1956年才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而说1949年解放后出现的人口猛增，就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现，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50年代前后两次持续五六年之久的人口理论大批判，搞乱了是非曲直，毒害了理论领域，“代表手工业小生产者思想的人口论一手遮天！”痛定思痛，作者说：

在思想学术研究领域内，采取大批判这种方式，必然带来了根本性的弊害。本来真

理越辩越明，大批判扼杀了辩论，也就扼杀了真理。也正是大批判这种方式，使康生之流的阴谋家才能操纵其间，仗势欺人，败坏了社会主义学术研究的良好风气。必须埋葬掉大批判这种方式，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扬思想无禁区、学术有自由的传统优良作风。

历史的惰性和巫婆相似，会时常出来弄神弄鬼。杜牧《阿房宫赋》是赋体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尤其最后两句，值得人们三读。

徐雪寒学术研讨中还有个事例值得一提：孙冶方和他是青年时代的学侣和战友，50年代孙冶方因主张重视价值规律受到批判时，老朋友们在理论上是赞同他的。在孙冶方病危之际，古稀之年的徐雪寒还到医院彻夜守护。但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同时发展，文集中《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一文，一面肯定孙在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他崇扬价值规律而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承认利益差别性的矛盾。薛暮桥接着指出孙冶方当日提出的是产品经济价值规律，而不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才是学者之间切磋琢磨的正常态度。学术的发展有赖于切磋之惠，棒锤舞，舞棒锤，殊难博得“诺诺”的喝彩了。

雪寒同志文集的内涵丰富。他的《后记》说：“我自己认为有一个优点，就是真实。自信每为一文，都是从‘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出发的。”他的论文，都是心有所忧，不能不言的流露。《后记》里还说，“有两个遗憾时刻难以忘怀”。一是必须经过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弯路走得多了，一是自己对新的经济目标模式和运行机制知之少。这一多一少，薛暮桥理解老战友的心绪：“历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忧郁症。”他自己也承认：“既有紧迫感，又有新的危机感。”

历史长河不尽流，天下事了犹未了。文集远不足以反映作者革命生涯的全部实绩，但毕竟留有历史活动的眉目，剖明能和天下人共见的心迹。按雪寒同志的行年推算，明年该是八十岁了吧？辛亥革命以来，世事如麻，劫波滔滔，怀抱活跃思想、谋求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能享高寿，不能不说是值得庆幸的盛事。知者乐，仁者寿；仁言利博，书也寿！——这岂仅仅是个人的祝赞呢。

（《徐雪寒文集》，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1990年5月

附记：

关于徐雪寒前辈在30年代的革命经历，还应稍加补充说明。1933年初，中共中央遭到国民党方面的破坏，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此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执行局，领导白区地下党工作。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在1934年6月和10月，1935年2月和7月，连续遭到四次大破坏，损失重大，但党组织并没有全被消灭，幸存者也还在人自为战，继续工作。从1935年12月到次年2月，上海妇女界、文化界、职业界等各界救国会相继成立，展开了广泛的民众救亡运动。这时，胡愈之、徐雪寒等，分别都成为救国会组织的骨干。1936年2月，在救国会运动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成立了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以便领导救国会系统的党员，徐雪寒就是临委的委员。在救国会的组织机构中，徐雪寒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上救”）的副总干事；在全国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中，他是组织部总干事，负责该部每天的具体工作，实际通过救国运动的兴起来开展革命工作，把“八一”宣言的精神传播到群众中去。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胡愈之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生活书店业务，以扩大这一块抗日宣传救国的文化阵地。黄洛峰等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徐雪寒等创办了新知书店。这个时期在上海新建的三家

进步书店，夏衍回忆往事时称：“这是近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一项影响深远的贡献。”徐雪寒在这时既担任过“临委”，并且是救国会组织的主要骨干。由于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工作，后人的记载中往往忽略了他的名字。他至今淡然置之，因为他并不是为了垂名后世而积极埋头工作的。

编辑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出版论坛第四届年会上的发言

国际间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学者们，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连续不断；历史文化中的内在因素，在现代生活中仍有重大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审视与估价，在西方学者中间早已展开讨论。德国学者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将人类文化区分为若干独立的实体，他指出，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不存在可将其包容在内的更大的实体。其后，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把迄今以来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 21 个社会，继而增改为 23 个，他认为其中的 6 个，即古代埃及、苏末、米诺斯、马雅、安第斯及古代中国文明，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而其他的文明，包括希腊社会等，都是这 6 个社会的“后辈”。他强调称，自远古以来的一切文明中，历经两千年以上的寒暑风雨，纵令王朝更迭交替，得以维持其文明性格的一贯性的，唯有中国文化。汤因比说这是令人惊诧的历史现象。

面对着学者们高度评价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我感到需要检视两个层面：其一，何以能比较稳定地持续不断；其二，这种内在的稳定性对于当前现代化事业有何影响。前者试图从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看编辑工作的重大意义，回答“国际出版论坛”给我出的题目；后者则从思想文化领域中观察文化传统自身的价值，从事编辑工作者应有一个自觉的认识，以便注意克服旧思想的梗阻，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在“论坛”给予的时间内，我的说明将以前者为主，而只简略地涉及后者。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学者们有所论述，大致揭示的原因不外是：封闭的地理环境，西有葱岭大漠，东临沧海汪洋；单一的田园经济，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和内聚力；来源为多元、多维度的，经长时间融合而成多民族的集合体，还论及其他如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等，都曾对中国文化的连续与稳定产生作用。所有这类研究，我以为，都疏于考察文化自身含有的力量。文化并非是一种抽象，它是完全真实的，存在于特定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的行为与成就之中。尽管文化不完全像一般自然物体同样方式的真实（因为它还具有精神形态），在考察中国文化时，不能忽略大量的连续的历史文化典籍书卷的存在。这些书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的化身形态，而这些书籍的编辑工作的辛劳的存在，不因王朝走马灯式的更迭而全然中断，则是维系和促进中国文化的连续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文化的令人惊诧的持续性，是编辑工作重要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人类的文明进步，从哪里反映出来呢？从古代文献、重要典籍、古老而优美的文物、传世的艺术品，以及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交往礼仪与风俗习惯等等，都反映了文明进步的程度，各个社会对世界的贡献；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图书，图书构成了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智慧的结晶，任何创造发明最终都将写在书籍里。中国、埃及、巴比伦、希腊、波斯、罗马、印度等都是文明古国，她们在思想、文化和科学上对人类社会的

贡献，首先和主要的都记录在图书中，当然，还体现于古代文明的遗址、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和人们很容易忽视的各式各样日常生活器物中。最古的文物，最初的书籍，之所以能够集成和保存下来，正是靠着最初的编辑工作。编辑和编辑工作，是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随着纸张的发明和改进，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发明，书籍就愈来愈成为文明的主要传播工具。从中世纪到现代都是如此。现代传播文明的工具，在书籍之外，报纸、期刊、声频（广播）、视频（电视），以及各种有声读物（磁带），出版物的种类和形式愈来愈丰富，编辑工作在学术文化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愈来愈大，编辑的职能和地位日益重要了。有图书，有各类出版物，就一定要有编辑。出版物都应该经过编辑之手，由编辑进行内容上和技术上的处理，而后与广大读者（听众、观众）见面。古往今来，尽管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编辑工作的广度与深度有异，已有无数没有留下姓名和许多著名的编辑为文化学术的发展而工作着。

关于编辑工作的重大意义，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察，在远古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表现出来。在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的城子崖，出土的大量古文化遗物中，有 16 块都带钻痕的卜骨，当时可能已有一种叫做“巫”的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距今 5000 多年的龙山文化，与我国远古国家起源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有一批管理国家军政、经济事务和从事宗教文化活动的人。这些人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文化知识，成为古代贵族国家的文化官和专业文化人。最初的编辑，或者比较确切地说，最初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就是古代国家的巫师（卜筮官）、史官和乐师。其中史官负责记言记事，也掌管占卜吉凶，在古老的卜筮书《周易》中往往史巫并称，他们是古代国家政务官、事务官之外的宗教文化官。

到了春秋时代，适应社会的变革，“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一些私家学派先后出现，才有私人的作品流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百家争鸣的先声。随着战国社会的繁荣兴旺，私人讲学兴起，游说之风大盛。战争和兼并，一方面是杀人盈野，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交流，文化程度普遍提高，诸子百家，撰述授徒，发表精心著作，写出自己的论点：其门人弟子、亲属与仰慕者、研究者，记录、搜集、汇聚、编订听讲的笔记和论学的言谈。

由于封建政治的发展，社会物质文化的进步，一整套官僚系统和职官制度的逐步形成，弄神弄鬼的巫和史的地位改变。巫师在贵族集团中的作用日益削减，终至下降流落民间；史官另设专职，地位和权力均有一定范围。管理祭祀卜筮、宗庙谱系、记录国事、守藏图籍等，皆由职权明确的官司所掌。遇有国家重要典籍汇纂编辑工作，调派学有素养、专长的现职官员充任，或另设专职编辑机构，要籍大典，则由宰辅（或王大臣）领衔总裁。这一方面标榜王朝崇尚文治，振兴教化，另一方面也是编辑工作重要意义的证明，对于中国文化的持续不断，起着维系、保障和承接的作用。这却是常常为人忽视的。

自秦始皇统一海内（前 221 年），建成大一统帝国，与李斯制定一项文化统制政策原则。两汉承袭秦制。制度略有变动，而原则照旧。其后三国、两晋、南北朝，经隋、唐、五代，直到宋、元、明、清，一贯继续未变。这个政策原则便是由国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掌管文化教

育，在选拔人才上采用荐举和考试的方式，在发展文化上采用国家审定和编辑重要典籍的方式，加上一套完整的施政教化体制和伦理道德标准，形成了持续稳固的和自我调节的严密系统。这在世界史上是为他国所无，对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特殊因素。这个原则，从秦到清，一线贯穿，从未中断。即使一个短命的王朝，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以及原来文化很低的边疆民族，进占内地，建立政权后，也都会这样对待。纵然在南北分裂和动乱割据的情况下，若稍得相对的安定环境，仍然考虑开馆编书。历代大小王朝不断组建编辑机构，编纂群书，因而通过各种具体的编辑工作保证了文化的历史连续性。

论及编辑工作的重大意义，还需要从编辑活动的功能来探讨。依我的理解，编辑工作是有关文化积累、文化发展、文化启蒙、文化交流的严肃工作，是促进和弘扬人类精神活动与文明进步的伟大工作。培根说：“书籍是思想的航船，在时代的波涛中破浪前进。它满载贵重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这也就是对编辑工作的重要意义的礼赞！

1989年9月

卫护读者的心灵 ——关于加强图书报刊评论的札记

这绝不是套话，打从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使中国出版事业神气激扬。1979年12月间，长沙会议上确定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成为出版事业生产力解放的里程碑。接着，1980年4月，《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发布，明确了“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方向指明，手脚放开，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出版事业健康迅猛地发展。以后，虽然难免徘徊踌躇，举足不定，疾徐不一，心力交瘁，但总是迈步前行，对出版改革心驰神往。因此一位实地了解的调查者说：“我们出版工作的主流是前进的，成绩是显著的。”

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然而，如对大量编印的图书报刊加以具体观览、研讨分析，调查者也指出：“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很严重。”这几年新闻出版界的情况，既有严谨的工作，成绩显著，同时也有管不了、刹不住的荒诞现象。尽管二者比例悬殊，而後者的危害性不可忽视。它在污染社会环境，助长颓风恶俗，公然损害读者，教人守愚变坏，一直到腐蚀我们编辑出版人员中极不自爱者。我在基层工作，等于在泥土里用蚯蚓的眼睛张望四周，看到不少同行思路十分活跃，大胆开发，敬佩无已；同时看到品位低劣的出版物，纵非反动淫秽，可是误人父母、子弟。在五颜六色、莺飞燕舞的书摊前，在颠龙倒凤、粉墨杂陈的书店里，让我们当编辑的不能不感到愧从中来，进也惭愧，退也惭愧。区区不佞，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呢？当前出版形势，可不可说是多可喜亦多可忧呢？我们这种精神劳动与物质生产紧密相联的综合性事业，关系到人的智力与心灵和现代化事业的前途。社会上对我们的批评指责，出奇现象的曝光，归根到底，是对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尊重与厚望。无错不成书？

王子野在苏州举行的第一届叶圣陶学术研讨会上说，当前出版界的下列现象应该注意：一是“无错不成书”的状况泛滥。他说：叶老在编辑工作中不许有一个错字，我们现在缺乏必要的奖惩制度。二是文章中病句、错句越来越多。叶老的“文章病院”若今日重建，需大大扩大。三是粗制滥造现象严重，各种词典充斥图书市场，内容相互抄袭，甚至原书的错误也照抄不误。这位老领导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他的谈话登在1991年6月1日的《出版参考》上。他的新年献词是列宁那句话：“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无独有偶。1992年3月20日上海文化局主办的《上海文化艺术报》第一版，刊出专栏文章，题为《无错不成书？》作者立木说：“去年也读过一本奇书，在上下两册数十万字的武侠书中，通篇没见过一个句号，唯有惊叹号满页满纸，一气到底。出版该书的居然还是家有头有脸的正宗出版社。”接着又说：“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所见不多，但目下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传播媒介中，混用错别字、标点符号和错句病句的现象

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书籍、报刊、播音、字幕、广告文字甚至一些正式文件中完全规范妥帖的反倒成了稀罕事。”

出版单位为了耸动引人，即兴改动题文，不征求作者意见，在读者中引起质疑。如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前院长、老作家温济泽关于王实味问题致读者称：“毛泽东说要还他一个王实味，只是说不该将他处决，并没有说应为他平反。毛泽东一直还是把他看成国民党特务的。”“为王实味平反，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历史谜案’，不是我的文章的原题，是封面设计者未征求我的意见而随意加上的。‘谜案’二字不妥。”（《炎黄子孙》1992年9月号）这是对用稿文字处理批评的一例。

京都发行界人士曾作辛辣的预测：“对老祖宗留下来的精品将变着花样出，对名人名著将换着名堂出，对热门热点选题将抢着出。只要能赚钱的品种不管重复与否将竞相出版。”（1993年2月1日《出版参考》）

《北京日报》1993年1月5日第二版用头条地位，发表题为《本市新华书店为何越来越少》的报道，固然反映了市民们的疑问和呼声，也反映了发行主渠道的困境和对策。其他来自读者和作者的批评，如要求对用字基本功加强训练，避免出现把肉麻当作生动的措词；对暴力和淫秽出版物的谴责；对某些电视台将已被社会进步潮流淘汰的腐旧习俗，当作什么新潮来宣传；以及假借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名，宣传封建迷信愚昧行径的揭露；对某些旅游点不惜动用土地、资金，专门展示令人厌恶的名堂，来迎合海内外猎奇者的自贱设施的痛责，等等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举发，不胜枚举，不必一一细述。

热点和新感觉

这里只引有关“热点”的议论。图书市场上不断出现“热点”，本该看作是出版业兴旺发达的征兆。可是，这个“热点”也需要用体温表来测试、记录和分析。万物之灵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内部体温不同，鱼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的体温随外部环境温度的改变而变化，哺乳类和鸟类具有完善的内部调节机制，能保持体温相对稳定。而且，正常体温的标准，因测量部位的不同，清晨与午后时间的有别，会有所波动。即使午后较高，还要看是否为正常的变化，还是出现了隐伏的炎症？图书市场的热点，有不少是读者追求知识的反映；然而，也有依靠各式宣传工具，包括名流题签、作序和在荧屏上亮相等，来推销假冒伪劣产品，骗取忠厚的读者钱财，甚至推销含砒药物来毒害顾客，丧尽天良。这就需要观察与分析热点。

比如《易经》热吧，不仅以算命打卦来迷惑读者。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作家张中行，1992年5月20日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这几年《易经》热，出了许多不负责任的书，比如有的书竟说电子、激光技术都是从《易经》中来的。如果这样下去，中国人会越来越糊涂。”

至于为有些人称道的“领袖热”，抛向市场的究竟有哪些货色呢？其中最最吸引读者主动掏钱的内容是：西方山洞里的毛主席；谁挖了毛家的祖坟；收集“毛章”的人；他还未叫江青的日子里；服务员张玉凤

在韶山水库表现游泳水平高；毛泽东为人民谋幸福，他的女儿被折腾得呼儿嗨哟！其他如周恩来初恋的女友；邓小平开店；我是大首长的女儿；许世友没当过和尚……诸如此类的领袖题材战，真是洋洋大观，究竟表现了什么倾向？难道是出于对老一代革命家的缅怀和尊敬吗？“热”得教人难受！

在周末版、月末版扩版大战火爆街头时，不少传媒展开心照不宣的“明星战”。其实，“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一颦一笑一投足，能把庄严的媒体变成丽人生活起居注！于是，炒股热，下海热，名流官司热，及至宠物热带出宠物读物热，热浪一阵阵袭来。有些高尚单位也跟着“玩”起来，大大潇洒一番了。在个别重点拉稿对象的生活档案上，堂而皇之地写出其人是在哪个胜地受孕怀胎，又至某处降临人间的。其体例笔法，在古典传记中说及伟人的降生偶有之，司马迁说叔梁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得孔子。现在却发展到以双亲的房事来做炫耀的广告，是自炫郡望还是不知自重？

1993年2月下旬，《海南日报》文摘版转载一段报道，给读者一个亟待理解的新感觉：某省日报月末版，为了大量发行，决定让报贩子最后看大样，可以提出撤换某些文章，给三位编辑一定的好处。报贩子在发行工作中自有一定作用，可编辑工作并非他的职责。一个省里首席大报竟为几个钱拱手交出审阅大样的神圣职权，听凭报贩子到编辑部做主，看来这是编辑出版史上的创举。不过，这也并不新奇了，方式不同的出手早已施展，只是于今为烈罢了。遥想当年黄浦滩头，四马路望平街上，有强梁做后台的派报业公会，也远远没有这个省（姑隐其称谓）的报贩子这么“派”！“党性”和职责抛到哪儿去了？不必斥责报贩子越权行为，我多么希望有人出来声明：这完全是失实的报道。

仰仗整体治化设计

新闻出版的状况，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尺。新闻出版事业真正是一项系统工程。通常我们只看到作者、读者、编者三方面，还应看得开阔些，从造纸工业、印刷机器制造工业、激光照排系统、电传通讯设施，直到发行渠道、社会购买力和各个层次读者的需求，都应放在这系统工程之内。作者、编者的素质，学术、艺术的真价，教育事业与全社会风习，也需要考虑在内。新闻出版这些年来的成绩，已在文化史册上留下灿烂的一页。在我们展望走向21世纪的当儿，是挑战还是机遇，考虑在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时，我以为有必要研讨全然走出19世纪，与现代化事业的追求同步前行。新闻出版工作既为一项系统工程，那么，现代化的学术艺术文化神圣的殿堂，就可理解并非由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一手一足所能建成的。行政管理机构已经够兢兢业业的了。新闻出版事业要仰仗整体治化设计，在这个大计划中找寻自己的位置，还要有全社会的热忱协力和理解。就这个事业自身的发展而言，开展书籍报刊评论，只是辨证施治总原则下开出的一帖药而已。

书评研究理论发凡

前辈们早已认识图书报刊评论对于促进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作用。创刊于 1904 年 3 月，对学术文化有重大贡献的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在它的第十六卷第一号第九页上，刊登署名“君实”的《著作与批评》一文，出版日期为 1919 年 1 月 15 日，时值交战国至二十八国之多、战期亘四年三个月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后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两年。这是一篇有历史意义的倡导开展书刊评论的文献资料，特将全文分段标点抄录于下：

自民权之说大张，出版自由，遂为吾人三大自由之一。近世欧美列邦，出版界之发达，风发泉涌，一日千里，用能后淹民智，增进文化。回顾吾国，此数十年来，不特著作之书，阒焉无闻，即译述外籍者，亦复寥寥可数。此其根本原因，固在国人读书力之薄弱，而批评家之少，亦其一端。

文明各国，恒有一部分之学者，专门从事于出版物之批评。一新书甫出，报章杂志中批评之文字，纷至沓来，目不暇给。书之尤有价值者，批评之人亦愈众，其裨助出版界之进步，实非浅鲜。盖近代印刷术进步，书籍印行之易，十倍曩昔。不道德之著作家，往往剽袭割裂，杂凑成书，巧立名目，以炫购者。吾人偶一不慎，辄为所欺，非第费时伤财，抑且足以阻丧读书之志，甚或因而误入歧途，不可救药。惟得批评家之指导，则良窳优劣，不待亲读其书而后知。但以批评者之言为标准，各就己所欲读之书，选择购取，自可收事半功倍之益。

至于著书之人，纵学识十分丰富，亦难免有注意不周之处，苟不闻他人之褒贬，则缺点常留，终不自知。今以批评之公言，为攻错之资助，折中于多数之是非，而加增删修改之功，则其书亦可臻于完善。

故批评之效果有四：一、可以绝劣等出版物之发生；二、可以助优等出版物之普及；三、可以为读者之导师，而鼓舞其读书之兴；四、可以为作者之诤友，而促出版界之改进。

故批评之事，亦复匪易。学问肤浅，则良窳莫辨；见识卑陋，则黑白倒置；心有所蔽，则言多执拗；情有所偏，则语近诬妄。凭其高大之眼光，出以公正之态度，不激不随，务详务慎，则批评之功，詎在著作下哉！

这篇文章，言简意赅，特别是最后两段，把批评的作用说到了。这里附带说几句，此文在《东方杂志》发表时，我国进步新闻出版工作的开拓者胡愈之已担任该杂志编辑五年了。

十五年后，1934 年秋，作家萧乾（今日的中央文史馆馆长）在燕京大学着手撰写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书评研究》。次年 7 月刚一毕业，就到天津《大公报》编副刊，特意经常发表书评。他的《书评研究》收有七篇论文，其中指出：

“书评家第一个条件是他必须是个爱书的人。如果把话说得更响亮些，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关心、维护、促进文化的人……他选择这职业时，必须另有一种理想。像个中古的骑士，他自荐要来保文化的鏢，不使它为劣品所腐蚀。还要有一股火热劲，恨不得每一本自己欣赏过的好书都为全人类读到。有着这种动力的人方可写书评。因为缺乏了真诚与理想，书评家是做不成功的。”

“批评家最基本的态度是诚恳。”

“但一个全然不顾及社会健康的批评标准是要不得的。”

“坚实的文化素养为书评家及一切新时代公民的随身宝。”

“不幸在中国许多书评都是友好执笔的，不是为帮助读者选择而写的。”

萧乾先生的《书评研究》，于1935年11月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与此大致同时，开明书店的著名《中学生》杂志，特辟“文章病院”专栏。这个专栏是文章评论的重要场地，当时很有影响。1933年3月，王云五用《东方杂志》靠拢汪精卫，由后来当汪伪政府要员的李圣五接办。“文章病院”里就发表过剖析主编李圣五文理不通的评论。

建国后第一个开展书评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3月21日，新闻总署、出版总署联合发表《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胡愈之是出版总署署长。这个文件开宗明义说：

在报纸、期刊上经常发表对各种出版物（包括书籍、期刊、报纸、美术出版物、挂图等）的批评，介绍和有评论性的出版消息，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文件还要求：“书报评论中的任何文字，应当力求认真负责，恰如其分，既不应模棱两可，敷衍了事，或是吹嘘恭维，流为恶俗的广告；也不应粗暴鲁莽，夸大缺点错误。”起初，在《人民日报》上开辟了书评专刊；后归文化部又编印过《读书》杂志，在“大跃进”中宣传过两天出一本书。不久，又因故“叫停”了。现在翻检出来看看，有些评论文章还有可读性。

这里不是为图书报刊评论作编年史，只是略举二三事，说明是被重视的。

书评界的新事

还要说，打从1979年以来，随着出版事业的空前发展，图书报刊评论工作也逐步展开。不少出版社印出像样的图书目录，编出本版图书评论专集，还有联合编辑的带评论性的出版信息刊物与小报。领导机关也为推动开展书评工作，在济南召开过专题讨论会议，这也是一种关心。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中书评专业期刊相继面世。出刊最早的《读书》杂志，多用“献疑”、“品书录”栏目发表读者评论。《博览群书》注意关照更多的爱书者，不以高深示人。中华书局的《书品》，则是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总结和学术商榷。《文汇读书周报》侧重书林学人佳话，有时也刊出《虱多不痒？》（1992年10月3日）那样令人注目的书评。总的状况，可能我所见狭隘，觉得介绍占的比例多，倒也符合“扬长比补短重要”的要求。书评论著也受重视，吴道弘、王建辉及王大路诸君先后出版了文集。此外，却也有个别买书号出品书录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出现了书评界的社会团体，有利于组织、联系书评作家，促进书报评论工作的开展，这就是1989年4月20日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成立于北京。《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发刊于沈阳，常常能发表政治性与知识性的铁面无私的评论，颇为难得。在第三届北京读书日活动中，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主持，特意邀请了著名学者多人，

品评新书，为推进书评工作做了别开生面的活动。会上资深编辑家王利器联想到有的书错误百出，不胜感慨，他倡议书评界可以搞一个活动，每年评选编校质量最差的图书。至于各种图书奖，也包含着评论，又当另议。

图书报刊评论工作是有进展的。1990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张鸣《一个值得重视的导向问题》，就是一篇体现说理的书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对一家出版社没有处理好翻译的《2000年大趋势》一书，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这是近年不常见的一篇说理文章。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郝铭鉴，1993年1月1日发表的《健全图书评价系统》也很耐看。他指出：“早在30年代，文坛前辈便疾呼书评要扫除‘名的成分’，‘权的成分’，‘情的成分’，‘肉的成分’。”他认为：“面对着茫茫书海，如何健全图书的社会评价系统，便成了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课题。”郝君设问：“书市上平庸书为什么越出越多？”他自答道：“究其原因，除了缺少书评园地之外，主要是书评界没有真正重视独立品格。作为一名社会文化成果的鉴定品评者，书评家应有自己的‘风骨’。”他还写了《怎样识别错别字》一书，前言为题作《西山抒情》的散文，文中特意藏了一百个错别字让读者识别，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设计。30年代发生大众语论争时，胡愈老就在《太白》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写别字的小品文。

文艺评论家王元化半年多前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强调：“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并由此形成独立意识和独立见解……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超趋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大约与此同时，一位朋友被派到一个出版社去负责，他在与同仁第一次见面时宣布：“人格治社！”

书评家怎样呢？当然不可成为伪劣商品的推销员、骗人广告的策划者。

书评与治平

本文只是近年阅读书报刊时信手写下的札记，文中多用不周延词，窃以为不得以偏盖全。匆促中行文遣辞，想学眼下一种时髦文体，结果弄成“四不像”了。我们从事具体业务的人，总希望编出书来有人说长道短，哪怕严厉责骂也好，如闻人足谷，耐人深思，《庄子·徐无鬼》云：“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

衷心祈求各种媒体拨出一点地方，认真开展评论，大雅君子和无名读者都来命笔，促进学术艺术的进步，卫护广大读者的心灵，满足人民群众求知与自娱的要求，无愧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美称。孟轲答齐宣王云：“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做任何事，都需要经常极度得失、轻重与长短，本是不待亚圣说的。书籍报刊评论的职能就是进行权度。

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上市的出版物，竞争靠质量，不能常靠玩弄邪门邪道的伎俩。书评有一定的作用与影响，但绝不能寄望过高。1992年10月某日黄昏，在上海从静安寺走向华山路，过西侧一弄堂口，正遇上售书人向一女学生大声回话，他说自己绝不多要价，“现在‘垃圾瘪三’

才看书！”世变日亟，知识贫困。学术问题，坦率评论；直言道上，心平气和，并不容易做到。因而书评离不开治平，治平能促进书评。谨愿社会支持，法律保障，作者自重，出版者和书评家携手，度势量力，与有关各界共同担负起提高全民族教养的重任。

1993年1月传记作品中的求真与徇情

在传记作者的笔端，一向回绕着真实与涂饰的冲突，求真和徇情的矛盾。这是历代都有的问题，即使名作家、大手笔，也难免背离真实，曲从人意，写出无聊的阿谀墓中人的文章来。顾炎武批评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且竟为七岁儿童作碑，并无感人事迹，必为豪门骄子，“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日知录》卷十九《作文润笔》称：韩愈文集中颇有一些记述人物的优秀作品，他曾表示，写史传应“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孟尚书书》）；而他自己尚未能力行，当时人对他的某些作品就有“谀墓”的讥评。

然而，尊重事实，一丝不苟，坚不徇情媚人，不愿拜金贪财，足以后世效法者，也不乏其人。宋代欧阳修（1007—1072年）对碑志的写作态度就是一个例子。

欧阳修为他的好友尹洙（字师鲁，1001—1047年）写墓志铭（《欧阳文忠全集》卷二十八），受到尹洙家属和议者的非难，认为表扬不力，又责怪他没有为尹洙受诬被贬的事辩白，很表不满。欧阳修被责难后，于隔年写了《论尹师鲁墓志》一文（《全集》卷七十三），说明命笔遣辞之用意，并申论碑传文写作的原则。他对逝者怀着深厚的惋惜与同情。在写墓志铭时，已考虑到“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材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因此在文中条析其事迹，逐项申述，来说明其非罪。但家属和议者仍然提出意见，欧阳修当时即加以考虑，他说：

前言其穷达祸福，无愧古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

至于要说宋代的古文运动，改革五代以来华靡骈偶的文风，是由尹洙开其先河，则绝不能同意。他说：

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

尽管与尹洙的友情如骨肉兄弟，欧阳修不肯违背事实而乱捧。他坚决表示：

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范仲淹（989—1052年）是欧阳修一生敬仰的人。仲淹去世后，其子

纯仁请欧阳修作碑志。其中涉及景祐三年（1036年）仲淹抨击时弊，与宰相吕夷简（979—1044年）论争被斥逐，后来又因一致对付西夏入侵而尽释前嫌。欧阳修根据他本人了解的情况而写了《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全集》卷二十），得韩琦（1008—1075年）审阅定稿。可是，范纯仁认为他的父亲并没有与吕夷简消除意见。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称：

[范纯仁]请[欧阳]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丞相（指范纯仁——引者）即自刊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献文忠，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

欧阳修采取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不论对传主如何钦敬或亲密，死者家属的社会地位如何尊贵，他都不肯徇情失真！后来宰相杜衍（978—1057年）去世，其子杜诉请欧阳修作墓志，他与杜衡公私关系密切，义不容辞，同时也很感慨地谈到孝子慈孙对传记作者诸多难以满足的要求，并冷静地分析自己的作品，在《与杜祁论祁公墓志书》中说：

缘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之意，……。

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续得，录呈。尹氏子卒请韩大尉别为墓表，以此见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修岂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为鉴！

人物碑志之作，欧阳修认为：立言须有分寸，下笔应求真，论断要准确。叙述不贵繁缛，注意剪裁去取；行文遣词，要含蓄不尽。这些主张，表明古代传记类作品与近现代的写法有同有不同，而中国与西方传记的写法更大不相同。这里不能讨论古文家的“义法论”对后来传记文发展的限制，比如忽略人物的描绘，摒弃不少事迹，削弱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性。欧阳修过于强调史笔的简要，确有比较干枯之弊。然而传记作者不应曲笔徇情，不能因家属的请托而敷衍成篇，细节的论述也不得苟且，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求真之受干扰，王安石（1021—1086年）也遇到过。他为内阁学士钱公辅的亡母作铭文，“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安石毫不徇情，在《答钱公辅学士书》中表示了精辟而严切的意见。钱公辅请他为母亲作铭文，安石写成后，钱觉得不满意，提出他今日富贵气象，足以为母亲之光荣，要求安石据以增饰修改。王安石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对这位学士严肃地指出：

如得甲科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此何足以太夫人之荣，而必欲书之乎？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间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异于间巷之士，而与天下有识同，此其所以为贤而宜铭者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七孙业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四《答钱公辅学士书》）义正辞严，毫不徇情，在此信前段，安石就直截了当地说道：

比蒙以铭文见属，足下于世为闻人，力足以得显者铭父母，以属于不泯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

王安石真无愧于是个王安石！钱公辅后来又当上替皇帝起草诏令的官时，到中书去向宰相汇报，富弼对他说：“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君辈同心以济。”他回答说：“朝廷所为是，天下谁敢不同！所为非，公辅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本与他友好，共事后发现他“助小人为异议”（《宋史》卷三百二十一），不得不和他疏远了。

这里还要谈到的是，王安石非常敬佩欧阳修正直敢言。他仿效欧阳文体写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对其品德、学识和文章作了高度评价，特别赞美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传记作者正需要这副格骨。

关于传记作品，首先要求真实性，本是毋待赘言的普通事理。可是，欧阳修所说“恐难满孝子之意”的顾虑却又是存在的。一旦遇到社会政治气候的某种需要，这个问题越发严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传记作者的立足点，不仅要高于封建社会中秉笔直书的古文家，还要与资产阶级社会上升期启蒙思想家的认识有所区别。关键在于是否认真贯彻和如何具体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传记作品如回忆录等写作中，这个问题还是尖锐地存在着的，这个问题的讨论充满着现实意义。各种形式的传记作品，应该树立和维护它在读者群中以真实见称的信誉。

1982年8月

附记

这篇拙作是为《人物》杂志写的，当时有一位教授为他的表亲的事迹，和该杂志发生争议，我受托转请沪上友人出面疏解，同时写了此文。十五年后，此类事愈演愈烈，殊为难处。除作者应力求真实，注意行文外，家属也需作理性思考，知节知止。欧阳修说得好：“公等少年，何从知之？”有关事实俱在，不必抄孟子所说“虽孝子慈孙不能改”的原话了。传记文的写作，在一定的有法度的共识下进行，才能免于公堂对质。**我的菲礼**

湖湘同行锐意改革机关刊物，近两年来，决定以新面貌与行业内外读者相见。《书屋》创刊前，承多次催促写稿。我将如何庆贺湘江上的宁馨儿出世呢？

我想，不妨讲讲我近年来工作中的失误，作为我诚挚的献礼——尽管是丑陋的菲礼。

我时常想到，伏案整理书稿的编辑，犹如在繁华的街道上开车的司机。闹市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司机应该掌握好方向盘，瞻前顾后，旁及左右，还要耳听八面，不能稍有疏忽。在案头工作着的编辑也应如此，他的目光在字里行间运行，必须集中思虑，不放过稿中存在的大小问题。他能帮助著译者消灭各种性质的错误，同时也会由于他的疏忽而产生新的错误，有时甚至可能比司机酿成的事故严重！

这里要说我的错误，虽属是月份上弄错，却仍然是不应有的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 1993 年 1 月 27 日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在此前两年，中央批示出版她的著作，我有幸参加《宋庆龄选集》的编辑工作。在搜集、翻译、整理、编订她的大量文章后，有关同志要求我就某些人名、团体名及事件等写点注释。过去，为这类文集作注的教训是蛮多的，我只好尽力而为。在 1946 年 6 月 26 日《致史迪威将军》的信中，宋庆龄说：“很遗憾，这次我没能见到你。乘写信之便，向您转达我国人民对您和您的功绩的思念之情。我期待着有一天我能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去美国，那时我将受到您这位将军指挥官的接待。”我为此信所写的题解中称：史迪威“于 1944 年 6 月被美国政府调回。宋庆龄此信便是在史迪威辞行时写给他的。”

这几句话写错了！《选集》出版后，1993 年 1 月 6 日，当年曾在缅甸战场担任战地记者的吕德润学长立即写信给我指出：“此句有误。”感谢德润大兄要我查阅《The Stilwell Papers》（《史迪威文件》），这正是我并没有认真查阅的。

美国记者怀特（Theodore H · white）编的《史迪威文件》原版 P.345 记述：美国政府调回史迪威的命令是 1944 年 10 月 19 日才下达的。早在 1942 年 2 月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美国政府授予他六项任务，借以控制蒋介石政府，从而引起美蒋之间的矛盾。1944 年夏季，史迪威率部在缅甸北部的大雨和泥泞中作战。7、8 月间，中国战场形势恶化，终因任用史迪威统率中国陆军案与租借物资管理权限问题，冲突日趋剧烈。蒋介石于 9 月 25 日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于 10 月 19 日决定将这位将军调回。

前提书原版 P.346 称：史迪威于 10 月 20 日向宋庆龄辞行。

我又另查《史迪威日记》（中译本系香港嘉华印刷公司 1948 年 12 月初版），1944 年 10 月 19 日史迪威写道：“滚蛋了。乔治·马歇尔来了电报，我被召回了。”同时给在美国的夫人信中说：“几天里我就可以回来看到你。”次日，即 10 月 20 日的日记，说到了面见宋庆龄辞行的事：

忙极！告别电报。看孙夫人，她哭了起来，难过得很。

经德润兄指点，我逐一查出，互相对照，证明我在题解中写的几句话是弄错了！

何以发生这一错误？完全是望文生义，主观妄断，失于查考所致。那时，我自信知道史迪威事件的本末，但粗略的知情，并不确切记得月日，就动笔写去，酿成错误，惭愧惭愧！

编辑出版工作正如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所说：是一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案头整理稿件，要眼勤、手勤，脑子勤思索，还要腿勤多找书，多请教。疏懒、无责任心是大敌。同时需要良师益友。虽不易如王勃所说“胜友如云”，编辑确实需要广交朋友、老朋友、小朋友、男朋友、女朋友。《论语·季氏》：“友直，有谅，有多闻，益矣。”我很幸运，颇多良师益友，经常给我教导、批评、指点和提供信息。以上所说，便是一例。回想在无恶不作的大革文化命中，我仍不觉得孤独无依，尽管过着封闭的生活，

却还感到有一束友爱温馨的光照射着我。

我又想到恩格斯的一段话。1842年7月26日，年青的恩格斯已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小组，写了《谢林和启示》等著作，他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进行学习。”他说他“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哲学的权利。”我们这些做编辑出版工作的人，不能靠取得了什么高级职称或是担任什么官职，就轻率地处理工作。信笔一挥，不加周详的思索和严格的查考。

现乘《书屋》创刊，谨借版面一角，再次揭发这一错误，以资自警；并作为一件丑陋的小礼物，请连同我诚挚的情意，敬呈于男女书迷之前，请朋友们再批评，更希望《宋庆龄选集》的读者们能见到我的自讼。我把工作中这一失误郑重地写在这里，野人献芹，我则献丑，请哂纳这一点菲礼。

1994年12月建国初期的消灭错误运动

开国不到两年的1951年8月，在中央新闻出版机关中开展了消灭错误运动，当时震动颇大，我至今印象犹深。对我们参加这次消灭错误运动的人，毫无疑问，是一次严肃的教育。

中共一向重视报刊书籍的质量

党对报刊书籍出版工作的质量问题，一向是十分重视的。办报、出书，要求改革文风，提高质量，改进技术，是不断谆谆教导的。1942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报馆的同人应该知道，自己是掌握党的新闻政策的人，自己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标的题目，直到排字和校对，都对全党负了责任。”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在《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对于新闻出版事业的作用更强调地提出：“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社论最后说：“我们在这方面，历史很短，经验很少，我们要好好学习。”

建国初期的1950年7月，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出版工作的指示着重指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和发行，是一项有很大政治重要性的工作。”当时，新闻出版工作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质量上也起了很大变化，是有了相当的成绩的。这年的3月24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就说过：“这种成绩不应该小看，这是我们很多新闻工作者艰苦奋斗、惨淡经营的结果。”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编辑部的工作方法的不适当，在编辑部的组织形式上也表现出来。”

随后，出版总署于4月12日及15日，两次邀约各地区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代表座谈，会上主要研究了各级出版行政机关的任务与组织问题；会后即根据各地代表意见，与新闻总署会同草成《关于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的任务与组织暂行规定》，待呈请政务院批准后颁布执行。这一规定的目的，在设立新闻出版机关，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以收推进新闻出版工作之效，并保障新闻出版的合法权益（如版权、著作权等），取缔有害于人民的报刊、书籍、广播节目等。这一组织机构的具体职掌

第9项为“协助审查当地新华书店出版书籍”。因为那时出版、发行、印刷分工的体制尚未实行，人民出版社及其他专业出版社尚待设立。到这年10月28日，出版总署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其中《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第五条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多方面的要求，应扩大出版物的种类，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各门类和各种性质的书刊，均应充分供应，同时顾到质上的逐渐提高。”第十四条要求：“出版机构应与读书界、图书馆、新闻界和书评刊物取得密切联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修订错误，改进工作。”第十九条最后提出举办干部训练，筹划建立出版专科学校，“以培养、提高出版干部”。

毛泽东要求纠正错误

提高质量，消灭错误，是一切传媒与出版物的永恒主题。通常所说的质量，包括学术、艺术及技术等类问题，以及各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政策与社会风习、宗教信仰等有关问题，提高质量，消灭错误，贯串在各个环节中，必须时时注意，坚持不懈。客观情况日新月异，业务要求精益求精，有错误必须更正，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

毛泽东主席对于文稿的撰写与印行，一向严谨精细，一丝不苟，发现差错，总要求公开更正。他曾亲笔写过一些更正，如进北平后，在1949年4月间，对于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解放报》上登载他的《五四运动》一文，有五处文字上的错误，他送去更正表一件，要求刊登。同月25日广播的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两个错字，即以新华社名义，“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对于文电上的错误，要求必须更正。1951年2月，他在审定《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时，特意加写了几段话。中央指示中指出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毛泽东加写的话称：“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中共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在刊出此文时，还特别加了按语说：“中央这个指示所指出的文字缺点，在报纸、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中也都存在。全国报纸应当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发表纠正各种文字缺点的文章，以引起党内外普遍注意。”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指出使用略语的混乱现象，“更严重的是文理不通”。“有着这种错误的句子甚至还出现在大量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上”。毛泽东审阅了这篇社论，在最后一段中加了几行，认为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他写道：“当然是能够的。”

同月，中宣部内部刊物登载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整理党内外报刊的决定》，还加了按语指出：“党内外报刊出版的整理，极为必要。”同期刊物还发表了胡绳《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的讲话。

这样，消灭文电、传媒和一切出版品中的错误，就成为迫在眉睫的

重要课题了。

开展消灭错误运动

当时，建国还不到两年，真是百端待理。鉴于新闻出版工作单位是重要部门，成天与亿万读者、听众相见，针对所出现的种种情况，中央指示着重抓传媒和出版物的质量问题，在新闻出版机关中开展消灭错误运动，可说是应运而生，适应各方面工作、不止是新闻出版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关于“文字缺点的纠正”的重大意义，强调得十分透彻：

“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

我有幸到京赶上这次消灭错误运动。我本在上海新闻界当编辑，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前后，三次向上海方面调我来京，终蒙华东局宣传部指示我所在的单位放行。

我于1951年8月到北京报到后，正赶上消灭错误运动，胡乔木作了严肃锐利的报告，具体指出不少错误事例。新闻出版机关很震动，很重视。人民出版社已停止日常编辑出版工作，专心致志地检查出版物的各种错误，慎重而详尽，一项一项地分工检查揭发，讨伐自身的错误。胡乔木重点批评的《新华时事丛刊》各书，都是辑集当时报刊发表的专文、报道等编成的。出版社组织自己同志编写的，只有64开的《抗美援朝小丛书》；还有一两本《中国历史小丛书》，两三万字的小册子，并没有继续组织稿件。当时，出版、发行还未分工，新华书店的16开宣传品，将“新华书店”印成了“新书华店”，也被批评。广播员播音时，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念成“周经理”，影响很不好，当然也受到批评。乔木会讲话，善于分析，用词很尖锐，大家听得很入神。经他一讲，大家觉得问题确实是严重的。

中央新闻出版机关消灭错误运动，由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具体抓。为了研究如何消灭错误问题，范长江曾在9月12日及9月24日先后约请新华社的吴冷西、高戈，人民日报社的安岗，广播事业局的梅益，出版总署的金灿然，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等，开了两次座谈会，了解各单位运动开展的情况。这次消灭错误运动，开展于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电影之后，虽也强调“消灭错误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在思想动员之后，只是发动全体工作人员具体检查各项工作中的错误，为改进业务工作敲了警钟。据我所见，并没有处理什么人。

检查发现错误情况

据范长江向胡乔木的报告：“错误的情况，在各单位都是严重的。”他以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和人民出版社为例做了说明。

他说：“新华社从7月1日到9月19日内，错误更正计有106处，其中应该由编辑部负责的为47处；来稿弄错的有59处。编辑部的错误中，例如报道延安市工商界三天内对抗美援朝捐献了一亿多元，写成“一亿多万元”，将“同业公会”错成“同业工会”；将“驻日美军士兵因不愿到朝鲜前线打仗”，错成“驻日美军第七兵团不愿到朝鲜前线打仗”。

对外电、来稿中的明显错误，如“开罗宣言”错成“开罗公约”；“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错成“台湾自治同盟”。翻译电报和校对工作，由于粗心大意，也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如将“西沙群岛”错译为“西洋群岛”等，编辑、校对都未发现，又如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四周年”，误校为“二十周年”，“金日”误校为“金目”等。

《人民日报》8月份在小样上检查出的错误共263处，其中政策性的错误2处，引语错误43处，题文不符11处，发稿重复3处，用词不当66处，泄露机密3处，滥用简词44处，与事实不符者61处，语法不通30处。出报以后，检查出的错误共15处，其中题文不符的1处，发稿重复的1处，泄露机密的1处，滥用简语的3处，与事实不符的8处，语法不通的1处。检查得很细致严格。

在人民出版社，从8月27日到9月21日，对出版物作了一次比较认真细致的检查。当时，胡绳任社长，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不到东总布胡同10号社里来办公。在人民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是副社长兼总经理华应申和副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重要书稿经王子野审阅后，再送请胡绳复核。人民出版社领导积极响应消灭错误的号召，全社工作人员投入了这场运动。王子野十分重视胡乔木的动员报告，亲自布置检查。在自编的丛书中，如《新华时事丛刊》、《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丛刊》，除编辑杂乱外，且有政治错误。翻译的书籍错误更多，《[美国]对共产党人的审判》一书，译文拙劣，印装成书后停止发售，决定报废。在一些法律理论书籍中，译错的句子不少，如原文说资产阶级国家的联邦制是按土地制，苏维埃国家的联邦制是按民族制，而译文恰恰把这两者译颠倒了。其他书中，资料错误也不少，语法错误也很多，例如《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丛刊》之一的“前言”中，有一句是“把……运动的高潮引向深入和经常化”，既是“高潮”，如何能“深入”和“经常化”呢？在书刊校对工作中，检查了7月份出版的11种期刊，20本，160万字，发现错字、漏字102处，标点符号错误71处，引文与原文不符的41处。又如《翻译通报》还把《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引文弄错，“政党和国家机器”错成“政权和国家机关”，等等。

人民出版社特将检查出来的政治错误、事实错误及错字、漏字的校对错误，乃至书籍广告中的错误，一一列举原件，由梁涛然同志在东总布胡同10号出版社大四合院前面的会议室内，举办一次错误展览会。我奉派协助他做陈列工作。三间大厅房，摆上长桌，铺开展品，分出类别，加上简短说明，供人参观。不少同志，在一周内多次前来细看。作为总编辑的王子野，经常到展览会场来，亲自向同志们解说错误情况，大家觉得像上大课一样，受益不少。举办这个错误展览会，是人民出版社领导消灭错误运动的一个创举。

消灭错误的经验和办法

消灭错误，改进工作，在这次运动中积极考虑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各单位都有一些经验、办法和设想。

据范长江同志介绍，新华社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逐步消灭稿件中的技术错误、事实错误和语法错误，从这年2

月份起，就在编辑部发动了练笔运动。总编室把练笔运动规定为编辑部的重要任务，并制定了全编辑部及各部门消灭错误的目标和进程。通过“技术错误登记表”、“成品错误登记表”，组织评奖和竞赛，并加强资料核对制度。自10月25日起，新华社总社出版《每日新闻检查》的内部刊物，专门发表新闻通讯的检查结果，以便相互观摩改进。

《人民日报》从这年1月起即成立了检查组，检查内容包括：①稿件内容是否合乎政策；②题文是否相符；③发稿是否重复；④是否泄露国家机密；⑤引语是否正确；⑥人名、地名、时间、数字是否与事实相符；⑦语法、词句是否妥当；⑧是否滥用简称。由于检查组同志们努力工作，事实错误等，在版面上已大大减少。在3、4、5三个月内，即消灭稿件上各种错误1897处，其中事实错误占500多处。为了进一步消灭报纸上的错误，还计划在组织上制度上采取一系列办法，首先是实行责任制。一切稿件、信件、公文的处理，一律实行按级签名负责制。报纸版面亦决定实行代号签名制。同时，加强检查制度，进一步强化检查组工作。为提高工作的质量和速度，实行分类积累权威资料的办法。对读者来信，地方记者来稿，以及各组内部工作，均有相应的检查规定。其他如建立权威资料，语法修辞、标点符号，争取于较短期内实行突击学习。为防止错误和拖延现象，对于各个方面的重要来稿，都逐项规定了审阅处理办法。为了消灭错误，并发动群众性的竞赛运动。

人民出版社提出的改进办法是：充实机构，组织一个编审委员会，在总编辑领导之下，负责审查重要书稿，讨论编辑方针和选题计划。加强计划性，按工作分为选题、编辑、发稿及出书计划；按时间分为年度、季度和一月计划。书稿审查，建立三审制。决定采用的书稿，内容不当之处，应通过一定程序予以修改、整理。一般书稿，最低限度要经过4次校对，其中一次，由作者自己校对。书籍在印制过程中，出版部门应随时指定专人进行检查。印刷完毕，应将样书校读一遍，发现错误，立即排印勘误表，并追究责任。遇有重大错误，应重印。还有严肃纪律、培养干部的决定。

各单位在认真检查工作、揭发错误中，取得了共同认识，认为要把消灭错误工作做好，有4项基本办法是必要的：①反复进行思想动员，高度发挥干部的积极性、自觉性、创造性和坚持性。充分揭露错误的事实，便是最有效的动员方法。②要有经常的坚强的领导和广泛的群众运动。③要有严密的检查、登记、统计工作，并须有奖惩制度，加强纪律性。④要有可靠的资料工作。可以看出，这些共识都带有50年代工作方法的特色。长江在报告中还提到，由中央向全国发指示开展消灭错误运动。

促进消灭错误的各种努力

我初到人民出版社时，正赶上了消灭错误运动。王子野狠抓这项工作，号召全社工作人员人人都要树立严肃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派我协助梁涛然办错误展览会，无异保送我进编辑工作先修班学习，受益匪浅。当时，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才不过8个月，其前身是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出版部。检查错误时，是连同人民出版社成立以前所出书籍、

期刊一齐审核的。作为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出版部时，正值建国伊始，组稿工作尚难展开，又要及时宣传时事政策，不免要从党报和期刊上选编一些文章，有关的参考资料不足，尤其严重缺乏国外资料，并受当时专业作者较少、对口介绍不多等条件限制，因而既被批评为“剪刀浆糊，杂乱无章”，又对某些事和人失察，受到尖锐批评的《新华时事丛刊》中的《艰苦奋斗中的日本共产党》一书，就是由于一篇关于日共小史的作者引起的。事过境迁，一年后乔木致王子野信中谈到改进编辑工作问题时，表示了运动中有些批评不免过当。

运动结束时，范长江在宣武门内国会街新华社礼堂作报告，一再强调消灭错误要靠思想动员，各单位负责同志要做好动员工作，才能保证收效。还说到，由新闻出版印刷工会协助党和政府发动全国性的消灭新闻出版工作中错误现象的运动。

刚组建不久的人民出版社，严格要求自身，着力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注意中外文图书资料的收藏，制定规章制度，从而改进出书质量。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人民出版社领导特地将列宁于1919年10月24日致瓦·瓦·沃罗夫斯基的信译出，并致重酬特请琉璃厂著名书法家，以墨笔按宋体字形写在泥金朱红纸上，宽1尺多、长约3尺，装入精致的玻璃框中，悬挂在总编办公室东侧会议室北墙上。沃罗夫斯基是国家出版局局长、人民教育委员会领导成员。列宁看完了《第三国际。1919年3月6—7日》这本小册子后，向沃罗夫斯基指出：

“我对出版这样的书提出严重警告。”

“这本小册子编得糟透了。完全是粗制滥造。没有目录。这像是一个白痴或显然不学无术的懒汉在喝醉酒的情况下，把全部‘材料’、论文、讲话一凑，就胡乱地印了出来。”

“没有序言，没有记录，没有确切的决议原文，没有把决议和发言、论文、评论分开，什么都没有！真是闻所未闻的丑事！”

“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竟被这种小册子玷污了。”

列宁在信中提出5项要求：其一，“用贴页的办法更正错误（把过失者关进监狱，强迫他们为每册书贴页）。 ”……其四，“规定制度，使每一种出版物都有专人负责（建立负责人登记册）。 ”列宁在信的第一段内即要求：“国家出版社全体社务委员传阅我这封信，并且制定严肃的措施，保证不再发生这种荒唐事。”

列宁这封信首先提出了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建立专人负责制的原则要求。我们以后每次开会讨论编辑出版工作时，写得工整的译文都鲜明地映入眼帘。尽管文字无声，这信却是长鸣的警钟。

不久，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的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共用的饭厅里，由叶圣陶先生等主持语法修辞讲座，同志们都去听讲，里里外外挤满了人。这是一种提高整理加工工作的有效措施。

提高质量是主要方针

1952年10月25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的报告中，讲到在出版行政上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主要的第五项即为：“提出了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方针，开始注意建立和充实国营出版社的编

辑机构，健全编辑和审校制度，并初步地推行消灭错误运动，克服了出版上的混乱现象。”

建国初开展的消灭错误运动，热烈紧张，警钟长鸣，殊难忘怀。今日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不少可观的成绩，同时尚有“无错不成书”之讥。谨应《新文化史料》编者之嘱，忆旧谈往，叙述当年消灭错误的要求和努力，足可策励来兹；兼怀毕生致力于著译出版工作的王子野同志及“文革”中横遭折磨、被痛殴致死的梁涛然同志。

1994年11月交流与远眺
——为国际出版论坛第六届年会而作

从出版国际论坛汉城会议以来，冷战结束后，长久木然的大地岩石圈却破裂了，地壳板块浮动起来，在格局剧变的浪涛中不安地飘浮着。这中间，科学的进展，技术的创新，世界市场的影响，跨国活动的频繁，更加发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信息交流，广播电视，环境保护，科技合作等等，使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地壳板块在惊涛骇浪中不断漂浮，势将拼组成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太阳系新星球。历史老人真多事，在本世纪之初，将尘封的史册揭开了新篇章；到本世纪末又来调侃拨弄人，竟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跃动不已、组合未定的扁圆体；距离太阳的远近和轨迹，以及组成环绕四周的大气圈有哪几种气体，尚待观测。

中国历史性的变革

中国在进行百余年来人民殷望的现代化事业。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新的经济因素正在成长，渐进方式的改革已使经济体制开始出现历史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重要文献，主要目标是重建市场秩序，确立市场规则，首先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祥和、进步的经济政治现代化国家。这不仅对于东亚、也对于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的跃动，新的设想，新的实践，使我们出版业面对着发展的新契机。由于实行市场原则的现代化追求，商品交换活动将日渐超越地域的、民族的与文化背景的障碍，挣脱传统观念和陈腐习俗的拘束，打破横向之间的隔绝。开放的中国与国际市场沟通相连，中国便能与列国并立共进。在汉城会议的临别宴会上，承韩国同行们要我讲话，记得我曾这样说：“比邻若天涯的不正常情况会改变的。”国际市场的开拓，会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意念和襟怀，都具有无法排拒的世界性。当代正常普遍的经济行为，将使“天涯若比邻”。市场的力量也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在取得经济效益之外，同时保证实现各种社会正义的目标。但市场经济毕竟是活的机制，公平竞争的机制，能够促进社会的繁荣。贫困与落后，那便只能对文明进步空留一片想望之情而已。

竞争激发出版活力

因此，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现代化事业的实现，为出版行业的发展开拓了

大有可为的前景。现代化事业成就的衡量标准，并非单纯靠实现工业化的程度，也不完全决定于拥有各类产品的数量，在丰饶的物质收获之外，还需有体现精神劳动的文明高尚、自由舒畅的学术文化产品，才能说明全民生产劳动的实绩。如果打个比喻的话，这正与电子计算机硬件与软件不可缺一的关系相似。我不能同意柏拉图以商业致富为道德上的毒药说法。虽比他活动早 130 多年的孔丘，却对于经商曹鲁、致富千金的子贡，与簞食瓢饮、安贫好学的颜回同样看待。图书的货币表现与它的内涵价值并不一致，但图书仍属商品，不过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商品。一旦解决了价值与价格政策的冲突，市场经济则为出版业的发达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出版业的神圣天职，在于发掘、选取和积累、传播科学文化艺术。各种财富，通过市场、教育和各式媒体来促进社会进步。毫无疑问，转轨与培育市场经济过程中，在中国，对出版业会带来不少难题，既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如何兼顾，也有市场需要与书稿质量的如何把握，还有人员素质与经营管理等等，难免有困恼和周折。可是，市场取向已不可逆转，竞争能够激发企业活力，提高人员素质。正在形成中的竞争机制，将是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前进的发动机与传感器。令人庆幸的是，现在正是中国出版界继承 30 年代优良传统，发扬敬业精神，迈步跨上新台阶的时机。

交流是智能的扩大器

值此时会，面向未来，在这个论坛上，盘旋于我心中的有两个课题：一是如何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一是对于迎接新世纪的眺望。交流与远眺，这两件事经常交织在我的思考中。

说到交流，中国文化并非全都是土生土长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世界文明已经昭示：交流是人类智能的扩大器，是创造发明和普及推广的催化剂。事例不胜枚举。回顾中日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单说佛教的传播一事，我们不能忘记鉴真，更不会忘记空海、最澄，这些大德高僧是佛教弘法的使者，也是文化交流的功臣。他们的影响并非局限于寺院之内，而是遍及文学、绘画、医学、音乐、建筑等众多文化学术领域，使两国人士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文镜秘府论》保存了中国语文学的珍贵资料，至今还是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参考书。《舶载书目》中许多持渡书，又转而弥补了我国藏书的短缺。我们记得光绪年间黎庶昌、杨守敬以及黄遵宪在日本访得古逸书籍，为我国学术界所重视；我们更没有忘记梁启超在横滨通过明治文化的传习，向国内介绍西洋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编撰活动，用他的话说，即所谓“掇邻圃之繁花”。他断言“外学输入者果昌”，“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其后，中国各省赴日留学运动的展开，是推翻两千年专制统治的重要文化背景。至于朝鲜半岛，是中、日、韩文化交流的桥梁。交流是双向的，润物无声的。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打破形成多年的封闭体系以来，我国出版界对扩大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包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今后，这种交流还要进一步扩大，我们再也不能回到过去那种闭目塞听的自我愚弄的岁月中去。因此，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著作和科技研究专著的引进、翻译和出版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

和国外的同行与作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放眼远眺 21 世纪

至于说到远眺，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许多知识在更新，成果在开发，人们兴奋地登高远眺 21 世纪，那将是智能机器无所不在的世界。然而，非洲的天灾人祸，萨拉热窝的隆隆炮声，命运之手又把人们拉回本世纪初充满战乱、饥馑、死亡的枯萎了的历史中去。许多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值得我们思索、对照和分析。出版业为跨世纪的人们和明日的世界拟定些什么选题呢？请容许我放眼远眺。

人的问题势将首先列入议程。人是创造与传承文化的主体。人的研究是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主题。现代化事业需要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没有好学求知、敬业乐群的精神，没有丰富的智力生活，就不能把自己培养成文明的现代人，也就不可能有独立强盛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必须从各个层面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心理、气质和天职，更新全民族的传统观念和伦理习惯，激励人对于社会公益的关注，发挥人的智慧，思考人的价值，培养独立人格和人权意识，保卫人的尊严，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努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实践中重新认识自我，不断超越自我，成为具有崇高兴趣、欲念和追求的人。与此相关，还要研究人的社会保障问题，这应与反对好逸恶劳、放荡不法、意念颓废等联系考虑。出版各种门类、各个层次的人的研究作品，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与社会各界协力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体现出版业的时代使命和文化企业的属性。

在调理好男女公民的自身生产外，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是个重大问题。干旱、洪涝、沙漠化，珍禽异兽的劫难，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高，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出版业针对未来的忧患，悉心编辑出版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论著、报道、资料 and 成果，为建设绿色生态屏障而呼吁，治山治水，抗御灾害，关怀全社会的安宁幸福。

在多元化多层次的出版文化架构下，普及与提高并重，既涌现品种繁多的大众化通俗性读物，又重视高层次专门性的各类学术著作的推出。时时核计出版物投入市场后的经济效益，又能分清层次类别不同的出版物，两种效益的高低有别，收效的时间、表现有异，而不以市场供求情况作一律对待，从整体上处理盈亏的平衡。这就需要眼光密切地注视市场，而又能高瞻远瞩，灵活讲求市场意识和经营管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真理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科学技术的发明不断转化为生产力的历史，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业从开阔国民眼界和发展国力上筹划经营谋略，积极编辑出版各个层次的科学技术读物、普及现代化科学知识的音像出版物。还要编辑一种期刊，实事求是不会遗漏地报道中外各项科研成果，以促进其进入生产过程。科学走出了实验室，能抵制愚昧独断，脱贫致富。让我们在辽阔的国土上撒满科学的种子！

出版业吹动清爽的和风，经常不息地拂煦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抚育他们健康成长。出版各类内容生动、切实的书籍和音像读物，巧妙地拨动他（她）们的心弦，帮助智力的发展，认识历史和周围的现实。激起高尚而昂扬的精神，懂得人生的意义，公民的义务，如何对待公众和国

家；在日常生活中，男孩如何对待女孩，年轻人如何对待长辈；在国际交往中，如何对待肤色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外邦人。青少年是 21 世纪的主人公，从他们的眼神和行为举止中将可看出国家的明天。青少年也是我们出版业最重要的顾客，要像对待上帝那样侍奉他们，绝不能在他们面前献上不洁的果品。

而且，出于廉明清醒，不仅仅用法律来查禁有害公众身心健康、背悖社会伦理道德的出版物，还会用市场调节以外的手段，如减免税率、行政补贴、社团赞助、企业支持等办法，来提倡严肃文化，促进和保证学术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出版业的兴衰是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尺。图书市场上各种硕果累累，才是国家的光荣。

书籍是不会消灭的

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涵是不可穷尽的。出版业可做与应做的工作也是没完没了、列举不尽的。尽管欧美电子书的时代已经来临，市场上纷纷以推出电子书籍、电子杂志为时尚，我深信，随着科技的进步，材质的增添，书籍的外部形态日益改进变化，而作为人间最宝贵的物事——书籍是不会消灭的！出版业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编辑人、设计者的案头等待处理的文字稿和磁盘将越积越多，迫切要求迅速的处理。出版业将成为人们尊敬和艳羡的行业，行将编辑出版各种材质、形态、内容繁富的形形色色书籍来，满足生活的要求。虽然地球上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我不同意制造文明冲突论的恐惧，相信世界各族人民都希望生活在美好的社会中，那么，随着经济交往日密而来的文化交流，相互理解，思想与知识沟通，感情逐渐融洽，编辑出版多种大量书籍——人类思想智慧的载体，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繁荣的通天塔。

1994 年 1 月

